

# 中流砥柱——倪柝声传(金弥尔)

## 目录:

序言	5
前言	8
第一章 神的恩赐	10
第二章 守望者	13
第三章 蜕变的新生	20
第四章 全所有奉献	28
第五章 穿越禾田	35
第六章 信心的试验	43
第七章 海外工厂	53
第八章 脱去旧人	59
第九章 脆弱的瓦器	68
第十章 觉醒	77
第十一章 新的历程	87
第十二章 工作的再思	98
第十三章 兴盛	109
第十四章 引退	117
第十五章 归回	126
第十六章 一致的拣选	134
第十七章 陷阱	142
第十八章 试炼	149
第十九章 隐蔽的行动	158
第二十章 没有人禁止	165

## 序言

在每个时代的人类历史中，往往有些具有卓绝智慧的男女，他们在当代被视为人群的领袖。在欧洲的历史中，加里波底、拿破仑、克伦威尔及丘吉尔等均曾闻名一时；北美洲也有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及艾森豪威儿。这些人的性格与信念曾改变了时代的历史，他们也是转移时代命运的人。

同样的，在神子民的历史中，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开创者；摩西使被奴役的希伯来人建造成一个具有潜力的大国；大卫从卑微的出身脱颖而出，成为以色列王和犹太王。但从选民历史对他们民族英雄的生活与工作的忠实记载中，我们知道这些英雄并非绝对完全，这是一件令人振奋与激动的事。摩西不是一直都很谦卑，甚至在他学习谦卑后，仍因着急噪而失去引领百姓进应许之地的特权。大卫是一位和神心意的人，位高权重，却因道德的堕落及一连串的错误，殃及他的家庭与国家。

研究教会的历史，可以借着考察「转移时代的人物」一同进行，例如保罗、奥古斯丁、亚西西的法来西斯、马丁路德、加尔文、圣法来西斯、诺克斯、约翰卫斯理、亲岑多夫、李温斯敦、克里维廉、大卫生、斯达德等等，但是无论何人，当你仔细的阅读这些人的传记时，你总会发觉到，他们都是具有人的本性，并且他们的圣洁并未能使他们免去许多错误的判断，甚至有一些严重的错误影响了他们的跟随者、整个基督教，以及各大洲的宣教运动。

中国大陆也像其他广大的工厂一样，在神的旨意下产生了本土的英雄，并服侍了他们自己的世代。席胜魔牧师是以为学者及药学家，他于本世纪末期，在山西建立了教会，他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歌，并且具有相当的属灵认识。许多中国属灵英雄在1900年间拳匪之乱时因信心操守而为主殉道。王启泰（译者）在1910年使教会得到复苏；丁立美借着福音的恩赐，带下早期全国性的改革。严雅各博士在基督的名下于中国创始普及教育；诚静怡博士在遭遇中国共产党逼迫使唤醒教会起来仰望神；宋尚节博士及许志文博士，在三十年代带领教会进入信心的领域；陈崇桂是一位有恩赐的圣经教师及作家；贾玉铭博士也是一位突出的圣经学者及福音使者，他的工作持续到九十几岁。有一些令外国宣教士困窘及不受欢迎的人，像张灵生（真耶稣教会）、敬典瀛（耶稣家庭）、倪柝声（小群）等，他们发起脱离外国宣教士及宗派运动，王明道维持了一个独立不与别人分离的教会，他对全国叫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著名的中国基督徒为数很多，但他们多数并未像倪弟兄成为举世闻名的话语职事。倪弟兄本人只写过一本书且出版了。但是他留下了相当完全的讲章、作品及会议记录，这些资料曾在他所编写的几份刊物中登载。有些是金弥耳弟兄收集加以整理出版，例如：「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模成祂儿子的模样」及「不爱世界」。这几年来金弥耳弟兄也收集了倪弟兄许多生活及工作资料，他在1938年曾与倪弟兄有私下的交通。

赵君影，他是第一代基督徒，也是一位有能力的福音工作及学生工作。他曾说若要使这三代的基督徒得着成长及更深的启示，就必须借着慕安得烈及莫尔（Bishop Handley Moule）主教阐明奥秘的著作。倪弟兄不像赵君影及其他同代的教会领袖，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对圣经真理有其独特的亮光。很少现代中国基督徒的教师，能像倪弟兄在极深的属灵经历并真理教导的工作上，那样的荣耀基督。但倪弟兄像大卫、保罗、卫斯理及施达德一样，并不能免除在人为上的错误及人性的弱点。他强调教会是「一地一会」的原则，使他成为一位分裂主义者；他公开批评其他教会，造成基督身体不可避免的分裂；他自己从事工商业的善意行为，造成自己与会众的分隔，至少影响五年的服事，也成为共产党攻击他的借口，他极力效法初期教会榜样的过时看法，要求他的教会在实行细节上的一致，又造成了同工们的分裂，也给反对他的人许多批评定罪的资料。这种缺乏信条及教义原则所建立的教会，无论在起始或进行过程，都造成不可避免的偏失。无论在古今的教会历史中，此种原则的例子相当多，

这些可以从金弥耳的传记中看到。

但是当我们在叙述中国的教会历史时，我们不能忽略这位著名教会领袖的生命及工作的影响。他所遗留给信徒的产业，使中国教会在火的逼迫及试炼中得以存留。倪弟兄确使一位「转移时代」的人物，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所不能看见的主。在二十年的监狱生活中，他未曾离弃他的主，正像其他支派的教会，如今仍有许多他的会众同工及跟随者，以同样的心志及信心在各地为主作见证。

赖恩融 (Leslie T. Lyall)

## 前言

这本倪柝声弟兄生平及职事的传记，是以一个未涉及中国事物的海外宣教士之观点叙述，而呈现在读者眼前。1938年我正是一位青年宣教士，正要离开英伦到印度去，我庆幸有好几周的时间和他在一起。在这段珍贵的日子中，我发现自己对基督徒生命及服事全盘的认识有了极大的长进，并且得着一个崭新的方向与目标。现在轮到我来叙述这曾对我产生深远影响及其奇特的生平，因为他的信息贵在是溶合再他的生命中。此文中借着生活的背景，及他自己许多启迪性的轶事，我们更可以在他一生的路程中，探索到神在这件举世震惊事迹中的作品。

这些年来，我有幸会见了许多与倪弟兄有深交的人，并与他们晤谈，根据这许多如图书般生动的资料，我才能把它重新呈现在字里行间。有些是很早以前遇到的，由于时间的短促，未能允许我做更深的询问，至今仍引以为憾。这些个人的事迹，有许多是彼此契合，相互印证。但一些细节，取自各别见证人的回忆，由于需要而取用，亦无不过之处。更有一些论据不足的事情，为了篇幅的关系经过仔细思考后把它删除了。若有任何错误与连贯，当然必有我个人负责，其中也包括我对倪弟兄本人及其同工的评论在内。若是由于我对隐藏在有些事情背后之含义、原因、动机有所误解，而引起伤害或不快，我也愿意为此特申歉意。

我曾得到许多人的帮助，特别是我从受恩 (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 教士得到许多倪弟兄宝贵的讲词与著作，这些是他所赠送的译文及抄文。她曾细心的训练及带领这位属灵人，这是在我所编辑倪弟兄的几本书上，公开论及她的帮助，当然也会列在本书中。在解释许多事情的观念上，我也得到其它神的仆人成熟属灵智慧的帮助，如这位已逝的陆忠信先生，他是倪弟兄自幼以来的朋友。

在其它的地方，我也得到许多有关倪弟兄回忆印象的资料、私人函件、翻译等等，这些人包括：史百克 (T. Austin-Sparks) 哈伯特。包罗 (Hubert L. Barlow) 大卫·本第泰勒 (David Bentley-Taylor)、林纳克 (Lena Clarke) 和受恩教士、希第巴克 (Theodore Fischbacher)。

我也要向伍德小姐 (Miss Jean Wood) 及宣教联谊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的金妮小姐 (Miss Rosemary Keen)、伯望豪博士 (Dr. Jim Broomhall) 及海外宣道会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的金依妮小姐 (Miss Irene King) 他们的乐意帮助致谢。也感谢胜利出版社富勒豪先生 (Hugh Fuller) 对我撰写这书的鼓励及忍耐等候，特别是四位亲切帮助我读写手稿，提供参考意见的卢耿先生 (Gaylord Leung)、

漆林先生 (Janet Killeen)、赖恩融先生 (Leslie.T.Lyall) 以及我的妻子珍妮 (Jean)。

关于中文名字的翻译, 我特别采一般通用的 Wade-Gile 制的老式拼法, 并没有加上「修饰」, 那是说正如报纸及参考书一样。我省略了名字腔调及语句上的停顿, 因为这对英语的读音并没有什么意义。若有不合适及误拼的情形那就是由于我中文差劲的缘故了。

在预备这本传记的工作中本人特别得着神随时的帮助, 这是出于祂的手, 也是为祂所用, 并特此献上。

主后 1973, 伦敦, 金弥耳

(Angus I.Kinner,London,1973)

## 第一章

### 神的恩赐

春天悄悄临到古老的中国大陆, 晴朗驱散了霪雨的季节, 夜晚的天空非常清明, 只有一些像白羊毛的薄云, 一团团飘过银色的明月。福州府古色古香的高塔被七道城门深锁着, 蜿蜒的城墙上, 伸出久已遗弃的大炮, 俯瞰着广大的稻田和散布其间的农庄。第八世纪所建造连接城北、中洲及南台岛的万年桥上, 熙来攘往的人群已渐趋平息, 今夜并没有浓雾笼罩闽江上的船家。

在拥挤的小街及住屋中, 白天街道两旁石匠所发出的有节奏的噪音; 苦力挑着担子的哼唱声; 巨大杵的捣鼓声; 街道行人草鞋的唏嗦声; 运往市场去的猪仔尖叫声; 沿街小贩的叫卖声及乞丐求讨的哀声; 这些喧闹的声音也都逐渐消失了。狭窄的巷道中, 有一些迟归的脚步声; 几时桥夫抬着桥, 带着晚下班的文职官员; 一群吵杂的码头工人刚装完货从码头归来; 一位瘾君子拖着沉重的脚步, 紧锁眉头, 手中吊着已熄灭的外国烟卷; 到最后一切终归寂静。在宽敞的倪宅中, 家人都已入睡。

「剥剥! 剥剥!」的声音响起。睡在丈夫身旁的林和平, 辗转反侧未能成眠, 他觉的腹中的胎儿在动, 他也听到老大闺女及老二闺女的呼吸声。「剥剥! 剥剥!」这个如断音符般的声音由远而近地响起, 是守更人巡行各处, 提醒已睡的人们当心火烛、小偷及其他危险所发出的警告。「啪! 啪! 啪!」从竹筒发出的柝声, 好象芦笛声音, 似向人说:「子夜已过, 邻居们一切都平安无事!」

小屋里一盏油灯泛着微光, 火焰闪烁摇曳。和平转动背部稍觉得舒服些, 她闭着眼睛, 并未入眠, 她低声呢喃着:「但愿这次是男孩!」这句话她已说过上百次了。她想起白天家人闲聊、揶揄她到婆婆家所受的讽刺, 心中忿忿不平。中国社会重视男嗣, 而她却为倪文修生了两个女孩, 她的广东婆婆为此大大不悦, 因她的大媳妇已不幸生了六个女儿, 所以她断言文修的媳妇也一样。因此和平在愁苦中呼求:「喔! 神啊! 求你为我伸冤, 挪去我的羞辱。」这时她忆起一年前快生第二个女儿的时, 她曾向神许愿, 却不过真诚, 也渐渐遗忘。那时她曾照着哈拿的祈祷向神许愿说:「神啊! 你若赐给我一个儿

子，我一定将他献给你，一生成为你的仆人。」她从小就熟悉撒母耳的故事。现在，这些事再次回到她心中，激起前所未有的感动，她毫不犹豫地說：「主啊！我一定信守所許的愿！」这次不但是口头上祷告，她也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什么，然后她便含笑安然入睡了。

过了好几个礼拜，他们夫妇归回汕头家中，在那儿生产，当她听见丈夫喊說：「是个男孩！」时，心中得到无可言喻的慰藉，她紧张的情绪在喜乐的泪水中得着释放。家人把红蛋送到邻舍及朋友手中，告诉他们久已盼望的男孩出生了，倪家有了后嗣。

1903年十一月四日，倪栢声出生了。他有一位性情文静的父亲及倔强的母亲，中国人取名都是颇有意义的，一个孩子总要在他的生命中的转折点、取一些新名字。起初，按着家庭传统，他应叫倪述祖，意思是「继述先人的志业」。几年后，他感觉在他的生命中有一样新的使命，便思索一个新名：「更夫」，意思是「警戒及劝告者」，表明神要他成为先知及发言人。但是这个名字有点粗俗不雅，他母亲建议改名「栢声」，意思是更梆之声音或警钟，提醒他记得母亲在夜晚守更人敲竹梆时向神所许的愿。所以他定名为倪栢声，英文名就是众人皆晓的 Watchman Nee。他终生操练做一个像撒母耳那样警戒沉睡众人的先知。这位神的祭司也是一为鸣钟者，他警戒神的百姓要有危机意识，唤醒他们当进入新日子的曙光中。

## 第二章 守望者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也是中国进入南洋的门户。倪氏家族历代都定居此地，每到清明，倪家的人都要到山坡上清扫祖先的墓地。1839年左右，倪栢声的祖父倪玉成诞生时，适逢中英为限制外贸爆发战争。经过三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在屈辱下被迫与西方签订合约。根据南京条约，香港自1842年割让给英国，并且开放福州及其他四个海港供外商贸易来往，中国蒙受极大的凌辱与羞耻。沿海本是木材、纸张、水果和丝绸的集散地，在江中的中州岛及较远山丘的南海岛，又增加了一些新奇且不受欢迎的事物，就是外国贸易机构及其他人的住宅。

早在五十年前，博学的乾隆皇帝知道，英国藉贸易入侵印度的情形。所以他写信给英王乔治三世，耐心地解释他的帝国是自足的经济制度，不需要海外奇异的产品。信上说：「你的使节知道使我们什么都有，我不需要你们这些珍品奇货，也不用贵国的产品。」这种论调是官府盛行的看法。然而欧洲对中国的瓷器、丝绸、木漆需求逐渐增加，虽然官方命令以物易物，但英国商人却付银两购买，英国政府发现这个严重的问题，只有要求中国购买印度的鸦片才能解决。这样的交易让外商占了便宜，到了1851年，天子的反对撤销后，鸦片才正式成为合法的商品。造成贸易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欧洲需要茶叶。1853年倪玉成大约十四几岁，茶叶是福州最大宗货物，从武夷山买来，装载好沿闽江而下，再从闽江口运往欧洲及美洲各市场。不久庞大的中国快速帆船，如：太平号、色摩比利号、羚羊号、飞驰号，这些船舶使福州成为仅次于上海的茶叶贸易中心。

更正教是随着外贸进入中国，也是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另一个结果。1842 年所发生的事，当代一位西方作家曾写下激昂的语句：「神已经开了救赎祂百姓的道路，祂行审判是为了向他施怜悯。」皇帝朱批颁定，容许基督教信仰在古老的中国流传，但是这项论令，因为国内军方压力而撤除。尽管如此，西方传教士因为他们国家的支持及对福音的热心，他们涌进广大的中国，为使公义扩展延伸到中国人的内心。他们工作非常迅速，1847 年首先抵达福州的是美国公理会的宣教士，同年美国美以美会也来了，接着 1850 年英国行道会前来传教。这些宣教士的到来，并没有缓和鸦片不法贸易的争论，而且当红发外人要求更大贸易特权时，这些传教士还几乎遭到当地人误以为是贸易商，并与他们的贸易有份。

第一所西式学校，是由美国公理会在 1853 年设立于古老城市的郊区，倪柝声的祖父倪玉成，因在那里听见神借着基督耶稣临到世人的福音而得救。当时他还年幼，四年以后（1857 年）福州有了第一座教堂。他是四位在闽江受浸的学生之一，他的灵命长进很快，所以宣教士就训练他，使他成为一个福音使者，不久就与其他青年学生向城里近五十万的灵魂传福音。后来，他被按立为牧师，成为三位闽北著名的中国传道人之一，他有解经的恩赐。1890 年他被主接去后，仍然令人们纪念。

一位青年到了结婚时期，也正是他一生很大的试验，当时福建很少有女子信主，所以倪玉成找不到本地的基督徒女子为妻。福州的风俗在当时极端的保守，没有人远背当地风俗与外省人结婚，但是他必须选择是去面对别人的议论，或是使他的见证受损，后来他的信心战胜了传统，他从 450 里外迎娶了一位广东小姐，这位小姐的确是神为他拣选的，她成为他一生正真的同伴。

以中国旧社会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是得到了祝福，共九个孩子。倪柝声的父亲倪文修排行老四，生于 1877 年。因他是牧师的儿子，所以在基督教的小学上课，然后再读儒家经典准备应试。福州是个文化中心，每三年有两次初试，好几千个学生到此应试，每五年会有两次是全省的学生在此复试。借着一种古老的仪式，文修与一大群学生走进城东北的大考场，考场大门上悬挂招牌，写着：「为帝国求才。」他被单独关在小屋中三天，认真书写卷轴，以古文写一首古诗，及两篇指定的论文。这些试卷进行严格、公正地评分，在他结婚之前，通过了复试，获得当地初级官职。他年轻的妻子林和平生于 1880 年，是农村大家庭的老么；生活在可怜、黑暗的迷信中，常常与惧怕、魔鬼、龙及狐狸精的情绪周旋。那年福建发生饥荒，在灾难中，只有她幸免于难。通常一个女婴在父亲眼中是多余的，可能遭遗弃、溺死或活埋，但她终于保留了性命。若女婴因饥饿生病、身体虚弱则必死无疑，骨灰就会送进福州高大多窗棂的婴儿塔中，把骨灰放在塔里花岗岩所做的小盒子里，以节省昂贵的埋葬费。当时南门的罗马天主教孤儿院，只收留少数的女孩，孤儿院门上题着：「你父母离弃你，耶和華必收留你。」

林和平的父亲并未完全遗弃她，他不是自私到为了三、四个银圆把儿女卖掉的人。经过别人介绍，他把她送到城里一个较好的家庭，当婢女养大，她实在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不久这个家庭也遭遇困难，又借着一个人，介绍她给一位在南台洋行做事的姓林的商人，因商人的妾不生育，希望领养一个女孩，所以和平再次易手。因着神的保守，这位商人非常疼爱孩子，因此她找着一个安身之处。虽然这个家已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但夫妻两人特别细心照顾新收养的女孩，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的抚养她。

当他六岁时，继母照当时的习俗替她裹脚，这是使脚趾呈圆形，把脚跟与脚踝绑在一起的动作。

这种日益加紧的捆绑限制她的脚生长，使他一生蹒跚而行。假若和平是农村的女孩，她就可以免去这种束缚，因为福州农村早已不再有此风俗。他们根据传统，把男孩及男人的头发周围剃去一圈，中间的头发则结成发辫。虽然她每天早晨都因脚痛而泪流满脸，却从未有逃避的思想，因她现在是商人的女儿，有幸福的前途，莲花小脚是她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年林先生得了一场怪病，群医束手无策。有位林先生商务上的张姓上司，是美以美会的基督徒，他提议请美以美会的牧师来为他祷告，他们接受了建议，祷告得蒙应允。因他获得如此奇妙的医治，所以便开始寻求基督的教义。最后他们相信主耶稣，把丑陋的小偶像从房子正厅抛出去。林氏夫妇在工作地点附近的美以美会受洗，成为会友。因为教会很近，他的妾及孩子就都到英国教会聚会。最令林和平高兴的是，痛苦的缠足终于释放了，她能像从前一样自由跳跃。她学习唱圣诗，听圣经故事，她的心因这些故事得着安慰，她的快乐很快感染了她的小学老师，老师从她口中得知她家庭的故事，于是老师和师母也加入了教会。

有一位外国商人，在林家附近设立了小学，所有老师都是基督徒。和平被送到这个学校就读。1891年当她十一岁时，进入了美国美以美会宣教士所办的女子学校。在班上她一直是好学生，虽然偶尔信仰上会有失败，但借着悔改，她也经历神的赦罪和怜悯，而她的属灵层次一直停留在靠自己的努力的光景中。

当她生到学校高年级时，认识一位元从美国费城受训回来的中国女医生，名叫吴敬恩，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位女医生之一，和平得以在1895年到城里的宣教医院工作，这事引起当地女孩子的欣羨。次年和平十六岁，她请求老师替她接洽，让她也到美国学医。学校也暂时答应此事，所以她得到父亲的资助，与一位同学到上海中西女塾学习英语。这次从福州到上海的海上行程，使她非常兴奋。她抵达上海，看见街上许多车辆行走，包头巾的印度锡克族员警守在租界地，当时公园门口还挂着「狗和中国人不准进入」的牌子。

由于语言不通，她非常想家，但是学医的雄心使她留下来。她在学习上非常突出，然而也被这半洋化的浮华城市迷住了。不久她开始挪用父亲给她学音乐的费用，也用其它借口向父亲要钱，把自己打扮得更摩登。她自己说：「我在这儿学会许多今生的骄傲及肉体的败坏。」

每一种特别的遭遇，在神的计画中都有其独特的意义。一天，有一位年龄比她稍大，名叫余慈度的姊妹，到学校向学生讲道，余慈度受过良好的教育，如同这些在西式学校的基督徒一样。她在学业上有相当的成就，到英国受医学的训练，当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停泊在地中海时，神拣选了她，呼召她放弃前程，回中国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她找到沿途照顾她的船长，告诉他所发生的事。船长大发怒，以为她精神失常，但她坚持要他同意，让她在马塞港换船回到中国。她回到上海后，被不信的家人拘留，而她的热心并未减低。因她安静等候的见证，不久便使家人不得不相信这是出于神的手。从那天起，她便忠心为主作见证及教导圣经，她不接受外国薪津，只单单仰望主的供给，但她的工作更有果效。

听见余慈度亲口的见证，和平心中大为感动。她请余小姐到她房中，将母亲给她的珍贵金手环送给余小姐，但余小姐拒绝了，她不愿从一个年轻女孩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这使和平更确信她的忠诚，和平说：「从此我知道她真是爱神不爱钱财的人。」

十八岁的和平并没有听到神的呼召，却因环境的激变使她受到打击。母亲一直反对她去美国，且为她心中忧伤。当时福州倪玉成的遗孀，打发一个人来为她儿子说媒，和平的母亲很快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和平并不知道她母亲已经安排好将她嫁给倪文修的婚事。她接到父母命她回家的信，知道这种安排必须牺牲她做医生的梦想。当时还没有女孩子敢违习俗，反对父母的安排。她虽叫和平，有平安的意思，当时的状况真可说是「烦乱」。她非常痛苦且近乎绝望，在船行经岛屿遍布的海岸时，乌云笼罩她的心头，心中对视她为宝贝的母亲滋生怨恨，因她破坏了她美好的前程，现在生命中仅有的希望已归于破灭。

她一回到家中，便被叫去，给了她倪文修的相片及订婚饰物，从此她便要嫁给这位从未谋面的人。1899年她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进结婚礼堂，她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生趣的女孩，却要做新娘。生命对别人而言是自由追求理想的职业，但对她却是一个结束。「结婚，我真恨这个词！」

十月来临，是寒露的季节，十月十八日南台那位前任公理会牧师的儿子倪文修（他是即将在汕头上任的海关官员）与林和平（即富有、慷慨的基督徒商人的养女），在南台举行结婚典礼。这是个快乐且充满希望的日子，这对年轻夫妇在倪家住了两个礼拜。在那里倪老太太带着七个儿子与五个媳妇一起生活。这段短暂日子中，这位颇受拘束的年轻妻子，回想起她母亲的慈爱。她立下心志，如果她有媳妇，决不使她们受苦，像她在婆婆的家中一样！到了倪文修上任时，他们打点行李，出发往汕头，这也是自由日子的开始。

在双方新友的送别中，倪文修带着他年轻的新娘，乘坐舢板到十八公里外宝塔岛轮船码头。甲板上拥挤着许多乘客，他们的卧铺、行李、猪皮皮箱及各种家畜，都在一起，当轮船从浑浊的河道进入碧绿的海洋，旅程拥挤、不舒服的感觉，因着眼前美丽的岩岸而消失。经过五百公里的海上航程，他们终于抵达汕头。这是一个位于韩江口的小型岩石通商港口，虽然它较福州小，但它有富饶的腹地，蓬勃的贸易。倪先生终日效力于他的关税工作，这对青年夫妇在海关特区内定居下来。

1900年并不太平，远在北方省分发生义和团之乱，或称为义和拳，外人称为「拳乱」，他们杀害中国基督徒，演变成排外的暴乱。狡诈的慈禧太后，早已远走内地。她想利用此危险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颁布命令剪除所以在中国的外国人。所幸南方总督冒险遵守所订的「东南自保条约」，没有执行她的命令。福州城因为神的安排，在变乱时洪水冲毁了闽江大桥，因而阻拦谋害的发生。当汕头不安的情绪控制住，这时闰臣出生，他们因她出世而欢欣，视之为神的恩赐。一年以后 闰贞出世，更加增他们的欢喜。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压力，两个女孩的父母感到内疚，为何神让二胎还生女儿？他们都是单纯的基督徒，在重大的试炼中信靠神，传统的压力使他们屈膝在神面前，并将问题交拖给祂。

当他们再次回到汕头时，第三胎临产，这个父亲终于高兴的叫出：「是个男的！」。在这个小孩述祖身上，神听了和平心中的祷告。虽然她是个软弱的基督徒，但她守住了她的诺言，像哈拿一样，带着她心爱的孩子回到神面前，说：「这孩子就是我所祈求的，所以我要将、这个孩子 终身归给耶和華。」因此神为祂自己找着一个守望者。

### 第三章



## 蜕变的新生

往后几年倪家的孩子陆续增加到九个（五个男孩，四个女孩）。闰臣、闰贞及亨利（述祖就是柝声）后，就是乔治（怀祖）及三个儿子宣祖（只活到中学），过了一段时间又生了两个女儿天婷及天菁，最后是两个儿子，保罗（洪祖）及约翰（兴祖）。

倪文修是一位海关的初级官员，月薪三十五两，收入并不算高，他还必须把将近半数的薪水寄回给家中寡母。人口日益加增，必须常为生活的必需品有所预备，如食物、衣服及所住的房子。他们有便宜的新鲜蔬菜以及海产补助了米食营养的不足，因此孩子们成长良好且健康。他们的玩具非常简陋，都是当地陶器、竹子及纸做的，在圣诞节前后，季风增强时，他们便玩风筝。

林和平非常勤快，为了帮助家中的经济，她答应父亲的请求，帮助他在汕头出口贵重的抽纱及刺绣布匹。这是一种利润很高的买卖，当时在马来西亚、英国及美国都有稳定的市场。她丈夫因工作细心谨慎，忠于职守，受上司赏识而获晋升。经过几年兴盛的日子，他被转调到苏州，即上海西方九十公里的地方。由于布匹的买卖突然停止，家庭经济陷入紊乱。过了十二个月，在母亲怂恿下他回到福州，应征另一个新的职位，由于博得同情，他很快获得了工作。

在汕头时，他们夫妇开始注意孩子的教育，在礼节义态及练写毛笔方面都加以训练。一回到福州，他请了一位秀才（即通过科举的初试）为家庭教师，叫孩子们学习书法、文学及四书五经中的道德准则，这是二千年来中国道德文化的根基。自1905年开始，老式的科举考试废除，进入官场的门路被西方教育取代，但当时的小孩，尚得接受孔夫子的学说及教育。年轻的倪柝声在学习上比两位姐姐来的快，常常得到老师的赏赐。倪家人都爱好音乐，家庭教师教他们中国古调，和平亲自教导他们圣诗及圣经课程。后来丈夫为她预备了一台钢琴，自己也抄些乐谱供孩子们学习。

传统的中国父亲通常都以严治家，但倪文修的天性并非如此。他像自己父亲一样庄重持守，不喜欢责骂孩子，平易近人，就像他在公事、与朋友交往上，仍然保持中国男子的君子风度。在家中是妻子和平执掌刑杖，对他而言，纪律是家庭的光荣，她以威严来管束这些调皮的孩子。家中有一个规矩，每个人都要平均分摊家中的琐事。她把家整理得干干净净，每样物品都有定位，如果什么东西摆错了位置，没有一个人逃脱得了责任，谁在现场，就得把它归回原位。倪柝声身边经常留下一些杂物或打破的东西，所以常受到责罚。他的姐姐们有时因他受罚过重，也常替他认账袒护他。

他们很幸运，有另一张姓福州家庭与他们为邻，同住在南台岸边，可以远眺大桥，张付官是位很好的基督徒朋友，与他们父亲时有来往，两家儿女经常在一起游玩，张家两位大姐与倪家姐妹是好朋友，但小嘉莉（品惠）比柝声小一点，总是跟在他后头。在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倪柝声总是出注意带头，所以他成为孩子中的「老大」。

离他们家不远，有个热闹的鱼市场，那儿有座花岗石的古桥，上面铺着磨损的石版，连接到中州岛。还有座更长的万寿桥跨越北岸，并由一条拥挤的马路通到福州旧城门。旧城对孩子们可能太远了，近在身边的古桥便成为他们嬉戏的地方。在这儿他们可以看见做生意卖书画的摊子，也有替人占卜、选日子，或牙医在好奇的观众面前替人拔牙，甚至偶尔碰到满清衙门的囚犯，颈项上带着沉重的枷锁，

板上写着他的罪状。在岛的周围挤满了许多船家的舢板，他们为生活忙碌着，在拱桥下的小舟上，渔夫和他们的鸬鹚在捕鱼，每当鸬鹚捕到一条鱼，便得到一点食物，因为它们脖子上系着一个项圈，所以不会把鱼儿吞进腹中。

从码头到他父亲办公的南岸，孩子们可以看到近海的平底船，快速开往南台停泊地，他们的快桨上画着偌大眼睛，坚硬的棕色帆与蓝色的鼓山山麓相互辉映，所以孩子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样式。这儿的出口贸易非常兴旺，包括农产品、山上的茶叶及木材。但出口工业产品很少，仅限于丝绸、陶器及家庭工业，如油纸伞，红木枕头。这时的福州算是落后，因为整个中国在工业上有很大的进展。沿海城镇纺织工厂兴起，铁路伸入内地陆，外国工程师辛勤地开采国内的矿产。

倪柝声大约六岁时，倪家迁回福州，九岁时，反对帝国的革命运动肇始。当时旧城内住着浙江兼福建总督，他是满清皇朝的代表。鞑靼将军及他的闲懒旗人，带着浓装艳抹的女眷住在该城的特区内。拳乱之后，民生困苦，政府失信于民，所以有些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起来反对外人统治及西方的剥削，有更多青年到海外学习新知识，并带回革命思想。

当时他们心中目的英雄，就是为中国革新努力了廿年的孙逸仙博士。他出生于广东，信仰基督教，是中国革命思想的创始人。虽然他一再失败，但他为中国创建了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获得广泛的支持。他被迫流亡海外，因为满清政府仍为那些寻求自身利益的外国政府所支持。1908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崩逝，他虽然聪明但太懦弱，所以整个政权都落入老皇帝寡妻慈禧太后的手中。她是个阴险自私的人，皇帝死后第二天，她也去世了，很少人为她哀哭，但继承王位的是光绪的三岁的侄子，登基名号为宣统。

再过三年，帝国由于人为过失遭上天废除。1911年十月（即双十节）因搜查革命党的炸弹，湖北首府武昌发生革命，接着一连串事件，导致清帝逊位，开始民国纪元。

十二月孙逸仙博士从海外回国，在（南方首都）南京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他宣告成立一个民治政府。为了表明反对满清统治，他的拥护者开始剪掉辫子，这辫子是满清强制在汉人身上的标志。从此以后，福州的学童，不再于广场上彼此玩弄发辫。中国经过二千年的君主政体，龙朝的政体中心被充满希望的民主政治所取代。

孙先生与南方的革命领袖，急切盼望在中国塑造西方的政治体系，但北方有一人敌挡他，这人就是袁世凯，一位企图当皇帝的帝国将军。他用计谋取了总统之职。1913年8月孙博士被迫与南方沿海城市组织「二次革命」机构。

倪家非常靠近这个工作地点，孙先生的「爱国运动」打动他们的心。虽然倪文修是一位退休的官员，无法公开赞助，但他的妻子则不然，到处演讲鼓吹，并宣传她新发现的妇女运动，使女权得以伸张。她不顾周围的战乱，到处演说，自己先把首饰金环奉献给国家，所以有许多人跟随她。为了加强联络力量，她组织妇女爱国会，以地方首长夫人为会长，自己为总干事。1913年孙先生到达福州，和平被官方委派为总统的接待员，加上孙先生的私人秘书宋女士是他上海中西女塾的同窗，所以，她自始至终陪伴他们环游全市四天，并赴各机关会宴。

这时倪柝声只有十岁，由于孩子的好奇心，他喜欢听有关政治的谈论。革命的确带给这个国家一个新希望，由于亲西方的情绪开始普遍，使基督教宣教工作迅速扩展，也带出他到外国留学的门户。

但一年以后欧洲发生战争，西方和平幻灭，国内革命几乎流产，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日本也借着参战入侵，于1915年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条，公开要求瓜分山东省，因此把中国变成傀儡。那年袁世凯宣告民众喜欢复辟，因此恢复龙朝，但却注定他羞辱的下场。

1916年十三岁的倪柝声满怀希望进入英国行道会（C.M.S.）的初级中学，接受西式教育，他按部就班进入圣马可高中。这所高中是属于安立甘教会在南台岛设立的福州三一学院，包括小学、初中、师范、高中及神学院五大部，将近有四百名学生，这儿的教师和职员，主要是从爱儿阑都柏林三一学院来的宣教士。

他在学校的成绩每学期都名列前茅，偶尔因生病而成绩退后。他像其他学童一样，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倪述祖」，以红墨水印在书本及手边的纸上，这是盼望有一天能得好运的记号。在行为上，他是一个正直、有正义感的人，也以此沾沾自喜。有一次一个小贩到学校报告，说倪柝声因正义的热心，将偷瓷器的小孩指认出来。他对男孩子的团体运动，如篮球、排球及足球，没兴趣也不热心，但他身体长的很快，成瘦长形，比他的同伴都高过一个头。

他很快学会北方话，就是西方人所指的「国语」，现在正式成为全国百姓的通用语言。他早年所学习的古文，仍然留在守旧的教育制度中。但现在中国正掀起巨大的文化复兴风潮，为了一般大众的需要，一些先锋作家及诗人，转用新的语体文，来写本地话的通俗小说。1922年教育部核准，把全国教科书重新用国语改写。这项改革使以后几年在以文字传达思想上，产生极大效率，因而帮助了基督教思想的传播，得以进入广大的圈子。

然而宗教信仰在学生当中并不受欢迎。1918年一次反宗教运动，藉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而升高。他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一位最具有影响力的教育思想领袖。他的运动在1922年，产生一个反宗教大联盟，随后导致反基督教运动，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有一个五四运动，也值得我们注意。由于第一次大战胜利，中国希望借着1919年凡尔赛条约，收回割让与德国的山东省，但是，当时山东被英、法转让给另一个盟国日本。许多中国青年因为政府无能，出卖国家感到愤慨。于是1919年5月4日在北平发起青年保国运动，随即学生在上海、福州罢课，同时产生一个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1920年因为苏联政府宣布放弃对中国领土的要求，更助长了这个思想的进展。

这时倪柝声正十六岁，很容易感受学生运动的情绪。他刚完成初中教育，要到圣马可学校读书的计画，便受到这些情绪的搅扰。例如，北方军阀的零星争门，由于粮饷缺乏，军队开始重视抢夺，一些同学从乡下回来，带来百姓暴乱及农民受欺压的悲惨故事。

家中的事也使这个成长中的孩子从迷梦中清醒，母亲所介入的团体，对他们逐渐失去吸引。福建政府为了嘉勉她政治上的热心，孙道仁都督特为她上呈北京政府，蒙允授与二等爱国勋章。她得到这份荣誉后，爱国热心反而消退转而追求自己的名誉及地位。社交娱乐占去了上教堂的时间，「此时我与不信的人接触，成为一个无信仰的人。」每天有些名人女士到南台家中玩牌、打麻将。有一天牧师来请她为圣工奉献，她调侃地回答说：「你且坐下，看着我是否能打赢，如果赢了就奉献一点给祂。」她连基督徒敬虔的外貌都丢弃了。

和平过去管教孩子，是公正无私的，但这时却显得不耐烦、不公正。1920年1月的某个星期天，她一件宝贵的装饰品打碎了，和平怪罪倪柝声，要他承认，但他拒绝承认，于是她就把他通打一顿，

伤害了他的自尊。后来虽然发现他是冤枉的，但她仍毫无悔意，只不过平息儿子心中的怨气。第二学期，他伤心地回到学校。

就在那个月，他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余慈度姊妹来福州举行两个礼拜的新年布道，这位姊妹是她早年在上海非常佩服的人。这时余姊妹已是中国北部及韩国很有恩赐的福音巡回布道家，并且她在上海也创设了一所圣经学院。和平与 1898 年曾被感动送她一件礼物，后来一直没再见过她。聚会前一天，她请余姊妹到家中吃晚饭，并邀请牌友作陪，饭后她说：「明天早上余姊妹要在天安堂讲道，请你们都去。」她们说：「你呢？」她回答：「我当然也去。」

2 月 15 日第一次聚会，和平和朋友们准时到达会场，坐在前排。余姊妹小脚上穿着一双锦缎绣鞋，坚定地站在台上，宣读神对夏娃说的话：「你们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她头两天借着这些话，讲到「与神隔绝的属灵死亡」，聚会满了属灵的能力。但这个题目，和平听得不耐烦，因为她从小就知道了，于是决定只参加两次聚会就够了，她的朋友都抱怨糟蹋了两天打牌的时间。

所以第三、四天，她又同牌友玩起麻将，她们照旧兴高采烈。但她心中非常痛苦，和平回忆说：「当时我坐在那儿玩牌，好象一个死人，我知道神的圣灵在对付我。」折腾了两天，她突然向她们宣告说：「我是基督徒，余姊妹不远千里来讲道，我不去听真是不尽人情，明天我不；来打牌了。」

第二天余姊妹见她来，立即上前问候，无意地问她：「这两天你到哪里？」她编了一个谎说：「我不舒服。」余姊妹慈祥地看着她：「愿神光照你，祝福你的病快快好。」这句话打动了她的心，生病和打麻将相差是何等的远呢！自己多诡诈！在整个聚会中，她一直躲避传道人用手指着她说了许多扎心的话。她已四十多岁，又是一位有名气的人物，不能忍受任何人如此斥责，这次聚会几乎成为她最后一天的聚会。当余姊妹问她：「你明天还再来吗？」她怎能再为自己找借口？但第二天她再来时，神又责备她，这时，祂的仆人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苦，她说：「余姊妹好象完全为我一个人讲的，感谢主，每天都有一种力量把我带到聚会中。」最后她终于向她承认自己的需要，并感谢祂的怜悯，祂的恩典终于得胜了。

她丈夫去了几次聚会，不禁奇怪地说：「别人悔改总是高高兴兴的，你参加后聚会，几夜不能睡，饭也吃不下，什么都不做，总是哭哭啼啼的，以后不要去了。」她说：「你不知道我心中的事，我犯了罪向你撒谎，从前你给我家用的钱，我还拿去打牌。」她将以前得罪他的地方都向他承认，接着她丈夫也向她认罪，于是二人双双对泣。「和平」的含义终于进入她心中。从那天开始，她不在碰纸牌及麻将了。

也有一些高中生参加余姊妹的聚会，和平带着重新寻着的喜乐，担任余姊妹的翻译，把她的北方话翻译成福州话。由于倪柝声早已受到朋友不可知论的影响，加上看到基督徒失败的见证，他没有去参加这个聚会。虽然母亲邀请他参加，但他像母亲一样倔强，不愿去聚会。这怎么办呢？现在她被迫来到抉择的关口，她知道必须向大儿子承认过去不公义的罪，但她的骄傲使她无法低头谦卑，何况孔夫子不也讲过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吗？

于是她决定以别的方式进行。她拿三块钱去买诗歌和圣经，重新开始家庭礼拜。第二天，她正要弹琴唱第一首诗歌，神的灵抓住她，她知道若要公开敬拜神，就必须向儿子认错。她就说：「但是神啊！我一个做母亲的，怎可以向孩子认罪？」但神却清楚地说：「非认罪不可，这是唯一的道路。」

她丈夫及孩子们困惑地看着她，突然她转过身来抱住大儿子，流泪地说：「我为主耶稣的缘故，向你认那次因生气打你的罪。」大儿子照实说：「你那次无辜打我，我心里很恨你。」她看着他说：「求你赦免我。」但他默然不应，转而走开。家庭礼拜继续进行。

就在那晚，神抓住了倪柝声。他深深被母亲的认罪打动，他从未听说有一位中国父母，会做出这种丢面子的事情。他母亲能有如此转变，必定受这位远道而来的传道人的影响，基督教败必定不止是教条而已。他愿自己去见识一番。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母亲说：「我已经预备好，要去听余慈度讲道。」那天他去了。在讲道中，他进入悔改的光中，发现耶稣基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救主及朋友。在一次青年奉献呼召中，他向神许愿要终身侍奉祂，决不反悔。神也因此将生命放在他心中，这生命整个改变了他一生。几年前祂垂听了母亲夜晚的祷告，所以祂履行这个约定。

我们能否看见神的手在这些事上的安排？我们看过士大夫的空谈，已经充塞中国人单纯的思想，就在这时，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十年的青年完全悔改了。而且成为赤祸洪流中的中流砥柱。

## 第四章

### 全有的奉献

当倪柝声十八岁时，他转向耶稣基督，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后来他告诉一位亲近的朋友说，在余慈度姊妹聚会的那几天中，他曾仔细衡量奉献的事，认为这必须是全然摆上，不然就毫无意义。耶稣的门徒岂不是「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吗？（路五 11）他看出重生得救，就是一生一世顺服那位掌管万有的创造者。

为何不奉献呢？在旧城的瓷漆街上，有位无名的雕匠，他已花了六年的时光，才做完四扇屏风中的三扇，把白花浮雕在黑漆的木头上。他每天的酬劳不过是八十分钱，无论是晴天、雨天、或假日，他的老板都是同一待遇，加上米饭菜蔬，及一张睡觉的硬板床。虽然他有这等雕刻技术，但可能只做了两个这种屏风，眼力和精神差不多不管用了，因此他被解雇沦为乞丐。如果我们能不吝惜把天然的才赋，花在这么一个贪婪苛刻的雇主身上，那么有什么东西是配得归还给这位赐下独生子的神呢？

不久，倪柝声便经历了保罗的话：「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罗六 13）他说：「由于神对我的要求，我认为自己所有的才智都属于主，我不可浪费一分钱、一个小时及任何心智、体力，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而是祂的。这个发现对我是一件大事，从那天起我开始了真实基督徒的生活。」

接着他就学习要纠正一项错误，因为学校有一门费力的科目，就是圣经课程，因为倪柝声漠不关心，所以成绩一直不高。他并未受到高年级反宗教情绪的影响，只因他是出自基督徒的家庭，他不愿意在教会学校使基督徒家庭的名誉受到讥嘲，于是他在考试前把答案写在手掌上，当时衣袖很长，可以将手掌盖住，不会被人发现，结果他得到七十多分的成绩，因为这项成绩与其它科目成绩差不多，所以没有引起老师的怀疑。

当他重生以后，他立即放弃这种行为。因此虽然尽力去读，但成绩却未能超过七十分，他知道若不认以前的罪，神就不能帮助他，他为此犹豫了一阵。校长曾警告过，若有任何一位学生作弊就得开除，而开除就等于失去了大学奖学金和出国深造的希望。（在三一学校的最后两年课程，等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年级的程度）所以经过一番挣扎，他决定拣选耶稣基督胜于他的前途。他去见校长，将他所做过的事供认出来，并告诉校长，他之所以要认罪的原因。令他非常感恩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被开除。

在倪柝声归主三个月后，余慈度小姐再度访问福州。她是从厦门北上，向三一学校的女学生讲道，再一次又有许多人归向基督。此时，这地区正受到战争的搅扰，因着南北势力的消长，在乡间及城市时常发生间歇性的战斗。5月5日，高中生参加一项为纪念1915年日本所提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的反日本游行，第二年因为局势不稳定，学校的课程无法按部就班地教授。

看到这些情形，倪柝声觉得必须重新调整生活的方向，因此神秘地失踪了。他的同学不知道他到那儿去了，同时他的家人也保守这个秘密，直到他回来几个月才说出来。原来他坐船去了上海。这时上海因着约翰杜威（John Dewey）、巴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及泰戈尔（Tagore）的到访，正兴起教育的新思潮，在学生心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但他的目标并不在此，而是到余姊妹的圣经学校接受一年的圣经训练，为要解决他读经上的困难。他虽然尽心努力，仍然得不到更好的老师指导，但他从余姊妹身上学习完全仰望神的供应，就像余姊妹一生所行的一样，她告诉他要让神的话语在他心里，而不仅仅是记忆在头脑里。

当他回家是时，母亲以坚定的口吻问他说：「现在回到三一学校完成你的学业。」他遵命而行，因为课程分量的减少，所以他几乎没有困难就赶上。

倪柝声是转变了，不在浪费片刻时光，专心于学校的功课。同时也列了一张班上同学的名单，开始逐一为他们祷告，并抓住没个向他们做见证的机会。因他随身携带一本圣经，同学戏称他叫「圣经仓库」，但他仍旧继续研读，以求明白圣经的内容（他告诉我们，他曾定意每月要读好几遍新约）。他热诚的随时预备向每一个人传讲圣经中的信息，由于他生活的改变，敬虔的生命加上动人的微笑，渐渐引起同学的兴趣。

有一位名叫王峙的学生，他是从广州海军学校，转入三一学校六年级倪柝声的班上。他是最早加入倪柝声在学院礼拜堂非正式的学生祷告会。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倪柝声在班上谈道工作，才在看到结实的果子，有好几位青年悔改，并得着新生命的喜乐。其中为首的有从沿海连江的古田坐船来求学的缪绍训、陆忠信及魏光禧。

他们不以在学校做见证为满足，有一群高中男生开始利用主日、节日及学生偶而罢课的时间，把福音带进城里。他们沿街敲锣唱诗，并向民众宣讲永生救主的佳音。如此更加增了这城里原本就有的嘈杂声，如鼓声、爆竹声、猪的尖叫声、小贩叫卖声、苦力喧闹、送葬仪队的哭叫声等等。所以没有人介意他们制造出的声响，他们手拿单张及标语牌，海报用大字清楚写着有关得救的方法，贴在广场墙上，与色彩鲜丽的红鸡牌香烟广告、大肆宣传的煤油灯、华丽而庸俗的蓝色老虎壁画相争（这些老虎是在南方福清业林，令山上居民恐怖的动物）。中国文字是直写，可以写在广告版上，所以他们有了一个的构想，做了白色棉布背心，用红笔写上福音信息，如：「神爱世上的罪人」「耶稣基督是永生救主」，于是两岸的村民都感觉到这群基督徒中的灵性的复兴。

这时，倪柝声在马尾找到一位同教会的属灵姊妹，她后来成为倪柝声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当他从上海回来在马尾登岸时，余慈度姊妹介绍他去认识和受恩教士（Margret E.Barber），和教士以前是英国传教士，现在自立传道，她生于英国东部撒弗洛克州的毕生毫。于 1899 年随英国行道会的人来到福州，她在女子中学教了七年书，在宣道记录上，她是一位热心、努力的工作者，并且具有相当才华。1909 年当她回英国度假时，她感觉到神向她挑战有关她受浸为信徒的事（她以前是受点水礼），她为此到挪维奇的 薛雷教堂去见潘汤（D.M.Panton）先生。她的主教知道了这事，便写信给她，劝她不要再去福建。虽然如此，她在四十二岁时因着薛雷教堂信徒的祷告，以及自己仰望神的供给再次回到福建。

她与中国自由传道人李爱明同工。为了不使她以前在南台的同工为难，她度过马尾罗星塔的渡口，在白牙潭以廉价租到美国公理会退休传教士的一栋平房。不久，在这里又加入一位从英国来，比她小二十多岁的黎教士（M.L.S.Ballord），这个地方成为她日后事奉的基础。

她们两位在当地妇女中，忠心工作有十年之久，偶尔也向男人传福音，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她们就到福州城在市场里分发福音单张。她们深觉自己是单身女教士，受到性别的限制，又处于一个广大属灵黑暗省份的门口，如何能应付福音的需要？当她回福州的第一年，虽向邻近佛泉山庙里的二师父作了自己受浸成为基督徒的见证，而这庙是以藏有佛牙而著名，然而传福音的行动如凤毛麟角。要使以农立国的中国归向基督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她告诉自己说，除非神自己从中国各地呼召拣选一些青年男女来工作，否则不易有果效，她们开始为此恒切的祷告。

1921 年的一个清早，一艘中国军舰停泊在白牙潭，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上岸，当他路过海关时，她被传教士住宅中的诗歌所吸引，于是上前拜访。他就是福州倪柝声的同学王峙的大哥王载。他是从烟台海事学院毕业，被分配在南京的一艘舰艇上任职，就在那里他很奇妙地归向耶稣基督。他当时是二十三岁，并且决定放弃军职，成为全时间的福音工作者。就在她们传出诗歌的门口，神赐下应允这两位女教士的祷告凭证。

王家住在南台岛靠近河边的岐山村，房子在山坡上比倪家高一点，所以王载很快与倪柝声及其同学联络上。当他从船上辞职回家后就以此地为福音工作的据点。他在服事上很有恩赐，而且年龄稍长，经历也比较丰富，因而大受学生的欢迎和敬佩。

因着神在倪柝声母亲身上转变的工作，倪家也成为一个新运动的中心。这为曾在政治上活跃的人物，而今转变为基督的见证人，足以耐人寻味。由于她简洁有力的见证，及灵活的运用圣经，倪女士便被一位美以美会的牧师邀请，到福建北部各地向妇女作见证。借着朋友们的帮助，她的白话更为流利，使她进入更广的工服事。她紧紧地跟随主，在凡事上寻求祂的旨意，常常简略地记下自己的言行，警觉地改正自己的缺点，所以神明显地在她的见证中赐下荣耀。虽然她常离家远行，同时也察觉到家中的需要，一个炎热的夏季里，她在福州女青年会，参加了两个礼拜的聚会后，因为急需休息，她拒绝了继续事奉的邀请，并感觉到神正提醒她有些事要临到她的家里。当晚她回到家中，与丈夫在屋前的水边散步，眺望河中来往的舟筏，她有感而发地说：「今晚这么干燥，我怕会起火。」初更时分，它们被四周呼声喊醒，猛烈的火焰随着劈啪爆裂声从竹子及茅草编织的房顶冒出，并沿街而窜。他们祷告神，她从神得着应许的确据，他们的房子必不会被波及，她不需要叫醒最小的孩子。的确，风向转变吹向北方，火焰烧毁了十二栋房子后，就在她们房子隔邻的第三间停住了。

倪文修对神奇似地眷顾大为感动，七天以后他们在炎热的夜晚乘凉的时，他的妻子又担心另一场大火，他却大为不快。然而清晨四点起了一阵喧嚷声，火势比上次更凶猛，阵风助长了火势，火焰从桥边的市场向北延伸，她丈夫问她：「你看这回会不会烧到我们家呢？」她祷告一会说：「可能会」。于是他们先叫起大的孩子，然后匆忙地打包及收拾贵重物品。就在这创世纪第十八章忽然进到她心里，想起亚伯拉罕为所多马的祷告不够彻底，（她觉得）神似乎在责备她：「你为何不祷告呢？」所以她停下工作，再次屈膝向神祷告说：「神啊！在福州这地区只有我们这一家是信主的，请给我们一个见证，免得不信的人对我们说：如今你们的神在那儿呢？」她立即得了确据，「虽然千人仆卧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九十一 7）她把从神领受的话告诉了丈夫。但此时火焰被风吹逼迫近他们，他为着她的安静不动严厉责备她。然而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城里的消防队因为桥头被烧毁的房子被阻塞，所以离开水边退到他们面前，他们的房子成为救火的总部。由于他们熟练的技巧和风向的转变，加上一些雨水，使大火止于他们住宅前两户之外。一周内的两次大火，使这栋靠河边的房子，在灾难中奇妙地保存了下来，这么奇妙的神迹怎么不使这家人大有信心呢？

日后的某天，和平聚会回来，她知道有两位女士从白牙潭来找她。在此之前，她一直没有见过和受恩及她的同工，虽然她知道倪柝声和同学们经常到宝塔渡口查经，但自从听见余慈度姊妹回上海前在河里曾接受她们施洗，她就一直避免与她们见面，和平觉得这样对她的奋兴聚会有所妨碍，因此毫不犹豫地公然反对这件事。

在复活节的前几天，倪柝声向她说：「敬爱的妈妈，明天开始我有三天假日，我要去参加和受恩的查经班。你要不要和我去呢？」她回答：「等一会儿，我要祷告神。」她上楼跪着祷告，然后坐起来梳理头发，当她祷告时，她觉得神对她说：「去吧！还要受洗。」她在很小的时候和她母亲一同受过洗（点水礼），现在神要她公开做这件她强烈反对的事，重新肯定她成人后的信仰，明显地这是出于神，不是别人强迫使她有如此的行动。她记得当耶稣受洗时，神的话临到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太三 17）经过一番思考，她下楼呼唤倪柝声：「我已决定跟你一道去和教士那儿，我还要受洗。」他立刻回答：「我也是为受洗去的。」

对倪柝声来说受洗不再只是顺服的问题，而是对神持守无愧的良心。他读到新约中保罗把受洗与基督的死联在一起；彼得则将受洗与神的国度相联。她同时也发现在这两个敌对的世界中，一个是这世界的王，一个是生命的主，人们无法事奉两个主。他知道他必须以这中公开的方式表明与世界的王完全绝裂，交托在另一位的手中。他说：「我要从撒旦统治的国度中出来，不再属于这世界；我定意顺服神的心意，进入神在基督里为我预定的永远计画中，从世界得释放，进入祂的拯救。」

听见母亲和兄长的计画，倪柝声的弟弟乔治也表示愿意受洗。于是第二天早晨，他们三人乘船到马尾。和教士很高兴地接待和平，说：「你们吃过饭吗？你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她听见和教士的话大吃一惊，因为没有人告诉和教士这个消息。但神早已告诉她关于受洗的事，因为自从余慈度告诉她关于倪女士的事后，她们就不住地为她祷告，直到现在她们一同跪下感谢神。

复活节主日，他们到白牙潭河边，水流平缓，那天是阴天飘着细雨，减低了他们的兴致。当天早上和平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和教士建议改天受洗，但她坚持说：「我宁愿死在神的旨意中，而不愿照自己的意思活。」她说着就与年纪老迈的传教士李爱明走进了闽江的浅水里，她求神给她一个喜悦的明证。



李爱明把她浸入水中，正当她的头浸入水中时，复活节主日的阳光破云而出，因此倪柝声与乔治也沐浴在金色的光辉中。

借着受洗，倪柝声站着宣告说：「主啊，现在我将世界丢在背后，你的十字架使我与它永远的分开。并且我已进入你的里面，我现在是站在基督里。」他们心中充满了喜乐的诗歌，回到聚会的大厅。

## 第五章

### 穿越和田

这时王载与倪柝声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事奉，他们有着共同的负担，就是将福音传给城内的青年男女，当地的学校及学院的学生。继续在街头布道，并且扩展到临近的村庄。他们利用中国农历年的长假，用一部分的时间来传福音；一部分则用来聚集分散在各处的信徒，帮助他们灵性的增长。在造就的过程中，倪柝声殷勤研读主的话并结出果子，不久他显出具有特殊的解经恩赐，常给听者相当大的帮助。

当时王载的家里有一间大房间，足以供给聚会之用，一些人便聚集在那儿祷告、读经。1922 年的一个主日晚上，王载和他的妻子，倪柝声以及他的母亲，四人一起在王载家中擘饼纪念主。他们在这种没有祭司及传道人服事的聚会中敬拜神，得着喜乐与释放，所以他们经常开始这种擘饼聚会。几个礼拜后也有别人加入，包括缪绍训、王峙、陆忠信、以及一位海军退役军官王连俊（与王家没有亲戚关系）。

1922 年底，有一位女士来福州布道，她也是这故事中的重要角色。李路得（李渊如）姊妹是天津人，虽然身材矮小，却心里火热，是当时南京学院的一位教师，她一度曾是顽梗不化的无神论者，同时也是陈独秀所办「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她到南京就任政府的一所中学校长时，曾自夸说：「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成为基督徒，我也永不相信！」她知道有些女孩们热心宗教，便搜出几个学生所读的新约圣经当众烧毁。然而有两位学生与一名叫蔡苏娟的兼课老师，一同为她的悔改祷告。有一次学校因为鼠疫而关闭，李渊如便与一些学生取道运河回他们的村庄。在这次平静的旅行里，当他们穿过初春的麦田，李渊如面对面遇见了创造万物的神，一种新的饥渴在她的心中燃起，于是她私下偷读圣经并得到满足，最后她发现基督耶稣是她的救主。后来她辞去政府委派的职位，到差会工作，成为一位全时间的传道人。

由于王载弟兄在南京悔改时，曾遇见过她，所以就邀请李渊如在他家参加四天的聚会。这是一次值得回忆的聚会，家中挤满了男女老少，蒙神大大赐福。其中一位学生陆忠信也有了灵里的转变。他两年来一直参加余慈度姊妹的聚会，心中渴慕遇见神，于是跟他们在一起追求，但他得救的确据，却是在李渊如姊妹如火焰般的信息中得到的。其他的人也在这次聚会中遇见主。当这位元特别讲员离去后，基于需要聚会再延长下去，所以当他们在街上请人进来听福音时，便由王载、倪柝声、王约翰几位弟兄，每晚轮流向日渐增加的群众传讲基督。

那年冬天特别冷，山顶上积满了白雪，这情形在福建沿海是罕见的，人们都抱紧怀中的灰炉取暖。缪绍训必须翻过海岸山脉回到五十公里外的连江家中，度短暂的假期。他回家不到一个礼拜，便接到倪柝声的一封信，上面写着：「紧急通知，神在此行了一件大事，我们需要你来说明，请速赶回。」虽然天气异常寒冷，敌方的军队也在附近城镇活动，缪绍训还是立即冒险翻山越岭赶回福州。

圣灵的工作，令他大为吃惊，许多男女学生为自己的罪悔改，并相信了主耶稣，福音大大地被传开。因着圣灵所赐的喜乐，及谦卑的感恩洋溢在他们中间，倪柝声也定意更新自己的奉献，单单跟随祂。他用「在地如同在天」这句话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聚会每晚继续，且大有能力。在学期间，每周末及下课后，都有聚会。青年们成队穿着福音背心，手拿福音旗，宣传「耶稣近了」、「来信主耶稣基督」。他们带着乐器出去，召集群众入内，聚会地方很快就暴满了。日子过去，他们的热心更为增长，并且需要更大的场地。于是这群青年就集资在青山租了一间屋子聚会，摆上粗制长板凳为座位，缪绍训及倪柝声则搬进去住，以便在课余时间帮助慕道的人。每天晚上是一群男生放学回来自己煮饭洗衣，然后出去传福音。他们更有异象到乡下作见证，例如，五月端午龙舟竞渡的假期。当学校一放假，青年们便出发上路，人数大约有六十到八十左右。他们走过花岩石所铺的马路，穿过稻田蔗园，农夫都穿着蓝布衫，无休止地踏着叽叽作响的水车，或跟在水牛的犁后，在深泥中操作。他们在路上或在休息的茅屋内，遇有识字的人就给他们福音小册，各阶层的人，从有知识的官员到苦力、军人，都是他们交谈的对象。这些青年都是经过「训练」的，所以他们能应付各样的听众。当他们到达所预定的村庄时，便在借来的教堂内住宿，腾出一个地方作为「不住祷告」的场所。并在这里轮流维持二十四小时的守望祷告。晚上当农人从田里回家时，他们便分队出去穿过街道，请村民来听福音。

缪绍训认定倪柝声是这布道的策划及领队。因此当他站在唱诗的队中，并帮助那些缺乏个人谈道经验的人时，他总是常常关心这些奉献者的未来前程，并为他们的奉献感到兴奋。为这缘故，他坚决主张不传福音时，要从事有计划的圣经课程，使他们明白神的计画，并接受来自神更高标准的训练。

为着自己灵性的更新，他决定到白牙潭，参加英国女教士所带领为数二十多位青年男女的查经班。和受恩教士带领大部分的教导，她的服事从那时到如今，确实结出了许多果子。倪柝声发现他自己越来越看重与她的交通与友谊。有一天他受邀参加那里的祷告会，他发现她陷入与神争执的痛苦中，神向她有所要求，虽她深知该如何做，但是代价却是那么大，她无法将自己摆上。他听见她恳求主不要放弃祂的旨意。她说：「主啊！我承认我不喜欢它，但请你不要为我放弃这件事！」她所求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主啊！求你稍候，我定会向你降服。」她如此的敬虔，以至于他认为这位传教士是值得把自己的问题带到她面前的人。

弟兄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没有隔阂产生，由于向神热心及奉献，倪柝声不能忍受一些不公平的事。他回忆说：「在早期的日子，我已定意不靠自己行事，因此看起来似乎长进得很快。那时有一位比我大二岁的同工，我们总是意见不合，不仅如此，我们的争执都是公众的事，所以我们争论也是公开的，我就这样告诉自己：『如果他一味地坚持，我就要反对，因为那是错的。』但是尽管我反对，他决不更改。我一直在对与错的判断上与他争论，而他总以年长的理由与我争论。他在每件事上，皆以他比我大两岁做为决定的理由，这事实在我无法反驳，所以他一直占上风，我非常不满他的无理，心中也不

肯降服。」

有一天倪柝声把他满腹的牢骚，带到和受恩教士面前，请她评论到底谁是谁非？但她是认识神的人，心中恨恶骄傲及嫉妒。她不管事情的对错与否，而是安静地回答：「你最好照他所说的去做。」倪柝声完全不能接受，他抗辩说：「如果我是对的，为何不说他错呢？如果我错了，我便应该听他的，我为何几事都要听他呢？」她回答说：「因为在主里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倪柝声当时还是高中生，还不太知道自制，所以一再发泄自己的困惑与不满，他反驳说：「听从神是没错，但若是年幼的对，年长的错，难道也要年幼的顺从吗？」她只是笑一笑，又说：「你最好照他所说的去做吧。」

这个症结，使他们属灵复兴的日子蒙上了一层阴影。1923年春天，他们为一群重生的青年施洗，这对弟兄们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倪柝声指出：「在一块异教之地，任何人转向基督，受洗的确是件严肃的事。」面对这种严肃的场面，他们因着他坚决的口气，知道必有一些事要发生。他们中间有三人个负责此事：倪柝声、那位比他大两岁的弟兄、另一位比他大七岁。这次他到要看看，他们的讨论如何进行，那位一直夸比他大两岁的弟兄，是否也会顺服比他大七岁的弟兄？他们聚会商讨，但那位弟兄还是不顺服，他否决了年长弟兄每样的建议，最后他解散会议，还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把事情都交给我，我一定会办好。」倪柝声心里抱怨道：「这算什么道理？」

这受洗大日的确是他们服事历程上重要的时刻。有十八位青年，主要是男学生，很喜乐地在河边，公开作见证表明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他们也向围观的群众传福音。受洗后，倪柝声又带着他的问题找和教士说：「我真气愤，这位弟兄难道不明是非么？」她是待己非常严格的人，所以她能耿直地对待别人，于是她站起来两眼注视着他说：「你到现在还未看出什么是基督的生命吗？你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吗？这几个月中你一直坚持你对，你的弟兄错。」她继续说：「但你是否想到，当你论及这事时，你的心态是否正确？你对是非的判断可能非常正确，但你里面的光景如何？你里面的生命难道不抱怨你的行为吗？」自从揭露倪柝声的光景后，她摸着了他的伤处。他哑口无言，因而不得不承认，按常理他是对的；但圣灵在他里面，却指出他的态度错了。

和受恩教士常常用这种方式责备倪柝声。但有一天她对陆忠信弟兄说出她的观感：「倪柝声将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传道人。」在他以后的年日，他一直受到和教士教导的影响。他说：「我永远怀念她，她是一位发光的基督徒。每当我一走进她的房间，我立刻能感觉到神的同在。那时我非常年轻，有许多的工作计画及腹稿等候神的批准，许多事我想只要付诸实现，必定会带出奇妙的果效。当我带着这些计画到她那儿，试图说服她，告诉她事情应该如何做。但在我未开口前，她平淡地说了几句话，我便得了光照。我自觉惭愧，因为计画全出于天然，充满私意，但这儿却有一个人单单为神而活。我不得不求神说：『主啊，求你教导我行走在这条路上。』」

大约这时，她介绍他看盖恩夫人（Jeanne de la Motte Guyon）的传记（1648——1717）她是一位法国奥秘派信徒。为了信仰被路易十四囚禁在巴士底监狱。盖恩夫人在著作中提到默然顺服神旨意的心志，使他大受感动，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思想。这本书使确认看不见的事物才是永远的。另外他从和教士的书架上看到像潘伯（G.H.Pember）、罗拔高特（Robert Govett）及潘汤（D.M.Panton）著名的末世论等著作，主的再来对他成为一幕真实的景象。所以他努力预备主的再来。陆忠信弟兄回忆当时他热心地讲解但以理及启示录两本书，产生很大果效，他的听众从心里燃起愿付任何代价，以预备迎接主

的再来。

但他并非凡事顺利。这时他清楚神的指示，在学院的假期中，他要到一个海盗出没的海岛上传福音。他为此心中有很大的挣扎，但他非常看重这呼召。然而当他顺服后，神却没有任何下一步的动作，经过长时间的祷告，他决定走一趟闽江口的一个海岛。他很高兴当地民众乐意接待他，经过一番波折，他租下了一间房子，整修后，日用品也样样齐备。他这个计画得到弟兄们的回应，并且有一百多人为他祷告，奉献生活所需的费用。起初他的父母并没有反对这事，然而他打点行李准备出发的前五天，他们突然介入，并阻止他前往。房子已经预备好，钱也付了，神的旨意在他的心中燃烧，他要怎么办呢？他的父母说：「不行」，而神也说：「要孝顺父母」，在极度沮丧下他寻求神的带领。神告诉他说：「是的，这事是我要你去的，但另一方面，当你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成全时，我便不喜悦。现在我要你顺服你的父母，所以你只有等候，让我以别的方式为你开路。」令倪柝声困惑的是，他没有理由可以向人解释他为何要改变计画，名义上说他父母阻止了他，但是他说：「所有的人都误会了我。」最令他难过的是，有人对他说：「这事以后让我们很难再相信你了。」

他为这事曾思索了良久，并十分痛苦，直到有一天他读到马太福音，耶稣说到关于纳丁税的话：「……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绊倒他们，……可以拿去作你我的税银。」（太十七 26-27）刹那间他感觉到（但）这字的份量，他明白了。甚至主耶稣自己也曾为了不叫被人绊倒，而容忍别人侵犯祂的自由。几年以后，他才能在十字架的亮光中，客观地解释这个经历。我们可能清楚无误地明白神的旨意，但是祂为我们预备完成祂旨意的道路往往是间接的。「因着我们说『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自我』便得到喂养，这样会使我们认为：在地上不该有任何事挡在实行神旨意的路上。然而有一天神允许有一些事拦阻我们的道路，为着就是要对付那中态度。就像基督的十字架一样，它不止除去我们的自私念头，也炼净所有的事物，包括出于我们向主的热心及爱心，这真是叫我们最难以领受的。」那时他真是受不了了，他感到对他父母的愤恨，并且大大地埋怨，经过一段时间他才能领悟并胜过这些事。

他问和教士能否借他关于「十字架」信息的书，她说：「有的」，她虽然有两本，但她现在还不想借给他。她宁可再等一些时日，等他成熟到可以理解时，才借给他。他说：「我当时无法明白其中原因，我渴望得到这两本书，所以用诡诈的方法从她那儿问出了书名和作者，而不让她察觉我的意图，然后写信给宾路易师母，她就把这两本书当作礼物送给我，还写了一份鼓励的信呢！一本是十字架的道路（The Word of the Cross），另一本是加略山的十字架（The cross of Calvary and its Message）。我非常仔细地研读，虽然得到一些帮助，但也有些失望，因为这并没有解决我最大的问题。」由此发现很快地给自己想要的答案，并不是神的方法。

1923 年第二学期的最后一个月，学校因罢课而停止，陆忠信和四位弟兄趁次机会受浸，见证他们与世界断绝并与主联合。陆忠信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一位极具地位的叔叔非常愤怒地从古田赶来，他自己是属安立甘宗派的，深怕陆忠信的受浸会使他丧失了进圣约翰大学的机会，便怂恿他打消此念。但陆忠信答道：「我为自己的罪向神悔改，我很平安。」当他表明自己的态度时，他的校长认为他神经错乱了。三一学院是学生进入政府几教会机构的门路，对男同学的前程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校长问说：「你的意思，就是不想再深造了？」他激动地回答说：「是的，我要传福音。」校长为此大感

困扰，深怕倪柝声的影响会在学生中产生一股分裂的力量，校长说：「你再回去祷告，三天以后再来找我。」但陆忠信回来后仍不改变，他说：「我已经决定，单单事奉主耶稣，终生不反悔。」

有两名男同学与陆忠信一同读完一年的课程后，他们进了海关机构做事，而陆忠信则去白牙潭和教士那儿。两位英国传教士知道神在这几个月里大大地听了她们长期的祷告，心中都充满了赞美。和教士便邀他一同帮助那些前来寻求教导的青年弟兄，而另一位同工则照顾姊妹。陆忠信在那儿有六年之久。

这时倪柝声与王峙正值三一学院的最后一年，他们被分到较大的班级。整个冬季在学院里，传福音的火一直在他的心中燃烧，弟兄们每天有三次祷告会，一次在清晨，两次在晚间。在城里的传福音行动也同样兴旺，王载和王连俊每天晚上在租来的小客厅里传福音。主日崇拜连带掰饼现在成为例行的服事。同时，倪柝声也花时间，帮助刚得救及青年同工们灵程上的长进，甚至为他们发行几期油印的复兴报，其中也编写他的查经心得。新春聚会在二月间举行，春假福音队再次进入乡间。第二学期受到洪水影响，水势在古桥低矮的桥墩下造成一股急流，给河边住户带来了霍乱和瘟疫，但他们尚能顺利完成他们的学业。毕业考试中王峙得了第一，倪柝声则紧跟在后，事实上他们可说并列前茅。

这时倪柝声二十一岁了，毕业时他穿上祖母给他买的价值十元的长袍，这位广东老妇人虽然言语刻薄，现在已快乐得与媳妇和好。不过最值得他高兴的是在过去一年中，神在学校、城里和周围的乡村得到二十几位信徒，许多同学在学期末，为此一同聚集献上感恩。

## 第六章

### 信心的试验

这些年间，张家时常从天津回到福州，张传官现在被聘为基督教宣道会的牧师。他们和倪家仍维持很好的友谊。当时严紧的社交风俗正逐渐松弛，所以成长中的青年们能自由交往。因此，这段交往使倪柝声对他童年的玩伴张品蕙萌爱意，因她既聪慧有貌美非凡。

然而倪柝声已找到了救主，并且承担起一项极有展望的革新工作。不单如此，他已决定毕业后步上陆忠信的后尘，做一项特殊的选择。他不愿进入圣约翰大学，也不愿接受其他更高、更正式的教育，而要用一生从事宣扬耶稣基督的工作。这中抉择对他的影响极其深远，并且显明这是出于他自己的信念。

当时，他察觉到张品蕙在他心中，占有相当的份量，虽然他们尚未论及婚嫁，但这中想法占据他的心，可是他们第二次的见面，使他死了这条心。他向来惧怕的事，在他们短短的谈话中，都一一呈现出来。她充满了对世俗的爱好，喜欢追求时髦的服饰，而且沉迷其中，她无法与他分享他对主的爱，这爱在倪柝声的抉择中是居首位的。她有自己的目标，渴望得到世人认为的成功，而这中成功是他早已丢弃的，很显然地，他们是各奔一方了。

有一阵子，他不敢面对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他读到诗篇七十三篇 25 节：「除你以外，在地上我

也没有所爱慕的。」神的灵抓住了他。「你在地上还有一个错误的爱慕，你必须放弃对张小姐的恋慕。她有什么资格成为传道人的妻子呢？」他的回答似乎有向神讨债还债的企图。他说：「主啊，我愿为你做任何事，即使要我将你的福音传到偏远边疆部落，我也愿意去，但只有这件事我做不来。」那时他刚满二十一岁，怎能叫他从心里舍弃曾如此爱慕的人呢？

于是他把自己投身于福音工作上，许多福音的门向他打开。在福州的新年聚会后，他到乡村工作，特别是教导初信者，在这里他很快学到一些新的功课。他说：「在我得救一年后，我有一种讲道欲，要我沉默不语是不可能的。好像在我里面有一些东西催促我不得不向前，传道成了我的生命。」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熟读圣经，所以很自然地以为自己应能胜任此中教导乡民的工作，特别是其中的妇女们大多为文盲。经过几次的探访，为要坚固她们的信仰，反而使他的自尊大受挫折。他发现这群妇女虽不识字，但对主却有相当亲密的认识。他说：「我知道她们读经并不流利，但她们却认识圣经所论到的哪一位。」因此他开始学习谦卑，但他的热心未尝稍减，而且深刻学习到结果子的神圣定律：「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十五5）

这时，他学院奖学金停止了，也没有找到其他工作，他开始面对在物质供应上仰望神的功课。他从两位英国传教士的书架上，看到乔治慕勒和中国内地会戴德生的信心事迹，他受到很大影响。这些人凭信心依靠神充分供应在工作上看得见、摸得着的需用，显出他们对未见之事的信心，而近在眼前的和教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还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位忠心的犹太基督徒勉励她：「若是神差遣你，祂必负责」，自此就没有接受任何保证的支持。倪柝声知道她会用到剩下最后一块钱，但神却从未失信过。1923年她曾告诉弟兄们，她为着扩展在海关附近的工作，需要一栋十个房间的旅馆而向神祷告，她不知道这个需要将何处得到供应。叫倪柝声大为惊讶的是不久之后一所临近的工业学校关门了，神给她二十个房间，只要她付些租金。

这样的信心是很具影响力的。有一次周末，在倪柝声的家里，有一位朋友口袋里仅剩两块钱，而礼拜一早晨他们却需用一百五十元，当时邮船礼拜六及礼拜天不开，无法等着凑齐全数。当他的朋友把这事交托给神之后，便出去传道。他遇到一个人提醒他尚欠一块钱，他就付了一块钱。还存在他口袋中的银币就显得更为宝贵。后来他又碰到一个乞丐，想要它他兑换成铜钱来施舍时，神却制止了他，他就把整个银币给了乞丐。当这块钱施舍出去后，神的及时恩典就进来了。他回家睡的平稳，礼拜一早晨他意外收到有电报汇来的整整一百五十元。

对倪柝声而言，这条属灵的定律「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已成为他生活的准则。他相信，只要愿意关切别人的需要，那么神必亲自照顾我们一切的需用。不但如此，他坚持绝不向旁人透露自己财务上的需要，即使朋友们不知道他的贫穷，而误以为是富足，仍旧如此守密。不单如此，除了偶尔接受短暂的款待外，在神的事工上，不该「从外邦人支取分文」，如此就可避免把主放置在受惠与罪人的地位上。

很快地，他把这些原则付诸试验。倪柝声有一位同学魏光禧，早年离开三一学院，就读于金陵大学，现在赋闲在建瓩的家中，他父亲是那儿行道会医院的医生。建瓩位于福州上游约二百四十公里处，深山环绕，诸水准流，是造纸工业的中心及内陆交易的商场。倪柝声接到当地差会寄来主领一连串福音聚会的邀请信。他清楚觉得主必供给他费用，祷告之后，他就打电报回复了：他决定在礼拜五出发。

问题是如何到达那里？当时他手头上只有三十几块钱，而乘汽艇的费用最少也要八十块钱，更糟的是，他知道有一位在福州的弟兄，比他更急需财务上的供应。礼拜四，神提醒他这件事，他知道必须有所行动，于是在十分挣扎中，经王载转手给那位弟兄二十块钱的奉献。

次日早晨，在倪柝声离开之前，没有人为他奉献什么。他带着仅存的十块钱摆渡到码头。那时，他在绝望中祷告：「主啊！我现在不向你求钱，只求你把我带到建瓯！」到了栈桥，一艘小汽艇的船主跟他打招呼，问他说：「你要去南平还是建瓯？」他答到：「去建瓯」「那么跟我来，我会带你去。」「要多少钱呢？」「只要七块钱。」他大为惊讶。在携带行李上船后，他问明原由。才知道这艘船已经租给了当地政府官员，但船主可以把雇主多出来的座位，出让给旅客以便赚一些小外快。因此倪柝声在这长途的航行中，可以不为盗贼所扰，也不必为航程中经过无数的税关，如水口、南平等等，延误了行期。

这真是一次美好的旅行，起初是穿过丘陵起伏、土壤肥沃的乡村，山坡上栽满了丛丛的龙眼、荔枝、柚子和绿色、金黄色果子的橘子树，倪柝声从小就爱吃橘子。提起橘子，他带着见见识广博且自傲的口吻说：「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其它地方的橘子，能比得上福建出产的。」接着溯河而上，松林山岭近逼眼前，其间布满凸岩，浮木漂在漩流的河中，汽艇在突出的巨岩下，沿着蜿蜒河道轧轧作响缓慢地驶向目的地。

在建瓯，倪柝声足足传了两个礼拜的福音，神的话语释放出来，非常激励当地信徒，但他口袋里只剩一块两角钱。他的信息深受众人欢迎，他的朋友魏光禧得到属灵的复兴，并更新了向神的奉献。在最后送别的筵席上，副主教腓利杭克(Archdeacon Hugh Phillips)把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拉到一边，这位主教在传福音方面，有不少的经历，并为福音经历许多生命的危险。他说：「我们从你的讲道上得到许多帮助，我们可以分担你一些费用吗？」倪柝声急忙回答说：「不，我没有缺乏，我的需要已有预备。」老实说，接受传教士的帮助，会令他不安。他确信，神会在祂自己的道路上供应他。但是次日许多新朋友为他送行时，他往河边的途中不禁地祷告：「主啊！不能只带我来到这儿，却不带我回家啊！」就在半路上，一位信差赶来，递给他一封从那位传教士带来的便笺。上面写着：「虽然有别人付你费用，但还是请你收下我这老弟兄的一小份吧！」他确知这是出于神的手，所以他手下这份为交通旅费的奉献。事实上他收到的远超过所需用的，因为同一艘汽艇正停泊在河边准备回航，而且空出同一座位索取同一船价。他兴奋地坐船顺着闽江急流而下，心中满有平安。回到福州后他发现，在他出发前的奉献，真正应付了弟兄当时的急需。这是一次令他永难忘怀的经历。此后他确信神的方法并非「积蓄就必富足」，而是「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的怀里。」

然而在南台，倪柝声和租用民房来传福音的同工之间，关系有了变化。年长的弟兄王载、王连俊及少数支持他们的弟兄们，要他离开他们的团契。造成这种结果的详情未可尽知。诚然，倪柝声到海盜出没的海岛传福音，后来却失信那件事曾叫他们失望，但也不至于产生这种反应。

在倪柝声寻求福音工作有新的突破时，他回到起初的根基上。他看见神才是祂自己一切工作的真正发起人，同时祂也是此工作的终极目标。但工作的过程又如何呢？照一般说法，祂也是此事的执行人——一位全权执行人。他觉得这是基督徒最容易忽视的一点。他的看法是这样：「当我们看到一个十分聪明，口才流利，精力充沛并善于治理的人，我们就会说：『如果这人能为基督所用，那是何等宝贵

呢!』但这种看法也就等于说,工作必须源于神也是为着祂的缘故,但其过程却可以藉人的力量来完成。」虽然福音的热心在他心中燃烧,使他不能稍停片刻,但耶稣的话一直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惟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约五 19)神对保罗所说的话就再也清楚不过了:「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十二 9)这种事奉理念(福音工作的三要素),成为他后来在属灵成就上的主要泉源。

在春节前夕,倪柝声试着把这种看见传递给信徒。他以旧约的事迹来解说,用『以色列的约柜表明神的见证』为主题,提醒听众:在耶利哥因着约柜的出现,使该城倒塌;往后,以色列人挫败的日子,祭司的事奉仍在示罗执行,即使是神同在的约柜漂泊在外时,它仍然挫败那些掳掠者。倪柝声的问题是:今天神如何兴起圣工,与所能托付的工人呢?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倪柝声指出约柜的内容:法版、盛吗哪的金罐及亚伦发过牙的杖。亚伦的杖放在其中,为的是纪念一个黑夜及复活的早晨,他相信,这杖给予神的仆人暗示出一条多节果子的道路,我们要成就神的工作,不仅仅是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并赐下更大的机会而已,当一些超过我们所能承担时,我们也得时常为着新生命(木杖发芽所预表的)的流露而忍受黑暗的夜晚。当耶稣亲自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复活的生命才得完全表露出来,况且仆人是不能大过主人的。

这些心得曾刊载于他所编辑的不定期刊物上,其中有一期的费用,是从建瓯腓利副主教的奉献中支付的。他并不是用仔细的编校来弥补在讲道上过分的论调,而是由于他在服事上太倾向安静等候之故,引起了弟兄们的反对。他们中间除了看法的差异外,还有一些外在的压力,这时城里的反基督教运动正达到高潮,差会圈子里有一些人不赞成学生的见证,而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很少人能否定王载及王连俊两位海军军官奇妙的悔改,及属灵的生命,像这么有抱负与异象的人应该『加入』其他教会的建造。事实上,王载后来在上海接受了传教士的按手,正式接受了圣职。相反地,倪柝声则显得有些固执及歧异的立场,况且大家这时对任何造成外面混乱的因素都非常小心,一些学院里的同事,已试图禁止学生参加奋兴聚会,而且至少有一位传教士将倪柝声贬为『恶魔、大众的骗子』,这句话也许可以代表当时一般的看法。

由于以上的因素,王载及王连俊等人,要求倪柝声停止和他们一同崇拜,不久许多人对这中决定感到遗憾,后来大多数人决定翻案,其中一个人看出来:「我们做了一件傻事,可能是我们的嫉妒心作祟,因为倪柝声的恩赐,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要明显突出。」虽然有一阵子保留了他的讲台服事,而他却为少数弟兄中间无法弥补的裂痕,感到极其忧伤。

后来倪柝声下到马山,到罗星塔岛及马尾之间的村庄,在那儿租了一间小茅屋,窗口面对渡口。这间茅屋成为他旅行布道的基地,他在这里开始研读圣经,认真地编辑他曾发行的实验性刊物,其间也有一两位青年留下来与他交通,而陆忠信弟兄就在对河不远的百牙潭。

大约这个时候,有一位行道会医院当医生的李小姐,到河的下游来找倪柝声,她领养一个名叫国清的男孩子,但国清却让她非常失望。国清现年十六岁,被学校退学,在绝望中她带他到马山,请倪柝声帮忙。因此倪柝声将他接回来,花时间教他圣经,不久这个孩子完全转变过来,孩子的母亲及家人因这孩子生命与行为转变的见证大为喜乐。

一九二五年一月,接近农历年,按惯例福州春令聚会正要举行,许多城里、城外的信徒将要前来聚



集。这年王载送信给倪柝声请他不要来，因为争论的焦点正好落在他身上，如果他不在，他们比较容易进行。

倪柝声接受了这项要求，但此事影响了他在基督里的平安，使他陷入极深的沮丧中。当他难以忍受时，他渡到对岸海关去寻求和受恩教士的安慰。他大声申诉：「事情居然演变到这地步」，并将大致内容告诉她。她很轻淡地回答他，以默然的态度，对正在愁苦的他表示同情。

其次，他发现陆忠信虽然仍忠于福州年长的弟兄，却因为他与同工间的分裂深感忧伤，他们便一同祷告寻求神。倪柝声认真地衡量从各方面来的批评，并谦卑地将他的问题摆在神的面前，尽管这一年来，他们的见证使许多人悔改重生，难道他还有不讨神喜悦之处么？他曾在态度上顺服弟兄们吗？当他们祷告之后，心里得到清楚的答复：「把问题交给神，继续去传福音吧！」

这时，刚好陆忠信的养母，正在梅花村做接生婆。此村位于罗列岛海湾的南岸外，此地 在异教黑暗笼罩下，百姓对福音完全不知晓。陆忠信与倪柝声和另外四位弟兄准备利用假期向村民传讲基督，后来又有一位刚信主得救的李国清也加入，人数增到七位。

他们先写信给一位三一学院的老同学，他是负责那儿学校的老师。但是，黄昏时分，当他们在梅花村上岸后，他却拒绝他们使用学校空地做为传福音、作见证的场所。后来他们在一位好心的草药商的楼上，铺草架板为床，找到了落脚之处。

最初几天，渔夫和农民们忙于例行喧嚷的庆典：如拜拜、吃斋、祭拜祖先、赌钱、放烟火、施舍及第四天的祭拜家中诸偶像，因此，不听福音是不足为奇。但是到了第九天，他们仍对所传的福音没有反应。年轻的李国清大为灰心，他询问群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不信呢？」他们说这是因信奉名叫「大王」的偶像之故，并且占卜定在十一日举行赛会。他们坚称过去二百八十六年来，「大王」所选定的日子都是阳光普照。倔强的李国清向他们扬言：「那么我跟你们说，我们的神是真神，十一日必定下雨。」听众被这句挑战的话楞住了，他们说：「不用多说，如果十一日下雨，那么你的耶稣就是真神，我们就要去听祂的。」

倪柝声尚在村落的其他地方传福音，而这个消息像野火般地传开，当消息达到他的耳中时，他大为战兢。神的尊荣似乎被置于赌注中，他们深怕过去并未全然信托神，他可能不原帮助他们。（他知道，他们七位都要负起责任，不只是李弟兄一个人）。但神若不支持这件事，他的福音就无法在此海岛传下去了。难道他们犯了罪么？他自己省察，并把它摆在神的面前有几天之久。难道他们现在就要离开此地，而让「大王」掌握下去么？他们回到寄居所在，极其谦卑、战兢地寻求神，准备接受祂的责备。

有一句话临到倪柝声：「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有了如此清楚的确据，他们知道十一日一定会下雨，他们便出去把这项挑战传开。

那天晚上，他们的房东提醒他们，村民确实有此经历，「大王」的确是保守这地平安的土地神，他真的保佑那些拜他的人不生病，庄稼不遭天灾，他们的妇女生产平安，因着这些信众的热心，他相信赛会 的日子必是万里无云的晴天。不止如此，房东告诉他们，这些渔民都是经年累月在海上谋生，他们多少都能精确预测出未来几天的气候。听到这里，弟兄们就更认真、专注地为下雨祷告，于是神应许的话：「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又在他们耳边响起。次日，他们渡到邻近一个海岛——即前此倪柝声未能成行的海盗窝——在那儿立刻有三家人转向基督，并当众焚毁偶像，当晚他们很迟才回来，虽

然疲倦，心灵却很喜乐。

次日早晨他们起得很晚。倪柝声说他被阁楼上小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晒醒了。他叫了起来：「没有下雨！」已经过了七点钟了。他起身跪下祷告：「主啊！求你为我们赐下雨来！」但是那句「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再度响在他的耳中。他顺服下来，默默地走下楼，最后他们坐下来吃早餐，七位弟兄和房东都一语不发。这时天空无云，但他确信神已应允。正当他们低头谢饭时，倪柝声说：「我看时候到了，现在一定下雨，我们可以把这事带到主面前求祂纪念。」他们如此默祷。「以利亚的神在那里」的确据再度临到他们，然而这次却不带着责备，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说出「阿门」之前，他们就听到几滴雨落在房顶上。他们一面吃饭，雨势一面增大，当添第二碗饭时，倪柝声大声说：「让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并且他求神赐下更大的雨。当他们吃第二碗饭时雨水倾盆而下，他们吃完早餐后，街上积水已漫过草药店大门的第三个台阶。

初下雨时，一些年轻的村民已先得到开启，并公开说：「有真神了！大王不再是神，这雨把他困住了。」但他的信徒不肯甘休，他们把轿子抬出来，确信他能化解大雨。然而大雨倾注，才走了几步路，抬的人便滑跌在地，大王也随着跌下轿椅，断了左臂伤了下鄂，他们急速把他修好，仍然把它放回位上。在梅花街的半路上，他们一路跌跌撞撞，半拖半拉地前行。村里一些六十岁到八十岁的老人，因着他们相信大王出会必是好天，没有带斗笠及伞，落的狼狈难行。游行停止了，偶像被抬入一间祠堂里，重新卜卦后得到回答，说：「今天的日子错了，出会应该是十四日下午六点。」

听到这样的消息，弟兄们立刻确信神必再次行事。他们在祷告中向祂祈求：「主啊！求你十四日下午六点下雨，在这四天里给我们好天气。」当天下午天气转晴，并且他们也有真心愿意听福音的群众。在短短的三天内，神在梅花村赐给他们三十几位真心悔改的人。十四日天亮时，又是一个好天，他们继续有一些听众。

当黄昏来临时，他们在约定的时刻聚集，把这件事带到主前求主纪念。不到一分钟，神的答应到了，暴雨及洪水一如从前。撒但借着偶像所显出的权势已被打破，「大王」再也不能成为灵验的偶像。第二天，他们的日子满了，因为有些弟兄要上班必须离开，由于这些岛屿是某一差会的工厂，他们保证接下跟进、造就悔改者的工作。后来倪柝声回顾那次的事件，使他借着经历得到了许多属灵的功课，当时这件事的发生确是最好的时机，让他及同伴们大获信心，当他们紧紧地依靠神时，祂必负责处理其余的事。

## 第七章

### 海外工厂

从倪柝声的马山「临江茅屋」往外眺望，深水码头外景色宜人，河道中的江舟及远洋轮船往返穿梭，逆河而上有马尾船及海事学校。下游在罗星（流星）岛面对湾处有高三十公尺的塔，码头是因塔而取名。闽江的两大主流，经十一公里的南台岛在此汇合，其水流在河道中造成深泓，可容大货轮在江中

停泊。沿山坡而上的梯田几乎高达山顶，其坡度甚陡只可供矮小枞木成长。运货的舢板和驳船来往频繁，甲板上汗流浹背的苦力「嗨哟！嗨哟！嗨哟！」带韵律的吆吧声，与海鸥的叫声相呼应。

这儿生活简朴，倪柝声从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都以此为根据地，这里也成为他的过渡期，亦是属灵生命极大长进的时期，这时他开始为自己订下目标。记得在求学时，有一回他学骑脚踏车时曾打定注意，只要把两眼定睛在把手上他就能骑得正，不料到了小街上他老是撞到墙壁并把指头碰伤。后来有一位元骑车的朋友指出他的错误：「你要向前看路，两眼定在前头的马路。」如今他也想把这原则运用在神的工作上。

他看到自我装备的需要，于是定下严格的学习课程。他明了传道人本身的重要，不下于他传讲的信息。他看见这点就知道神必须先在他身上做工，才能透过他来传讲信息。这段时间，倪柝声的健康情形不佳，常常为咳嗽所苦，即便如此，他仍专心于研读圣经并广泛阅览书籍，如：阿福德（Alford）及卫司可（Westcott）的解经，路得（Luther），诺克斯（Knox），约拿单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乔治怀特菲（George Whitfield）及大卫布莱纳（David Brained）的生平。身体健康时他就从事游行布道及编辑「复兴报」，它是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小型属灵报纸。其内容是他自己的解经，加上选择西方属灵作家的翻译作品作为补充资料。「复兴报」是非买品。免费分送给一切索取的人，他的出版是不定期的，因为神是以零星小额的奉献来供应他。由于它有效地传述了神在基督里救赎的目的，这份小型杂志不久便广传各地，也带来许多个别见证及讲道的邀请。

同年，倪柝声的亲戚带他去上海探访。在那儿他得知张品蕙在天津的消息。虽然他们已分手多时，但他的心仍然惦念着她。他得知她在济慈学院表现出色，有希望能由此进入北平的燕京大学。当他听到她仍然热衷于社交活动，更加深了倪柝声一个信念，如果他完全跟随主，就得放弃对她的想念。他忧伤地把她从自己的思念中抹去。他进入屋里跪下，将这事交托神，然后写下一首「主爱长阔高深」的诗：

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测度；  
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被恩泽！  
我主出了重价，买我回来归祂；  
我今愿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祂。  
我今撇下一切，为要得着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顾？  
撒但，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将貽羞你名！

有一天早晨，倪柝声在上海读到耶稣的话：「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路四 43）不久他接到母亲打来的一封电报：「我应邀到马来西亚传福音，你有空陪我去吗？」

原来大约一个月以前，和平在一位朋友生日宴席上，遇到一位从马来西亚来的陈姓客人，他正陷于道德的泥沼，显然有属灵上的需要。她觉得主对她说：「我曾向撒玛利亚夫人讲道，你也去把生命之道讲给他听！」显然他曾听过倪家母子奇妙悔改的故事，当她向他作见证时，他就急切地为自己的生命呼求神。现在他从霹靂洲（Perak）的锡他瓦（Sitiawar）写信给她，问他能否到锡他瓦的教会向他们讲道？

因为教会中有几位听见他找到了在基督里的救恩。他愿付所有的旅费，并由他姊夫几姊姊林提康（译音）夫妇接待，他们是一对虔诚的基督徒。和平把这件事摆在主面前，主给她路加福音一句话做为凭据：「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有了这个印证（确据），她打电报给上海的倪柝声叫他与她同行。

他们路过新加坡、怡保来到锡他瓦，受到林家热情的款待，而美以美教会却相当的冷淡。牧师说：「一个月以前有两个美国人在此举行奋兴会，我们为了请人聚会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第一天有三百多人来，第二天六十人，第三天只有十二人。现在情形更难，所有的人都去橡胶园割树乳，除了主日以外没有别的时间来听道。」

第二天晚上他们到教堂时，只见大门深锁，他们找到了牧师，发现他正在核算白天所割下来的树乳，他不得已解释说，他忘了聚会的时间，他们默然无声地取了钥匙，开了门，开始用借来的扫帚清扫屋子，有一位印度信徒站在街上请人进来。起初人数少得令人泄气，直到倪柝声提到他个人的见证，说到路加福音上「我必须传道」的那句话时，才有转机。这时林和平才知道这次神用同样的一句话呼召他们前来事奉。他立刻得到鼓舞，就更释放及火热传讲神的道。许多人流泪悔改，承认他们的罪，脱离许多恶行。人数一直增到三百以上，其余的则站在窗外听道。过了十六天，牧师怕信徒过分激动，觉得聚会应该结束，然而在林弟兄邀请下，他们继续有一段时间在家中查经，给初信者在神话语上的造就。离开锡他瓦之前，倪柝声打电报给陆忠信，请他来此继续造就工作，而早在几年前陆弟兄以感觉到神要招呼他到马来西亚及印尼事奉。

在这几个礼拜里，倪柝声的母亲觉得在林家过得很舒服，特别是与林家大女儿爱情在一起，她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基督徒，林和平心中觉得这个女孩与她儿子非常相配。她向爱情的父母提起此事，也告诉她那个性温良的丈夫，但几乎没有问过倪柝声的意思。这事以后，由于他们在马来西亚还有别的邀请，所以两家再又见面和平要急切地促成此事，忘了她年轻是痛苦的经历，而倪柝声却因碍于孝道不便违抗。终于在一次小型宴席上，两家交换信物宣布订婚，这时倪弟兄内心立刻感到极度的不安。正当他和母亲还在新加坡等后回家时，有一位学校老师设计陷害林小姐，便告诉倪柝声一段相当逼真的故事，来毁谤她的人格，他并不愿信以为真，但这件事给了他一种游移不定的感觉。因此事关系到神在他一生中的旨意，他唯恐走错一步。他有几天在痛苦中祷告着，在神面前权衡应该怎么做，最后，当他们抵达上海时，他告诉母亲神拦阻这门亲事。他一面劝母亲归还信物；一面自己写信给林家，很礼貌的解释他的处境。他的母亲很难接受，因她早已将爱情视如己出。后来当他们被伯特利医院石美五医生请去讲道时，母子间呈现紧张的气氛。不久和平被邀到中西女塾作见证，此时她忆起求学时期所遭遇不和心意的订婚事件，她透析此事时开始站在倪柝声的立场来看待这事。因此在她坐船回福州的路上，她已预备好承认她可能把这事做错了。

倪柝声的讲道所以能吸引人，主要是他有恩赐能将「神的道路唯独行在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上」，讲得非常清晰。太多的基督徒都是努力追求靠己行善的救恩，这种方式几乎跟佛教的道理没有差别，对他们传讲新生命乃是神白白的恩赐，使他们感到惊讶及新奇。倪柝声对福音的认识不止于因信称义，他也从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及迈尔(F.B.meyer)的著作中认识到从罪中得释放的成圣生活，这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他也阅读芬尼(Charles G. Finney)和依文罗拔士(Evan Roberts)及1904年至1905年的威尔斯大复兴，同时他也考察司达克梅尔(Otto Stockmayer)及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有关魂与灵，

及得胜撒但权势方面的作品。而她借着新约的自修，证实了这些有伟大经历之基督徒的著作，需要透过简单的词句，向与她在一起的信徒说明。

这些题目出现在他的讲道中，一年以后也被刊在杂志上，而且内容获得福建各地及其他地区读者热烈的回应。无疑地，这些信息使他殷勤研究，加上敏锐悟性的结果，但他仍然觉得需要得着亲身的经历。由于年轻人的热心，不久他便起意撰写一部有关基督徒属灵生命之概要，信息的内容多数是他所读到而令他感到兴奋的，也是周围差会的教会所未曾讲论的。他很乐意被人邀请去讲道，原因是要告诉听众，仅仅得到赦罪和得救的确据是不够的，因为这不过是个起点，还必须认识复活的救主——就是他的生命，这样他才可能在行事为人上讨神的喜悦。

每次倪柝声主领聚会时，会众皆聚精会神地聆听，因为他给那些以为福音不过是给信徒一个天堂的应许，而对他们生活中所遭遇的患难，并无所助益的听众一些新鲜的观念。他以「接受了救主，而后把救主置诸脑后，照着世人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的理论来解释，为何许多挂名的基督徒家庭里，孔孟思想是与圣经占有同样的分量。

这中生活与新生命结果子的生活差异何其远！它留给内住圣灵的地位也太少了，而圣灵却是学习真理之人的导师，也是倪柝声日渐更多依靠的。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谦卑的陈姓裁缝，几个月前他捡到马可福音的最后几张圣经，这人未成接受过任何基督徒的教导，也未向倪柝声问过这些经文的可靠性，然而他却选择了十八节有关医病之事，做为基督徒最起码的神迹论据，出去到村里寻求印证。后来在邻舍一次奇妙痊愈的结果中，他得到了信念，就回到裁缝店那儿忠心地为基督作见证。

诸如次类的经历却帮助倪柝声解决了一件向来困扰他的问题。他说，早年他很怕碰到无神论者及高等批判学者，因为他们会向他证明圣经可疑之处，使他因此失去信心，如今因着别人和自己的经历，并且面对面遇见了活的基督，他知道自己已经得着了答案。面对他们所有的辩论，他都能从容地回答：「是的，你所说的也许有众多理由，但是我认识我的神，这就够了。」

在另一个村子里，一位初信的农夫碰到麻烦，他的稻田是山坡上的梯田，正在灌溉管道的旁边，他辛苦打上来的水，一再被山坡下面的农夫偷去。他的邻舍趁着夜晚凿开田埂使水流到自己的田里。这位农夫在灰心中，来到教会弟兄们那里申辩说：「这不公平，在这种情形下，我该怎么办呢？请你们告诉我。」他们和他跪下来祷告，而后有人建议他试着「走第二里路」。他们说：「如果我们只做应该做的事，那么我们毕竟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必须越过仅仅对的事。」所以第二天他带了木槽和「龙脊骨水车」再去打水。这个早晨他先为下面邻人的两畦水田打水，下午才给自己的田打水。

邻舍为之哑口无言，经过一番思考，就去拜访这位基督徒农夫，并十分真诚地要明白其缘由，不久这邻舍也饮于生命之道的活水。

倪柝声就是在这种对神和祂话语的热诚中，被呼召来栽培及服事。这里的人们对神的话都是相当认真，并显出重生圣徒真实的交通。在此，他也看到基督在地上教会的实体，及祂的灵向外邦人作见证的工作。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应该具有此种令人转变的福音见证能力，每一群弱小的团体都应该认识神是他们敬拜及见证的中心，如果神的旨意在那里，那里就有基督活生生的见证。

## 第八章

### 脱去旧人

从外观高雅的三一学校教堂，到倪柝声与两三位青年非正式祷告的河边茅屋，不过只有十六公里，他却为这样的迁移有一段长时间的思考。在南台岛东西两大潮流，都一齐冲激在他身上，后面山坡上遍布着舒适的外国别墅，河道上有来自欧美的邮轮及货轮，各自在航道上停泊或航向海外。在轮船之间交叉穿梭，摇晃于波浪上的则是本地的小舢板和「拖船」。这些人均为妈祖信徒，沿岸拥挤着他们简单的住屋及吵闹、臭味杂陈的市集。在这种环境中他不断地自问，他的基督教信仰能否进入并适应如此复杂的情况呢？

在福州，安立甘的「石砌教堂」（与美国公理会红砖建筑相对）正代表着基督教的信仰。正如当时的人所描述，这个由领事、港埠官员及商贾们所组成的「社会」，屈尊降卑地来参加由港埠牧师所主领短短一个钟头的宗教仪式，当仪式完毕后他们便打道回府，而那些怡和洋行的商务代表们，也在例行的教会崇拜后商议本周的茶价，其他人则赴英人俱乐部作周日消遣。

当然，在较小的城里也有信徒们多年奉献所建造的教会，其成员几乎全为中国信徒及传道人。但在建筑及教会风气上，仍保留西方的特色及风格，因此信徒们相当被动地依靠一个累赘的教会组织，以及外籍的主教为上司。这种情形就像是一个人不管轿子轻或重，都定规要四个轿夫来抬。不但如此，他们长期缺乏按立的牧师，而有资格主领圣礼的牧师与教会数目的比例都低于一比七。另一位福建的宣教士说：「无可避免的结果发生了，本来值得重视的圣礼制度，由于荒废不用反而受到忽略，反而本土宗派却大为发展。（在倪柝声年轻时，由唐巴拿巴所创立的真耶稣教会，吸引了不少福建的牧师及信徒进入他们的交通。）如果你所在的教会，不能提供你一个有效服事的职位及按时举行圣礼，而其组织形态又不能使你觉得自己是这个属灵团契的一份子。如果你的态度十分认真，通常就会离开此地，加入其他能提供这些祝福的教会去了。」

倪柝声在数年之后提到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件关于圣礼的事。「我认识一个人，他心里恨着一个人，因那人曾大大得罪他，其受害之深就是杀了他都不足以补偿。后来，被得罪的人得救了，有好几年他不再把那人放在心上。有一次他到另外一个城去，并在当地的教会参加主日掰饼聚会，当他被介绍给会众认识后，他突然看到了他从前的仇人。他暗自思量：『他在这里，我不知道他是否得救，我该怎么办呢？我真糊涂竟然让他们介绍！』当会众再祷告时，他静静地起身离开那儿，边走边想他所蒙的救恩，及对那人的怨恨。他走得愈远，心里就愈觉得不该这样离开聚会；另一方面也愈恨他的仇人。他想起十年前得救的光景，当时主如何一笔勾销他以往的过失，而他却觉得不能宽恕他的仇敌。最后圣灵使他想起一句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十三 35）这时他破碎自己并降服下来，大声呼叫出：『主啊！我饶恕他了。』并且泪流满面地转头回去聚会。当他进入会堂，他们已祷告完正准备掰饼，他站起来要求说一些话。他把整个故事说出来，提到神如何带领他宽恕了这个人。」

倪柝声一直在寻找一些人，而这些人 是神的灵能在他们身上畅通无阻地运行的，他相信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狭窄的宗派团体里。所以稍后不久，他对一群会众说：「今天当我们围绕主的桌子，我们的眼光若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团体，就不配掰饼，因为得着了基督的生命，就应与整个教会发生关连，而不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我们的心需要宽广以容纳所有神的儿女，否则我们掰饼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在此应宣告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弟兄姊妹，不容许任何分门别类的思想，并且切记临到我们的圣灵也同样临到他们。」

当他尝试去解释由分门别类的宗派所引起的问题时，无论是从历史或价值方面来看，他觉得这些答案决不能为初信者所称许。由于许多差会的宗派观念，使得具有潜力的中国教会陷于分裂的痛苦中，在当代年轻的基督徒中，也有许多人像倪柝声一样，寻求回到新约简单的命令上，以期有效地肯定信徒的合一，而这个合一是耶稣曾祷告，且为其摆上生命的目标。

倪柝声深深了解，离开已建立的教会之任何行动，会导致陷入民族本位及反差会的危险中，其结果等于宣告所有其它的基督教团体是错误的。在他所阅读的西方作品中，有一些作者如加维特（Govett）、潘汤（Panton）以及更早的达秘（Darby），他们为着良心的缘故，辞去了安立甘教会的职位，而寻求圣经上更真实的崇拜及服事，并且得到神明显的称许。在圣经中像他们如此顺服神声音的例子很多。而一个人的立场，决定了他属灵生命的品质，他说：「在神的工作上，每一件事取决于所差派出去的工人，什么样的工人便产生什么样的信徒。」如果他是 以品质为目标，就不必从事对抗差会建造的改革运动。他不敢把自己的属灵路程，与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相混淆。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间，在学生中出现了一股新的爱国情操浪潮。在过去几年来，他们的老师一直叮咛告诫，他们是民族的希望，有一天必成为民族的拯救者。但是与过去士大夫从政的制度相较，他们毕业后的前途未必平坦。尤其是青年们多为理想主义者，在喜新厌旧的情绪中，任何进取性的群众运动，都俨然以领袖自居。

有一件事使倪家母陷于悲伤中，他们的三子宣祖，在属世的影响及祖母娇纵下成长，他急于投身政治活动，常常惹事生非，因此成了家人挂虑的重担。表面上他打着「救国」的旗号，实则为逃避读书，先后加入了铁血志团及敢死队两个革命团体。终于有一天家人的挂虑成了事实，消息传来他在一次革命示威中丧生。

一九二五年的新年，倪柝声与他的弟兄们 在海岛上作见证，而福州旧城爆发一次发宣教士的暴动，天主教的修女及一些英国行道会的女教士们遭受侮辱，仅得逃命。同年三月十二日孙逸仙博士逝世于北平，留下了一个未能及时填补的权力真空。五月三十日发生历史上的南京路事件，当时上海租借地的员警，向示威的学生开枪，掀起了一片反英情绪，并导致南方各城更激烈的示威。

福州的宣教士们在夏令退修会中，迅速把仅存的行政管理职位让出来，以期获得国人的好感，使三一学院秋季重新开学。往昔对「淡色眼珠的洋鬼」之传说又复燃起来，再度给在差会服事的中国人极大的压力，他们为着基督的缘故，被称作「洋人的走狗」，然而也留下了勇敢的见证。次年因反基督同盟的传播及骚扰，以致到了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所有内地的传教士暂退到沿海地区，夏季时初级中学被焚毁，到一九二八年元月，高级中学的校舍被一群马克斯狂热分子纵火焚烧，更正教差会的复兴时期似已终止。

但倪柝声本人，仍尊重许多为神仆人的宣教士，他们曾与他一同分享对救主活泼的认识。早在一九二六年他应其中数人之邀请，到福建南部的厦门向同文书院的学生及美国长老会差会的神学院讲道。在那儿他遇见了两位聪颖的研究所学生——覃但以理及一位牧师的儿子陈雅各，他们日后成为倪柝声工作上的亲密同工。

这次拜访，他是受到灵光出版社的邀请，该社系由南京差会机构所主持。他的朋友李渊如姊妹是灵光杂志的编辑同工，他应邀与他们工作一段时间，由于他身体不好，若能改换气候或许对他有益。然而更重要的是主在他心里说：「去吧，你可以得到一些出版上的经验。」于是他决定并知道神会使他成行。

这趟上海的旅行，他得以拜访旧友、结识新知，对他而言相当有价值，有一些朋友是他日后极赞许的。他的新杂志「基督人」（自一九二六年元月开始接续复兴报出版）的许多读者住在上海、南方城镇以及长江上游各地，因此他看上海是全国工作的美好基地。上海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风气及政治运筹的场所；也是一个具有刺激或危险的城市，其道德状况被评为：「如果神宽赦了上海，那么祂就对不起所多玛及蛾摩拉了。」然而，它毕竟是建设中国的主要工商业及财经中心。相反的罗星塔码头，位于偏远及方言的省份，缺乏发展机会，既然福州原有的弟兄都已分散，又缺乏工作的展望，他想是否要把总部迁到上海？

在南京有许多较大的宣教团体和机构，他遇到许多乐于在基督里同工的弟兄，并从中得到一些编辑和出版方面的经验，与李姊妹的交通给了他极大的帮助。这位比他年长十岁的姊妹，属灵经历超过自己，他觉得自己实在需要这样的一位元「年长的姊妹」。他把自己期待将生命之道传遍中国的异像与她交通，并发现她是位有智慧的顾问，及有颗同心的灵。她印证了他的感觉，特别在当时动荡的局势，正唤醒中国青年一股新的属灵饥渴，这种饥渴也是起于对基督教的不满。他能不能应付这个需要呢？她支持他以上海为据点的看法，并说她觉得神呼召她辞去南京的职位，投入他在上海的工作，特别是他正开始的文字事奉。

倪柝声与长老会的关系只有短短几个月，他不认为神要他永远在此机构服事。更严重的是，他在南京不仅没有工作而且病倒了，他知道他必须回去。他再度顺河而下，灵里虽有更新，但心中消沉身体软弱，有一度他的咳嗽一直不停，晚上常出冷汗，他渴望早日回到温暖的家乡，并在途中寻求医生的诊治。

上海的医生为他检查，立刻要他作胸部 X 光透视，照片显示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一边肺全部感染了，而另一边局部感染。当倪柝声正等候医生拿出潮湿的片子检视时，他听见医生用英语跟护士说：「可怜的人，看看那张片子就知道了，你记得上回我们曾照过一张跟他一样的片子吗？他六个月后便死了。」倪柝声被叫进去，「你的肺大部分感染结核病，」医生告诉他：「回家疗养吧，吃些营养的食物，这是你能做的，你会好起来的。」

在回航的船上，倪柝声的心中极其痛苦。他有许多的计画，盼望能成就大事。而今神却对他所有的计画加以「否定」。他开始省察自己的行为、动机和雄心，并且迫切祈求「在神面前有清洁的心」他认罪，看在何处有得罪神的地方。叫他良心感到困扰的就是有关马来西亚锡他瓦林爱情的事，他早就知道那个告密的人是欺骗他的，那么是不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顺从而犯罪呢？他是否听信了谎言，而得



罪了她及她的家人呢？是不是他在整个事情中误认了神的引导？他愿意为主工作而守独身，他似乎对于以往的事无法做任何的弥补。

一九二六年秋天的早晨，这艘沿海轮船逆流而上，行经闽江狭流带；他在罗星塔码头上岸。当他重回马山茅屋时，它已成了荒凉之地，他一生的路途似乎突然失去了指望。他想要哭出来，向神抗议，一一向他质问。

他试着平静下来工作，从箱中找出他早已计画要写的一本书的大纲。早在三年前，他已写了两章半初稿，是有关属神的人在属魂体方面的题目。由于这些题目太理论化，所以他把这个计画搁置下来，因为缺乏经历来证实，而且有太多的事在这段时间发生。他在自己基督徒的生活中，有许多新的实际，也看到许多人从黑暗的权势下得着释放。假若神不久就要将他接去，倪柝声觉得他无论如何，总要把神所赐给他的宝贵经历写下来，他坐着眺望江面，拿出了笔墨和稿纸。

当他这样安静下来时，身上仍在发烧，无法下笔，甚至无法集中思想，他只好把圣经和手稿收起来，因为他知道无法独自完成。他再一次关上房门，下到罗星塔码头，雇了一是舢舨渡到海关去。陆忠信弟兄在旅馆门口迎接他，在男士部给他找了一个房间，他躺在窄床上，把自己交给神的手中。

叫他得安慰的就是这儿还有一个旅馆可以休息。倪柝声的父亲早先曾提醒他，工业学校快要重新开设，新的工程科教员已从美国来了，旅馆是属于该校的。而和教士却在这炎热的数周到福州的鼓岭去退修，完全安息在神里面。她在那里接获消息，学校的财政突遭破产，终究不能开课，因此这间住所仍归她使用。

这段期间，宣教士们以牛奶和营养的食物当做药品帮助他，弟兄们也轮替来照顾他。黑暗的日子持续几个礼拜之久，他的体重日渐减轻，力气逐渐衰退。陆忠信回忆说：「他是如此的自视卑微，极其渴望得到医治。他曾要我每天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祷告。」当他软弱到只有凭着记忆中的经文寻求拯救，如「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彼前五6）——但他不敢完全引用这句话。倪柝声说：「有两个月之久，我每天都在撒但的牙缝中生存。」

和教士定期带着「基督是得胜者」的信息来探望他。虽然他知道宝血赦罪的能力，也知道能从那位曾担当我们软弱者的身上支取疾病的医治，但他坚持自己犯了过错，而在生活中给了撒但反对基督的地位。然而和教士不断引用经文证实主的复活是包括了一切，最后他终于用信心接受：「基督是得胜者！」

慢慢地神答应了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神的手加上饮食及休息使他有了转机。他稍有力量时就再度提笔写作。现在终于得到神的许可，他就全心致力于这件自认为急切的工作，好像新闻记者赶着截稿时间一样，他以最后的气息，倾心于描述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与属灵争战的谋略。

几个月以后，第一部包括四卷内容的「属灵人」终于脱稿了。这是一本很有系统的作品，其中详论信徒的救恩，灵、魂、体各方面。在序言中，他形容此作品为圣经心理学，他提醒读者若只把他当作自我分析的工具，必定会成为他们消失在基督里的拦阻。这部苦难中的产品，富于透视，但缺乏他一般讲道时的活泼，这部作品归功于他博览群书以及敏锐的心思，加上他丰富的圣经知识，所以其中的信息具有透亮的开启性。

到了五月，虽然倪柝声的身体仍很虚弱，但稍有好转，便携稿到上海。李渊如早已从南京到此，因为南京有暴动，并杀害了一些宣教士。她的中文素养甚佳，志愿替他定稿准备付印。

此时南京已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国民革命军北上经过湖南攻克长沙及汉口，然后挥军向东取上海。为了保护百姓性命，蒋委员长于四月十二日，扑灭了上海工人中一些人的暴动，这个城市才重归平静。

当倪柝声在上海正要完成他的计画时，他学习另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深深影响了他往后对于「从罪中得释放」这个主题的认知。他曾多次传讲罗马书的话，这些话突然活现在他眼前。他看见属灵上重要的事实，而且越过了个人由信心而来的经历，他说：

「从我信主几年后，一直被教导得释放之道，只在乎『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罗六 11）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一直是如此『算』，但困难的是我愈如此做，就愈觉得向罪是活着的。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是死了，我无法『死』，罪仍然胜过我，我知道有些基本的事可能错了。所以我求神指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句话的意义，我明白当神论到这事时他从末说：『你必须如何』；而是说『你们已经是如何』。但从自己经常失败的经验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自己欺骗自己，我几乎要下结论，只有不诚实的人才会有这种的说法。但无论如何，我寻求别人的帮助时，总是再次被带回罗马书六章 11 节上面，我欣赏它的教训，然而我不了解为何它在我身上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因为没有人给我点出「知道」（第六节）必须在『算』之先。有几个月我一直困惑，迫切的祷告，查读圣经寻求亮光，我对主说：『假如你不带我看见这最基本的真理，我就不原再传道，我要先把这点弄清楚。』

「有一天早晨——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一天！——我在罗马书看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罗六 6），『知道！』我怎能知道呢？我祷告说：『主啊，开我的眼睛！』接着一刹那间我看到了。我早已读过哥林多前书一章 30 节：『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我翻开再把它看一遍。『你们得在基督里是神的作为！』何等惊奇！假如基督的死是一个确切的事实，而神又把我放在祂里面，那么我必定也死了。突然间我明白，我是与基督合而为一，而且我已在祂里面，当祂死时，我也死了，我向罪死是一件过去的事，而不是将来的事，这件属灵的事实向我揭开了。我欢欣地从椅子上跳起来，跑下楼对在厨房工作的青年弟兄说：『弟兄！』我用手抓住他：『你知道我已经死了吗？』他困惑地望着我说：『你说什么啊？』我接着说：『你不知道基督已经死了吗？你不知道我已经与祂同死了吗？你不知道我的死是与祂的死同样真实吗？』哦，对我来说它是那么真实！我兴奋地想到上海的大街小巷去宣讲我所发现的事。从那天起直到今日，我从未有一刻怀疑那句话的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 20）

## 第九章

### 脆弱的瓦器

在上海的日子，倪柝声的身体日渐健康恢复，并且继续留在住所里，进行该书的其它部分，他确信神要他完成它。慢慢地，在李渊如姊妹的文字指导下，他将许多痛苦及失败的经历，以及所领悟的真理，用文字发表出来。他也乐于以冷静的态度来观察差会的光景，在此他第一次与中国内地会有密

切的接触，这个庞大的国际性组织，是戴德生所创立，六十年来其福音见证深入中国的内陆。透过与内地会档案部一位元宣教士祝康宁（Charles H. Judd）的友谊，向他见证了神常新的真实。祝康宁是一位在福音工厂上，有长期工作经验的人，他们在灵里很深入地交通，倪柝声常到他家拜访，并且分享读经的乐趣，倪柝声常向他提及愿将福音传遍中国的盼望，当他体力许可时，他们偶尔也与一些青年人到城里的街上或郊区传福音。

这时李渊如姊妹介绍他认识一位元可亲的汪佩真姊妹，她是富有法官的女儿，过去曾是李姊妹的学生。那时李渊如还是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曾一度想破坏汪姊妹的信仰。汪姊妹在青年的时候就蒙召信主，她父母想尽办法要她背弃他，首先以珠宝贿赂，继而刺激她去自杀，最后将她逐出家门。她从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就成为一位自由传道，因为学生们的渴慕，加上她特殊的见证，常在学校中引领许多人归向基督。几年以后她也尝到引领自己母亲归向主的喜乐。

1927 年底的一个主日，倪柝声、祝康宁、李渊如姊妹及汪佩真四人，这是他们头一次在汪姊妹家中聚会掰饼敬拜神。他们继续了几个礼拜，倪柝声已感觉到他必须踏出信心的下一步，租下适当的房子，作为教导圣经和见证之用。俗语有句话：「从小处着手」恰与先知所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终于在 1928 年初他在文德里找到一间房子。从租界地的哈同路向东转入，房屋位于蒲石路北边，在堤岸西边不到五公里。那时又有几位弟兄加入，他们也搬进去住，在楼上聚会直到楼下店铺空间腾出来，可做为讲道的场所。每个主日一早，祝康宁就骑脚踏车，从内地会在吴淞路的总公会处到哈同路与他们一同掰饼，然后回到他自己所负责的教会（该教会是一差会的自由基督徒教会）。但这种配搭并不长久，不到一年，祝康宁就被调回加拿大，就往后历史的眼光来看，与宣教士们在这深具价值的工作配搭，就此忽告中断。

1928 年六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北平，而倪柝声所著的「属灵人」最后六卷已准备付印。他按着原初的感动完成了这本书，这是他第一本也是他最后一本亲自写完的书，其余的书籍都是从他的讲道及教导中誊写出来。属灵人第三卷讨论「疾病」的一章，虽然这章与其他题目均出于经历，但正如其他神仆人的经历一样，不久他也亲身经历所写的论点。因此在许多年后，常提到他觉得「属灵人」太「完全」了。然后它使人产生一种「它是一切问题答案所在」的错觉。因此 1941 年说：「这书不再出版了，并不是我说错了什么，因为我现在再来看它，仍然同意其中的每一个说法。它在真理方面立论相当完全，然而这正是他的弱点。因为当一个人读完了，会使他觉得不再有任何问题了。但我发现，神却不是这种做法，他很少让我们如此认为。因为将属灵事物系统化的危险，就是使一个人以为不需要藉圣灵的说明，就可以领会这些事物。不成熟的基督徒只是一直寻求理解性结论上的满足。神的话有其基本的特质，他总是对我们的灵及生命说话。」由此可知，「属灵人」这本书并非今天的教科书，而是作者个人经历的一个里程碑而已。毕竟他写书时还不满二十五岁。

当时在哈同路文德里的聚会场所，仅仅容得下一百多人。但 1928 年底在这里举行了规模小而具深刻意义的第一次上海特别聚会，从城里各处的信徒聚集在此，并为他们解开神的话，倪柝声的信息得到热烈的回响。因着聚会的体力付出，加上连续不断的帮助那些来访者，再度豪尽了他的精力。寒冷的冬天来临时，他咳嗽又发，体重再度减轻。于 1929 年初，一些家中的事要他处理，所以他就乘机回到福州，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与和受恩教士的最后一次会面。和受恩教士早期带着几分犹疑地将一些

寇迪（C.A.Coates）及达秘（J.N.Darby）的解经著作借给他看。他觉得这些作品很合自己的口味，他就写信给伦敦出版商，索取其他这类作品，结果他与英国的乔治威儿（Geroge Ware）弟兄通信了一年，有很好的交通。他是属于伦敦弟兄会严守达秘信念的团体，他本人寻求一种更原始的基督徒崇拜方式，不受传统所累积的细节拘束。如今他发现自己已步入所熟悉弟兄会先进者的脚踪，主日崇拜的中心是晚间围绕主桌的掰饼聚会，每个人都在发自内心的敬拜与感谢中，与众人同领主的饼和杯。教会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信徒的施洗、解经、信徒彼此照顾、一同关心神的工作，经常公开见证神在基督里的救恩。关于姊妹的活动，倪柝声也和弟兄会一样严格采取保罗对姊妹的教导，禁止她们公开在有弟兄出席的场合讲道，强制她们在教会聚集时带头纱。因为中国女子向来不覆纱或带帽，所以这中纱帽是经过特别设计，用黑线构成一种标准的发网，而中国的姊妹们都愿意遵守这规矩。李渊如及汪佩真两位姊妹，除了在姊妹聚会中讲道外，都放弃了颇受欢迎的公开讲道，而从事个别教导工作。

回到罗星塔，他很清楚指出和教士在为青年人上圣经课时所发生的错误，她谦逊静听一言不发。事实上，她对这些伦敦弟兄会教义的立场感到不安。早在陆忠离开她前往与化沿海附近从事拓荒工作时，就曾他透露过这种疑虑了。她觉得他们不过是一些自视教条纯正，而彼此却不相容的聚会长达一世纪之久他们拘泥于自己的立场，而与其他的基督徒不相往来。但她几乎不对倪柝声说什么话，只是介绍另一位英国传道人也是解经家的奥斯丁，史百克（T-Austia-Sparks）的一些作品给他。史百克有关十字架的信息，颇有宾路易师母的风格，在过去一年多曾给他带来祝福。

这次短暂的拜访使他大得帮助，由于他身体忽好忽坏，使他不能久留接受她的款待。他坐船到南台，在两小时的旅程中他再度发烧。恶者藉肺病所产生的情绪低沉，引发他里面的埋怨：「你本有光明的前途，也有很多机会，而你却放弃了这些灿烂前程来事神。而今你的职事满有前途，以你的恩赐而言，你一定会成功，可是你又放弃了它，为什么呢？你舍弃太多了，而你得到又是什么呢？有时神听你的祷告，但他大多是沉默不语。你跟那些在大型福音机构中的人比比看，他们也有光明的前程，而且能够把握住它，因此属灵事业大得兴旺，工作也得到神的称许，并且使许多灵魂得救，他们也继续追求神。再者，他们看起来才像是个基督徒，这样快乐、满足、自持。而你呢？看看你自己吧！」

上了岸，他回到坐落岸边的家，向父母问安并料理自己的事务。他不顾自己身体的不适，想替他们做一些事。他心想只要他能恢复健康，他愿意为神做任何事。第二天他来到城里，忧伤地避开两处早已分裂的地方教会会所。桥下正好有带着捕鱼鸟的渔夫在干活，他像孩提时一样到停下来注视他们，对捕鱼鸟的耐心大为惊讶，而后他拄着拐杖蹒跚而行。

在街上他遇到从前三一学院的教授，他向教授一鞠躬。教授带他到一家茶馆，经过直截了当的几句话后，教授停下来打量着他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显然带着几分轻蔑高声说：「学校这么多人当中，我们一直认为你是成大器之才。看你现在的样子，为何如此落魄呢？」

传统上，中国学生都很敬重老师，每每以自己学业上的成功来报答师恩，所以这句话无情地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是倪柝声衷心敬佩的人，而他认为倪柝声受教育是枉费了。他在教授洞察凝视下显得沮丧，因为他所说的都是实情，他失去了健康，前途也破灭，他还能拿什么给人看呢？这位他从前教中国法律的教授又问道：「你难道一点没进步吗？没有进展，没有事业，什么都没有么？」那时倪柝声虽已成人，但也几乎落泪。

就在这一瞬间（他后来告诉我们），「我知道什么是荣耀圣灵常在我身上的意义，我能抬头向神说：『主啊！我赞美你，因为我已拣选那上好的道路。』虽然对我的教授而言，事奉主耶稣是全然是枉费的，但这就是福音的目的，把一切都献与神。」

他在家待了一些时日，重温与双亲相聚的喜悦，分享其他家人的喜讯，他们大多已成家。母亲仍精神十足，常常受邀参加祷告会及见证会，同时也享受了带领她年迈从商的父亲，在晚年认识救赎主的喜乐。当他父亲过世时，她哥哥安排了一种道教的葬礼仪式，她为了回避这种葬礼，安排了一项里面抬着一块大石头外面放下帘子的轿子，随着仪仗及穿白衣服哭号声的亲属队伍送殡。她母亲后来知道这事曾威胁着要上吊，但最后老太太虽在世俗中渡过了半生，却终于受感她女儿的恳请，接受了救主。

倪柝声的母亲怕倪柝声不久人世，虽然她替儿子担心，但有时也尖锐地批评儿子许多的工作。倪柝声也说出对母亲在教会服事的意见。虽然如此他还是安静下来，一再为工作的力量祷告，因为他觉得神确实招呼了他。最后神似乎对他说：「把它交给我，这是我的事，你只要信靠我就够了。」但他坚信神的旨意必须看守，所以他尽其所能却无法放松地把事情交托给神，他发觉自己在祷告中被这意念缠住了。

一天他外出在沙滩散步，默想他的困境。突然间他停下来，把手杖插入沙中宣告说：「主啊！我信靠你。我在此放下我得医治的事！」然后他走开了。但在他走了没有几步之后，过去那令他无法忍受的忧伤，又再度侵袭过来，使他出了一身冷汗。他不自觉地又祷告起来，跟神争论痊愈是绝对需要的，但他立即停住脚步，醒悟了他刚才所做的宣告，这个试探是从仇敌来的，方才的祷告就是等于向它屈服。他转身回到把杖插入沙中的地方，指着手杖为见证，宣告说：「主啊！我在此放下我医治的事，我拒绝再提起它！」

当事情办完后，他又起程前往上海。在文德里修养身体，他每个主日早晨传讲福音，劝戒他的听众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完全奉献给基督，晚上则与信徒一同掰饼。几位奉献的弟兄加入他们中间，其中两位是陈约翰和医院的一位眼科医师俞成华，这些人后来在他不在时替他照料事情。不久邻近一所宽约五公尺、长九公尺余的房子，可辟为稍大的聚会所，弟兄姊妹各坐一边，中间隔着一排柱子。楼上更宽敞的空间，提供迅速发展的出版工作。「基督徒报」（有一段时间又称为「复兴报」）出版量急速增加，一种新发行不定期的「查经记录」也出版，但为期很短，这份书报在对外交通方面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倪柝声讲道中摘录出来的福音小册子及单张，成了传福音作见证有效的助益，并且借着这些特殊的文字，使福音见证成为一股稳重的潮流。藉清晰的推理、简洁的叙述、易懂的措词，明白说出得救之道，容易为街上的行人阅读并了解。为了应付另一项急需，倪柝声觉得需要翻译诗歌供崇拜之用，这些诗歌有的是来自和教士处，其余是从英国弟兄会诗本中选出。他自己也撰写了几首诗歌。这时他的健康情形转好，为了使他的肺部更快恢复，医生们建议他到气候有益健康的牯岭静养一段时间。

牯岭位于长江上游一千公里江西省内，正在河港九江的南岸，庐山的高峰中。山坡遍筑西式平房，供上海和汉口一带的商人在此避暑，疲惫的宣教士家庭也轮流到此退修。高大的荷花开满在林荫的花园中，多岩的山中幽静小道跟个引人许多盛景。山腰底处，由木栅所围起的租界区外，是一个名叫「狭

口」的中国市集，它的海拔约有一千多公尺。

倪柝声接受劝告不得攀走登山梯道，而乘轿上山。设备完善的差会疗养院一天要十两银子，他连这点费用都付不起，所以有一位南京的姊妹替他在「狭口」一百零三号找到了一个住所，且与隔邻的机器工人夫妇一同搭伙，受到他们热烈款待。早晨在牯岭山的朋友找他出去谈道，但下午他宣布「绝对没空」——要躺下休息。

在那儿，他曾被请去探望一位从厦门来，名叫殷祖澜的年轻人，他刚从美国麻州波士顿回来，是学工程的，他到牯岭来是为治疗突发性胸疾，他的母亲很关心他的属灵光景。当倪柝声在疗养院病房探望他时，殷氏话头锋健、无所不谈，终于他谈到反对母亲信仰的理由。倪柝声在起身离去前，说：「这些真是你的问题呢？或是你藉这些问题筑起一道篱笆，使你的灵魂不能得救呢？」这一问可把他问住了，回到厦门仍无法打开它，后来他找另一位福建人宋尚节，他是刚从美国俄亥俄州得到博士学位，这位神仆人引领他归向了救主。

倪柝声与接待他饮食的主人非常相投，然而两个礼拜以来，除了饭前安静谢饭以外，他没有跟他们谈到一点福音。后来有一天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他告诉他们主耶稣为他所做的事，因为他们的心灵饥渴，所以他们热切地倾听。很快地他们就以单纯的信心来到救主面前寻求赦罪，一股新生命的亮光及喜乐进入他们的生活中。倪柝声便开始与他们一同读经，向他们解释神的圣灵是如何住在他们里面，并要把圣经向他们开启。

他在牯岭修养了好几周，偶尔散步到一个地方，从那儿他可以俯览远处褐色的长江，无数的帆船点缀其间，江流蜿蜒穿过景物交织的平原。他再思想他的基督徒信仰，发现了心灵的安息之所。他说：「起初我来到主面前时，我对『基督徒』已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尽全力去做我所想象的那种基督徒。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从早到晚都带着微笑，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流一滴眼泪，他就不再是一个得胜者，我也认为一个基督徒必须具有无限的勇气。任何情况下他若稍有畏缩，就达不上标准了。」但是当他按着圣经篇章读到新约时，他一再读到保罗自传式的书信——哥林多书后，常被其中「似乎是忧愁……」等的字句抓住。这位伟大的基督徒保罗，他曾「多多地流泪」，他会「心里作难」，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他一定有相当的人性。他自问，这怎么可能？保罗曾经失望过吗？这就是他人性的所在了！他说：「我发现保罗是一个人，正是我所熟悉的那种人。」于是基督教信仰的奥秘向他开启，总结在几句话中：「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四7）这时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就是安息在祂里面，正如他过去时刻学习信靠神一般。

随着季节转换，天气逐渐冷了。日子到了，他不得不与他的新朋友道别，回到上海。这次他慢慢沿着岩林中的石阶步行下山，旁边山泉汇成急流到了山脚，他雇车到九江搭江轮回上海。

几个月后，一天在文德里楼上，有人传话说一个客人正在楼下等着见他，原来就是他在牯岭狭口的屋主，他有事来上海，随便来交通他所得着的经历。原来他过去有个习惯，在冬天的月份每餐都要喝酒，而且常常喝得过重。这次天气又转冷了，酒又摆在桌上，那天当他低头谢饭时他竟说不出话来。他再试了一两次都是徒然，他转头问他太太说：「有什么不对劲呢？为什么我们今天祷告不出来？把圣经那来，看看上面对喝酒是怎么说的。」但是他翻来翻去找不到这方面的教导，而能给他们帮助的倪柝声却在千里之外，而且要几个月才能见面。他太太说：「你且喝你的酒吧！下次我们遇见倪柝声就问他

这件事。」但是这位弟兄发现他就是不能为喝酒谢饭。他决意说：「把酒拿走！」他太太只好依他，把酒拿走后，他们一同为饮食谢饭。

这位弟兄把这故事告诉给倪柝声后，他很希奇地大声说「倪弟兄，里面当家的不让我喝酒呢！」倪柝声说：「很好，你要永远听里面当家的！」

1930年五月有一天，倪柝声收到罗星塔来的电报：「和受恩教士安息了，被主接去，荣返天家。」古田医院的挪威护理长罗兰姊妹（Serene Lonland），在她生病时匆匆赶到下游，寸步不离地照顾她。她享年六十四岁。在她临终时，以前的七位的老同工只有王连俊在场，之后陆忠信及缪绍训匆匆赶去与王连俊一同把她安葬在河岸的山坡上。她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一分钱。

当倪柝声回忆她一生时，心中只有感谢神。在白牙潭时，他常为和教士的孤独环境感到困惑，论到她对圣经有如此活生生的认识，为何该书的作者——神——不更大用她呢？但在以后的年岁中，事实显明了神的作为，许多在福音工作上有前途的青年弟兄姊妹，因接受她的教导而承受了属灵的产业。特别是王载弟兄，日后在香港差会的教会中成为有名的布道家，同时也在印尼中国海外联合宣道会（China Overseas Missionary Union）服事。倪柝声日后说：「在与和受恩教士交通的那些日子，神以很真实的方式使用她。」现在他回忆起她的一首诗，这首也是他越来越喜欢的：

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  
如果你是命定要我历艰辛，  
就愿你我从兹，交通益亲挚，  
时也刻也无间，弥久弥香甜。

她所关心的永远是，看她自己这一面是否阴影。当她遗言要送给倪柝声的大字圣经从福州寄来时，他在里面发现这段祷告词：「哦，神啊！赐我一个完全及没遮掩的启示，使我看清自己的本相。」在空白页上，她很早就些下一句话：「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这句话成为倪柝声日后的座右铭。

## 第十章 觉 醒

1930年倪柝声、张约翰与来自英国的弟兄有十天愉快的交通。查理巴罗弟兄（Charles R. Barlow）系英国彼得堡人，是与弟兄会「伦敦派」有关系的信徒。他被英国工程公司派到上海。他与倪柝声及其他人交谈过，在寄回英国的信上他发表自己的观感：「这里有些弟兄非常虔诚，渴慕真道。无疑倪柝声是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一位，而且远超过其他人。他只有二十八岁，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显著才能。他是一位勤快的工人，阅读很广。同时他也是达秘弟兄的高才生，要显然是从达秘著作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对倪柝声来说，这位访客暂时弥补了自祝康宁离去后，他需要一位元成熟而有智慧的友伴之空缺。虽然这位弟兄不是宣教士，只是「一位亲爱的弟兄」而已——但他的确得到一位知己的朋友，倪柝声很高兴地提到从他所得的帮助。不久巴罗弟兄就被邀请在每天下午四点的例行聚会中向四十多

位信徒讲道，其中包括少数大学生，主日下午人数激增到八十或九十，接到他报告的英国信徒们均大得鼓舞。

留给这位访客最深刻的印象是，倪柝声在圣经经文上的知识。巴罗弟兄见证说：「当他忽略了新约里的某一点记载时，他曾不经意地加上一句：『我以为一个月读一边新约就够了呢！』」而陆忠信弟兄也留下了相同的印象。几个月后陆弟兄与太太英妮在上海时，他说，倪弟兄在深夜探访他们时，手上还带着圣经。陆弟兄问他：「这么晚了，你还上哪儿讲道呢？」他回答说：「不上哪儿，不过今天还有几章圣经没有读完罢了。」可见他在前十年读经之殷勤，仍然保持到往后的年日。多年以后李常受谈到他时，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熟悉圣经的。」

这年年终，他们在文德里扩大的会所中内，举行上海第二次特别聚会。一位内地会的观察员说：「这些年轻的基督徒正在差会外，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这次聚会共有十二天，他们每天有四个钟头的祷告。大约这时倪柝声母亲曾到哈同路短暂地停留一下，她写道：「我孩子所讲的太深了，我听不懂，又太骄傲，不好意思请教别人，所以我从他们那儿获益很少。然而看到他们的生活，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到目前为止，他们所用的诗本不过是小册子的形式，有一些收集的诗歌，印成「颂赞诗歌」（小群诗歌）。在一百三十四首翻译过来的诗歌及自己撰写的诗歌中，有许多唱起来并不很和谐，但却永远带着热诚。这些诗歌在家庭及教会中受到普遍的欢迎，并且把圣经思想传播到遥远地区，同时诗歌的出版也产生了看不见的副作用。

倪柝声害怕有了宗派上的标签，正如以安立甘、路德、受浸、国名、人名或实行程式的简称为标榜之做法。他非常严格地把自己限制在纯粹圣经的用词上。他称基督徒的生活为「路」，信徒为「基督徒」，地方聚会场所为：「教会聚会处」，定期刊物为「基督徒报」，文字办公室为「福音书房」。他以弟兄会的「小群诗歌」为其翻译诗歌的来源，他也延用这个名称，因为这名称也合乎他依据圣经的作风。这本诗歌里面的内容，容易记忆，毫不矫饰，在中国引人入胜。经过一年，哈同路的会众就被差会方面的人加上「小群」的绰号。虽然诗本名称不久即简化为「诗歌」，但伤害已经造成，标签已贴上了。当倪柝声的工作推广到全国各地时，所有各处的信徒团体，都被别人加上「小群教会」的名称，这个名称是他们引以为憾，而自身永不使用的名称。

上海的特别聚会几乎刚刚结束，城内便发生事故。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满州）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恨，发展成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方要求上海市有所行动，但为市政当局所拒绝，后来日本藉保护日侨为名，以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敌对情势于五月停下来，然而这只是将来事件的征兆。

奇妙的是倪柝声的健康终于好转，神已经挪开了祂的手，他不但得以自由地教导圣经，而且能更广泛地旅行。这些年间长江流域洪水为患，不少人因而丧命，但是其他支流上的许多城市，如首都南京及中游汉口等地的工作正在增长中，这些地方都包括在他的行程中。一有机会他访问了北平，在那儿第一次与有魄力的基督派牧师王明道有亲密的交谈。

在山东省沿海的青岛市，他遇见了非常活跃的灵恩运动。他很仔细地观察此种不加约束的感情表现及使用过度激发方法的聚会。在1932年夏天出版的复兴报上刊登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怎样分辨属天的灵浸，与以某种外面表现为灵浸之主要典型的说法。他赞同和受恩教士的看法，引用她的话：「人



们无需去感觉来自圣灵的能力，那并非神赐下的目的。人的责任就是顺服神。」在山东避暑区烟台，他第一次遇见李常受弟兄。李弟兄是烟台人，父母为佛教徒，他于1927年二十岁时悔改信主。自1927年起他就接到倪柝声的刊物，他很快的学习而有了传道及解经的恩赐。这时神向他提到受浸的见证，在一个假日的夜晚，倪柝声在黄海边替他施浸。

这种新方式的释放运动，其果效在于藉由被广泛被人阅读的小型报纸，使读者与编辑有了接触而产生更新。当哈同路的聚会被一些人视为宗派时，在其他更新圈子里的人们，不久就发现倪柝声具有彰显基督的惊人恩赐。济南是山东省会，位于黄河边。一些齐鲁大学的教职员，每年按惯例邀请一位布道家或圣经教师开特别聚会。齐鲁大学乃是一所联合学院，吸引了由各省来的学生，而以思想进步及自由神学最著名。然而几年以来仍有一小群传福音的教职员每周在史提恩医生（Dr. Tronton Stearns）夫妇家里为属灵复兴祷告。每逢假期他们便带领成群的学生，到山上开退修会，尽力邀请中国最好的教会领袖和布道家作讲员。这位长老会的宣教士史提恩医生，在医学院担任骨科教授，为人非常谦卑，他为首领导这些活动。

1931年十二月，福建兴化（莆田）宋尚节博士旅行布道经过济南，他在史提恩博士家中的一次讲道后，几天内就有四五十位学生接受基督。神的灵开始在学生中间工作使人认罪，史提恩夫妇因他们的渴慕追求大得激励，于是邀请他们参加春季退修会。大家一致同意请王载作讲员，但他在爪哇有事无法分身前来，有一个从福州来的学生提起倪柝声的名字，说他的信息相当好。这位少人知道的上海传道人不接受预约讲道，据说很难请到，史提恩博士经过祷告后写信邀请他，倪柝声觉得方便，所以答应下来。

他来了，神也与他同在，一个礼拜多在医学院礼堂向拥挤的会众传讲生命之路。长久盼望的复兴已经到来，更多的学生接受救主，许多人的经历成了极美的见证。其后一群一百多位的学生聚集在泰安的一个山上，相传是孔子陵墓的所在地，他们在那里读经、祷告，在结束前一大群人到山间冰冷的水潭里受浸，公开地承认耶稣为救主。

同时，查理巴罗弟兄访问上海所感受到的火热，已传回到英国及与他们有关的各处英语聚会圈中，他的报告使他们产生了一个感触，觉得这是神的灵在中国动工，而聚会的起始也确与他们中间所发生的相仿。就他们所见，中国弟兄的交通方式，对他们而言是依据真理，而交通所反映出来的原则，也与他们所承袭的相同，而这些原则是他们一世纪前就开始使用的。于是他们就派遣代表团，来上骸与中国的弟兄相聚，自1932年五月，他们开始与倪柝声及其同工联络，准备同年秋天来访。

中国的弟兄反映热烈，安排这些访客于十一月到同哈路聚会。八位外国客人中有六位弟兄、二位是其弟兄的太太。他们在十月廿三抵达上海，被安顿租界区一所舒适的旅馆里。查理巴罗弟兄与一位美国加州的弟兄在温哥华相会，他们带了太平洋西岸及英国信徒的祝福，此外还有一对英国夫妇，及四位来自澳洲的代表。他们为中国信徒的热诚款待大受感动，因而报以真挚的爱心。倪柝声在他们抵达时起初有点不适应，但不久他便能参加为期两周的亲切交谈。第一周这些访客要求暂时不参加中国信徒的主日掰饼。他们一边祷告、讨论，一边则小心衡量所看见及所交通的事物，惟恐有什么差错。他们怎能代表国内的弟兄赞同神所不称许的事物呢？然而有太多的事物加强了他们的信任，如：敬拜的态度、对圣经的顺服、祷告，弟兄中显出权柄及姊妹们的温柔与安静——她们似乎是蒙头的。

在十一月六日主日聚会后，他们预定有一周的会议，大约有四十位弟兄是来自各地的代表，一同加入上海同工中间，此外还有几次公开的聚会。在此之前，倪柝声早就写信给他父亲，请他从福州买二百张椅子，每张椅子三元，用船运到上海，以补充现有长板凳之不足。早先，当他身体康复时，他有感动写信向他母亲道歉，说他在病重时曾对她态度冷淡，而她母亲回了他一封严厉的信，历数他的不是，却忘了（她后来承认）自己为人母的失败，现在她决心要补偿他。倪文修对买椅子并不在行，她便去定做，并委托他们装船。就在这时，这批椅子几乎失掉，因为一位贪婪的海关检查员想没收椅子及侵吞五十元报关费，她丈夫到海关使他们放行。但到了海上她又跟船长理论不合理的船价，因王连俊弟兄已跟他们说过这些椅子算作是随身行李。五日早上船到长江口时被大雾困在航道的深水岛，她为不能赶上时候而失望时便与两位朋友一同祷告，她公开向神祈求使雾散去。她说：她仿佛看见椅子摆好在哈同路的异象。雾散了，船在抵达黄浦江后，海关又再度阻挠他们在码头卸货，和平也因排椅子手上沾满了灰尘呢！

现今这些访客在神面前觉得稳妥了，再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们承认这些中国的信徒，便打电话给温哥华和布里斯班（澳洲）的「两个有交通的聚会」，告诉他们的观感。他们与中国弟兄的交通即得到印证，便于十一月六日主日晚上与中国弟兄共聚在主的桌前，这时的喜乐是不可言喻的。

次日早晨，特别聚会在双方的祝贺中进行。主要的讲员是查理巴罗弟兄和豪斯（W.J.House）弟兄，倪柝声则担任他们的翻译。陆忠信与一些南方来的弟兄也在场，有来自长江上游和较远的北方，包括从江北来的两位季氏弟兄，从前他们在长老会差会有「北江苏慕迪」之称。这些访客报告说：「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弟兄，都是有分量的人，工作的进展也使他们得到鼓舞和操练。」

几位参加聚会的江苏弟兄，请他们访问江苏各处的教会。但北方地区年初就有大骚乱，惟恐他们的客人会受到土匪绑架的风险而作罢。访问团的两位弟兄豪斯与巴罗表示，盼望去看看各地工作开头的光景，于是他们坐船到厦门参加这地区的联合聚会，陆忠信先行前去会见王连俊，欢迎他们到福州访问。他们在强劲的季风中航行，访客终于到达福州，并在倪柝声父母河边的家中，接受招待。那次聚会人数多达二百五十人，他们回上海后，因此看到他们兴盛之光景而大受激励。

访问带回去中国弟兄的见证，得到相当热烈的反应，于是在 1933 年春天，他们邀倪柝声夏天带俞成华或陆忠信同行，到英国及美国访问。这时俞成华正患肺病，而陆忠信则到远处，倪柝声并没有说出他们两位也在邀请之列，他自己有些预感，思想难道神指定他作中国百姓的守望者吗？无论如何，同弟兄们祷告之后，他决定独自前往。到欧洲的旅程中可以在新加坡停留，他暂时停留了一会儿到他瓦问林氏父母问安，此行他心中得到神新赐下的平安。

长途的海上航行，带来的是休息和读书的时光，迟至六月他才到达英国，身心大得更新。查理巴罗来接他，把他带到彼得堡的家中。他访问了散布各处的聚会，例如苏格兰、伊斯灵顿（Islington）、克罗伊登（Croydon）及文特诺（Ventnor），在这些团体中他嗜到热烈的爱心与回应。他的来访对信徒们实是一件崭新的事，因弟兄会本身没有向海外传道，他应邀报告工作情形，当然也受邀参加主的晚餐，虽然他的英语使他深感受限，但他有时也传扬主的道，他也与他们中间的年长弟兄们多次长谈。中国信徒向来被这些款待他的人看为是很不成熟的基督徒，须要很多的教导，加上倪柝声当时只有三十多岁，不过被看作一个学生而已，虽然他的智慧及资历在本国受到人们的钦佩，但他还是预备接受别人

的建议。他谈到同工们在上海经常遇到的实际问题，例如有人问：「我要受浸，但我有两个太太，我该怎么办呢？」之类的问题，使他大为震惊。

至于青年朋友们，倪柝声轻松地提到中国信徒聚会的简单规条，例如：「不读经，不吃早餐！」或是讲些福建「剪刀鬼」的民间传说来娱乐年轻朋友，据说那些鬼会在人们的油纸伞上剪了许多洞，使雨水漏下。当他没有谈话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聆听和观察这个团体中丰富的知识。但他却不止一次听到他们自满的谈话而深感困扰，那些话常是这样：「这属灵启示的领域里，还有什么是我们弟兄会所没有的呢？要我们读其他基督徒所写的东西，简直是浪费时间，难道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得到的呢？」有一次在伊斯灵顿公园街的聚会里，他被邀请参加讲评，在他听完一段关于信仰的长篇讨论后，终于发泄出积压已久的不耐。他挺身而出，身长足足有六尺之高，伸展一下双臂，说到：「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固然广博，但在我的国家里，这些知识对你们也许是太多了，」他一面说一面握起拳头：「当真有需要时，或许你们连一个鬼都赶不出去！」后来他对这句冲动的話，觉得有点难过，但这也显示出他对那位元未见之神的真实认识。当他离开英国的时候，他坦诚地把他的观感告诉他的朋友查理巴罗说：「你们这里的人虽有奇妙的亮光，但信心却太少了！」

他在英国以后的行程是由巴罗弟兄陪同，或许有其他弟兄随行。当经过爱丁堡时他趁机拜访了那位属灵的乔治卡丁，就是那本流传广泛的福音小册「救、知、乐」的作者，那时该书的发行量已达三百万本。约有一周之久他借口有事要去伦敦，并没有告诉巴罗，他暂时打破了过去这些日子的活动，因为这个圈子相当的封闭。就在那个主日他到南伦敦荣橡路的基督徒中心和他们一同敬拜，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福音团体，由史百克的服事而成立的，史百克曾是浸信会的牧师，这是他十分想见的的朋友。乔治巴特森和其他弟兄热烈欢迎他，他与他们有交通及话语的服事，并高兴地与他们一同掰饼用杯。

二周以后，他在英国的日期已满，除了那次破例之外，一直都是在这个十分封闭排外的基督徒团体中，没有与广大英国福音教会的生活和见证接触。当时纽约布鲁克林教会的詹姆士·泰勒（James Taylor）是位年长弟兄，他的信息广播各处，弟兄会的「伦敦团体」相当敬重他，他来英国已有几个礼拜，他打算陪同倪柝声一起横渡大西洋回美国。泰勒是位老练具透视力的长者，他很高兴认识了倪柝声，并且十分敞开而自由地谈到中国的工作情形：如中国教会的情况，属灵的要求，并征询倪柝声许多意见。当他们谈到教理时，特别是有关预言方面，他发现倪弟兄对于基督再来临的道理是他不能赞同的，他在更进一步的询问下，认识倪柝声的某些观点是一种显然的错误。他们抵达纽约时倪柝声受到相当热烈的欢迎，他在韦斯斐特（WestField）讲道，主题是「从罪中得释放」，虽然大多数的人认为相当好，但在泰勒的评论认为「在教义上有缺欠。」

同时英国一位年长的弟兄，有一次在往格拉斯哥（Glasgow）的火车上，发现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少女正殷勤地阅读圣经，当和她谈得较深入时，得知她在荣橡路聚会，更进一步探询时，知道在上周末有一位十分有趣的中国人曾到他们那里去。他怀疑是否有人没把倪柝声的行踪报告清楚，因此他决心调查。那夜乔治·巴特森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你认识一个姓倪的中国人吗？他有没有和你一同交通与掰饼？」面对没一个问题，他的答复都是：「是的，」然后电话的另一段突然挂断了。他想：「或许有什么麻烦了！」

很快地有电报打倒布鲁克林泰勒那里，但那时倪柝声已离开，前往纽黑文（NewHaven）。他到美国

的主要原因，是要去探望史提恩夫妇，他们是曾经到他济南家里度假的朋友，他和这两位朋友同住了几天。那个主日他不顾泰勒明白的劝告，在史提恩家中，与他们家人及另一些人一同掰饼，正如他在中国做的一样。泰勒在忧伤中写到：「他不承认自己违反了原则」。由于倪柝声所处的立场使他自己相当受压，以至在他回到上海和同工商议前，他婉拒用口头或文字作任何表明，泰勒看到他们一同前往温哥华，而且倪柝声参加了那儿的特别聚会。

「伦敦团体」的聚会原则，是尽量避免和其他基督徒的聚会有来往。实际上，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人，是不允许和圈内的人有交通，除非他愿意从那时起，把他的聚会限定在圈内，这个规条也包括一般社交关系，后来詹姆士泰勒更严格执行这种规条。直到六〇年代的早期，这个运动因着这种规条产生痛苦的分裂。

虽然如此，倪柝声在温哥华，仍然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并被邀请在聚会中讲道。他似乎享受到真实的自由，因为至少有一个年轻的加拿大人找到了救主，正如他在英国时有许多人因他蒙恩一样，这些是他值得回忆的事。他在那儿也与一位好朋友——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祝康宁——有很好的交通，并且拜访了琳娜，克拉克（Lena Clark）她曾经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在四川工作达二十三年之久。她自1929年就辞去内地会的工作，现在她回来加入哈同路基督徒聚会的交通。

在倪柝声返家，横渡太平洋漫长且宁静的途中，神似乎定意在旅程引导祂的仆人。神给倪柝声一种新鲜的启示：基督就是他的生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敏锐的觉察到自己在行为上不能讨神的喜悦。他说：「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时，有许多人告诉我，要我过与基督一样的生活。几年以后我很惊奇地发现，我时常控制不了我的脾气。甚至当我定意设法控制它，使它不爆发出来时，里面却是愈发翻腾，叫我更痛苦及失望。过去那些劝我的基督徒朋友，由于我先前给他们的印象很好，使他们毫不迟疑地告诉我，我现今的生活真是不如从前。他们说过去是如何谦卑、忍耐、温柔及可爱，但现在变得……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批评并非没有根据。我的情形怎么会演变成这个地步呢？症结在哪里呢？」

他说，过去他认为基督是与他分开的，他很难把祂那令人称赞的性情：如温柔、忍耐、爱心、智慧、圣洁等，在实际上与他认同，而这些性情正是他深深感觉到自己所缺乏的。他说：「整整有两年之久，我是在黑暗中摸索、寻求，积聚这些美德作为个人的产业，好叫我可以建立基督徒的生活。（正如我重生以前，为自己积聚属世的东西一样）虽然努力，却没有进展。症结在于我一直在积聚一些东西——即属灵的事物，以致神不得不亲自伸手把我从中救拔出来，好为他儿子的生命开出一条路来。」

「后来，在1932年的某天，亮光裂天而降。当我重读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时，我突然看见基督在祂的丰满里，被神命定为我的一切。这是多么大的发现啊！哦！这些『东西』是多么虚空啊！若我们离了祂，即使我拥有了这些东西，那也不过是死的。因为神所寻求的，不是我们表现出像基督的样子，而是寻求基督得以在我身上的彰显。一旦我看见这一点，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祂自己就是一切神圣事物的总结，所以祂在我里面满足神所有的要求，这不是将来才要发现的一件事，而是现在所要接受的事实。从此以后，我每日的基督徒生活可以用『接受』这个词来概括。」

# 第十一章

## 新的历程

一回到中国就有许多事等着他去做。上海的弟兄与西方朋友间的联系，辛苦拖了两年之后，终于令人遗憾地收场。但这件事却未影响他们对福音广传的工作，及对神工人的教导和训练。倪柝声工作的能力是基于一个事实，就是每个信徒都是一个不受薪的工人，而且每一个因经商或公职迁徙的人，都能使他的家成为祷告的所在和新的见证中心。那时中国道路系统和新的铁道不断的开展，配合着迅速兴起的航空事业，环游全国一天比一天方便。对弟兄们而言，某些新的工厂即将打开，倪柝声在新年谈话时，把他们的思想引到建立教会这件事上。他在西方的观察，发现许多反常的情形，这些情形使他再度回到新约来查证，他在新约里看见而且得到证实的简单原则，即「一个城镇或一处村庄应该只有一个而非许多教会」。这是他过去在那些封闭的朋友们（弟兄会英伦派）中间，看见且运用得相当满意的简明原则。

然而他并未因此歇息，曾有一段时间他想亲自到西南边陲、云南及贵州诸省，好从他们中间得到该地百姓的资料，了解他们的属灵需要。一九三四年春天机会终于来了。

有位马先生刚信主，并在他受浸时取了一个名字叫马牧。他以长江河港岳阳为中心的事业颇为成功，于是有意把生意开展到贵州省。他是个非常率直的弟兄，拥有一辆福特汽车和一股冒险犯难的冲动，现在又加添传福音的热诚。他与倪柝声两个人凑在一起，计画了一项西南边区的汽车旅行，包括了公路所能达到的地方，倪柝声搭船到岳阳和他会合，一同实现这个计画。

他们的车上载满了油桶和福音单张出发。绕着湖南米乡的大盆地而行，先向南行，经过湖南省会长沙，而后转向西北常德。他们缓缓而行，马牧负责驾驶，每遇渡口或路人群集之处，倪柝声就起来站在车上，向他们传讲基督。

沅江通航甚畅，为西南贸易的通道，沿着宽敞的河谷，他们来到了沅陵。山坡上的丘陵地带，燕麦大麦并植。沅陵位于共产党贺龙第二军驻扎基地桑植进军范围之内，当他们爬坡驶向湖南边境时，一切平安无事。这里的许多城市虽有欧洲宣教士设立的福音前哨站，但仍有许多乡下福音未曾传到。

贵州是一个急速改变的省分，过去修筑到城门口的道路，现已延伸到乡间。盘旋的马路代替小径，蜿蜒地绕过山岩。有些险阻的道路，需要克服困难方能通行；而已完工的路面，亦多崎岖不平。马牧患深度近视，戴着厚厚的镜片，在未设栏杆的急转弯处，只要稍有疏忽，就有坠下陡岩的危险；因此他的膀臂也「不管用了」。这时倪柝声，虽然没有什么驾驶经验，却较为镇静，所以就接过来驾驶。

在省会贵阳，有一群信徒在家中聚会，他们受到当地信徒的欢迎，并花了几天的时间和信徒们一起交通。倪柝声向他们讲了几次道，马牧有一次听见倪柝声谈及教会历史的概要，他提到一大堆的日期、姓名和人物，居然连笔记都不用看，使他感到惊奇。然而他们在此也开始感到「前途茫茫」，有人说他们所行的那条漫长的道路，并没通道云南，他们已经行车至此，便冒着天寒向前挺进，决心继续向深山推进。山峰尚存积雪，他们穿过杜鹃花和灌木丛间，愈爬愈高，下坡时总是熄火沿坡而行，以节省

匮乏的汽油。马牧谈起福特汽车马达运转的韵律声，及倪弟兄在小驿站的讲道声，仍深印他日后心中。但当倪柝声到了更高处时，发觉他的心脏不断的给他带来困扰，提醒他早年的宿疾快要发作了。贵州的雨虽然渐少，然而云南的风势却愈刮愈强，他们到达一个地方，当地的部落欢欣地迎接他们，并帮助二人把车子推过几处正在施工的地方，一位工程师告诉他们，他们是第一批通过这漫长公路的旅客。旅途的兴奋驱走了寒意，他们开始踏上遥远的下坡路直驶高亭平原，两侧稻畦村舍，春禾绿野。途中也有几个步行的客旅，而最后一段可行汽车的路还算平坦。当他们在往昆明的路边，大胆尝试前所未有的见证时，却因听众询问有关汽车方面的事给打岔了。当这些人发现，这辆车子是从湖南一路开来此地，他们的名声便不径而走。

他们不远千里而来，是带着特别的目的，要从昆明以北，横渡金沙江通往藏胞居住的所在地。从前在上海时，曾有来自云南的弟兄，他们被神呼召向藏胞传福音，那时倪柝声就想亲自去看看。经过几天的艰苦旅程，他们来到山里的一处市集，藏胞常常携带他们的货物到那里赶集。马牧回忆到此地的藏胞特别殷勤好客，常是一碟还没吃完，又重新给他们添满了。然而倪柝声却籍着一个翻译员，意识到他们灵里的黑暗，需要救恩的信息。

他们前往西南的全部行程，真是按着神所安排的时间。若是再晚两年，就会遇到剿匪战争，想要走这么长的旅程，根本是不可能的。

倪柝声回到当时的大商埠汉口，他停留在那里，带信徒查考雅各书。这些查经得力于弟兄会注释家顾特弟兄（C.A.Coates）的帮助，虽然倪柝声和兄弟会之间关系紧张，但他承认自己从弟兄会的著作中得到许多的帮助。

他从汉口回到上海，在夏末时曾和宋尚节及王载等欢然合影，这次聚会是由一位姓李的教会领袖安排的，目的是希望将三位元恩赐、方式和展望迥然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他们这次聚首，就像过眼云烟一样，后来仍然是各奔前程。王载不同意倪柝声讲述无薪制的话语执事，也不赞成他离开差会自立的工作。他恐怕这样做，只会造成中国教会的分裂和损失，然而在往后的岁月里。因着事情演变而有的亮光，王载则慨然地赞许倪柝声果敢不屈、坚守原则的立场。

宋尚节和倪柝声从未携手合作过，虽然他们彼此都曾收割对方所撒的种子。宋尚节从那次见面以后只活了十年，他是个旋风式的布道家，他的讲道配合感情的作用颇能吸引听众。一个朋友形容他是个「独断而固执，却又经常猝然地改变既有的路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断语」。虽然倪柝声在传道方面更具有才能，但神却使用宋尚节把群众驱进神的国度，他传道所经之地，复兴之灵好象野火燎原般燃起。一位观察者曾这么说过：「当他讲完道，群众苏醒却饥渴，那时没有人喂养他们，而倪柝声的教导职事，正适时地弥补这个空隙」。然而宋尚节曾直言无谓地批评倪柝声，而倪柝声也曾私下表明，他对宋尚节在神学思想上的不成熟及在工作上缺乏持久性，而未予十分重视。从这里不难发现倪柝声十分渴慕神的膏抹，他或许感到宋尚节拥有他所缺乏的恩膏呢！

随之而来的第三次上海特别聚会，他讲到基督是圣经的中心，同时也是神子民的生活中心。这次聚会李常受从曲阜来参加，也有从江苏、山东各城来的，他们的教会自一九三二年倪柝声访问后便迅速兴旺起来。弟兄们也把工作分成三个四年阶段，其开创期是：福建起自一九二四年，上海起自一九二八年，北方起自一九三二年。

就在那时，一位倪柝声意想不到，却是他过去十分喜爱的人，又重新出现在生活中。自他从英国回来后，就知道他就学时代的青梅竹马张品蕙，在燕京大学读完了英国文学硕士已返回上海。在此之前，他记忆中的她，还只是个爱世界的女孩子，喜欢穿戴时髦。但她参加文德里的几次聚会后，在那里遇见主，不久她就要求受浸。年长的姊妹也见证她完全的转变。当倪柝声遇见她时，就他本身的观察，也证实她实在是改变了。这次的相聚，又燃起了他那埋藏已久的感情。

张品蕙的二姊品芳看穿了这点，就开始在其中拉线。她找到倪柝声，并从自己的犹豫中探索真相，对他说：「现在品蕙已成为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十分坚定地服侍主」。她问道：「你愿意考虑和她结婚吗？我有把握她不会有什么反对。」

然而他还是祷告又祷告，直到清楚那是神的旨意，因此才顺从心中的感动。然后他在福州发了一封快信，请求双亲帮忙他安排婚事，倪母吃了一惊，想起自己从前在锡瓦订婚的事几乎铸成错误。然而当他们一到上海，就听到许多流言蜚语，据说张品蕙有个守寡的姑妈张美珍女士，非常反对这项婚配，不愿她那才貌出众的侄女，嫁给一个为人所藐视的穷传道。同时在一些把倪柝声偶像化的信徒中，也引起了想关的疑虑，他们对像他那样祷告的人，居然还会想到「性」和家庭生活感到震惊，更糟的是，他居然考虑去娶一位燕京大学的校花呢！

但是他的母亲去见张品蕙的伯父张端官，他是张家的族长，叫她得安慰的是他也表示赞成。接着倪母邀请张品蕙陪她到另一城市，去参加福音的聚会，她们同室住了一个星期，一起生活，一起祷告。回程的时候，神给了她完全确信，知道张品蕙就是神为她儿子所预备的人。

十月初，大约有四百位信徒聚集在杭州，地处陡峭的浙江丘陵及平静翠绿的西湖之间，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古城。栾腓力弟兄曾在此安排了一次特别的聚会，以坚固这块对福音反应还不错的地区工作。自从汪佩真姊妹首次访问这个地方，在妇女中间工作后，小型地方聚会就在浙东兴起，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信徒，有来自浙东诸城，如：奉化、温岭和舟山等地，其余则来自江苏的苏州及其他中心地点。倪弟兄在那里讲解圣经十天，既是日后称为「得胜者的聚会」的文章。由于他父母也都来参加聚会，使他喜出望外。会后头一天，订为婚礼的日子，他不慌不忙，连作新郎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概念，以致陆忠信在结婚当天早晨，不得不拖他到估衣铺买一件二手货的衣服，作为新郎官穿的结婚礼服。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的下午，正巧也是他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倪柝声按着基督教的仪式，在一大群信徒面前和张品蕙结为夫妻。他们一同感谢神，所唱的诗就是十年前倪弟兄因她而写下的那首诗，然后大家一同爱筵交通，共有三十桌客人。

然而风暴终于产生了。当他们回到上海时，发现张品蕙的姑妈张美珍，公开且愤怒地攻击倪柝声，她在一份全国性的日报上刊登广告，在典雅的措辞下质问这位穷传道为什么夺去她心爱的侄女？他如何养的起这位养尊处优的姑娘呢？更不用说要是她满足。即使他能，那也一定是他从外国的财源得到资助。这种说辞等于是含沙射影地诋毁他的德行。文章中攻击气味十足，不久便落入那些嫌恶他影响力之人的手中，做为攻击的把柄。广告不只一次，乃是持续了一个星期，天天都登出遍及全国的攻击文章。同时，她还印出措辞及气味相同的传单，在基督徒圈内广肆分发。有一位传教士说：「我读到这份传单，其恶劣的程度叫我不得不把它烧掉。不仅如此，我还得要沐浴一番，才能使身心洁净。」

倪柝声因此变的相当消沉。他退隐在新居中，躺在床上不愿见任何人。一位意志坚强的女宣教士去

拜访他，她声称：「他一定得见我，因为我有从主来的话要告诉他。」她进去，告诉他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赛五十四 17）同时，张品芳也以轻松的心情来鼓励他，提起他的精神她揶揄地说：「他们怎么说与你何干？好歹你已经得到一位合你心意的妻子啊！」因为张品蕙实在带给他喜乐，她的中英文造诣都不错，而且谦卑地与神同行，成为他工作上最大的助力，大家也都认为她是秀外慧中的女子。

十一月他们到南方旅行，参加厦门的特别的聚会。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被几个问题困住。例如：他们与伦敦方面的交通仍然拖延着，此外他在云南是心脏不适的情况又再发作。特别是他们心中有一个问题未能解决，也就是他个人如何得到圣灵所赐服侍的恩赐——他不只是感到自己经历的欠缺，同时他在教义上也有些混淆不清的地方。关于教义的问题，有次他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工作，在那里找不到一个能够回答他神学上问题的人，当他为此苦思不解时，他得到一些非常单纯的乡下信徒在祷告上的帮助，因此神给他足够的亮光，并解决他的问题。

另有几道亮光临到，使他得着释放，是籍着史提恩夫妇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间返回中国时所得到的。自从一九三二年倪柝声访问济南后，该城即成立了一个「分离主义」的团体，这件事使得齐鲁大学的人不安，史提恩医生因此便辞职离开济南，到上海另谋新职。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中，倪柝声遇见李国清（参第六章），他是一位医生的儿子，就是在梅花村一时说溜了嘴的那位青年，他曾在厦门大学读过书，如今担任飞行员，当倪柝声问起他现在是否仍跟随主时，他说：「倪柝声，您想当我们经历了那桩事后（指偶像大王失势的事），我还能弃绝主吗？」

尽管倪柝声他们不断与伦敦及纽约方面的弟兄会交换意见，但痛苦仍然存在着。而这种交通却帮助了上海的弟兄，更清楚整理出教会之间的关系。西方的弟兄控告倪柝声「在交通上妥协」，指出他放宽标准与荣橡路和新避难所的基督徒一同掰饼。因为在荣橡路及新避难所信徒所依据的原则是：「任何人只要他自称为信徒，不论他是属于那一个宗派，或是他与别的团体有来往，都可允许他掰饼。」于是伦敦及纽约聚会的弟兄，试图照亮上海的弟兄，使他们了解基督徒交通的准则，帮助他们来审断倪柝声的行动，也图谋藉此机会引起他们注意倪柝声在语言上不十分正确的观点。

今人感到棘手的问题是，西方弟兄会认为从其他宗派基督徒的交往中分别出来，比一同领受主餐更为重要。事实上，长久以来在中国的一些聚会，就保持各宗派间的彼此联系，然而从未发生什么问题，但这对西方的弟兄会来说，是行不通的，相形之下，中国方面的运动（指聚会处）之不成熟也就成为不可原谅的。弟兄会提供了他们已存留一世纪之久的「真理」附在詹姆士·泰勒给陆忠信的信中，说道：「你们理当在主面前接受它，从它得益处，并靠它站立得住。」

结果上海的长老们，在监督徒的理性和圣灵的光照下，回了一封谦卑温和的信。寄信的日期为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发信地址为上海哈同路二百四十二巷三十六——三十八号。签名者有杜弟兄、吴弟兄、倪弟兄及张弟兄等人，信中陈述了下列的原则：

「我们必须分辨（道德上或教义上）阻碍我们与神相交的『罪』，以及不会阻碍我们与神相交的『罪』之不同。我们确知像奸淫、不信基督道成肉身的罪，必定会使一个人断绝与神的相交。然而关于其他的『罪』——譬如『泛交』、解释预言的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与神的相交。」

「事实上，有许多不同宗派中神的儿女们，我们认为不合适与他们相交，然而他们却比我们更与神



同行及相交。』

「相交是圣灵的事，唯独圣灵才能决定谁是合适相交的物件。」

「我们接纳一个人的理由是因为神已接纳他了（罗十四 3）。所以神的命令是：『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罗十四 1）我们必须接纳所有神已接纳的人。这个命令非常清楚，而且不容置疑，是我们应当接受的。」

虽然这封信是中国信徒基于基督徒觉醒的良心，率直地恳求并盼望能有开放的交通，但还是免不了被严紧的藩篱主义所否定了。西方的弟兄会正式宣告与中国弟兄们决裂。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弟兄会在英国伊斯灵顿公园街聚会厅召开了一次「决定性」的代表集会。有几位出席的代表为他们的优越感受到此番深远的打击感到难过。这次决议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一旦决定后，全球每一处「伦敦派」的聚会都要遵守。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他们寄信给上海的弟兄们，信上提说他们对中国弟兄向基督爱心的诚意感到怀疑，并指控倪柝声为人不够正直；又说假使早在一九三二年上海弟兄们就把原则说明清楚，那么这段交通也就不可能发生了。「我们为缺乏神的保守而产生的错误感到忧伤，因为我们急促地与我们尚不十分认识的人行相交之礼。我们不能再与你们同行了……。当然这点也适用于所有跟你们保持联系的人。」

其中签名的有查理·巴罗，他也是为此深感难过的人。中国的弟兄也为整个过程感到惊讶，并对基督徒圈内的关系感到失望，以及因爱而产生深切的忧伤。

当倪柝声接受到覆信时，他本人和张品蕙正在烟台。当时有一位在内地会具有传道恩赐的女宣教士伊丽莎伯·费巴小姐(Elizabeth Fishbacher)正在城里开奋兴会。

她刚认识倪柝声不久，而倪柝声在那时正经历一段属灵的荒凉，他与费姊妹交通他个人辛苦寻得的想法，但他仍渴慕对神有更新的经验。因此他打破自己过去对妇女讲道的限制，参加了她在烟台的聚会，而费教士则享受到山东人因讲道和祷告，所产生之狂喜及兴奋。当她的英语不够用时，她就用方言祷告及唱灵歌。然而她的讲道真具能力，倪柝声从她的讲道中，被神的道所吸引，感觉自己进入神所赐福的崭新境界，他找到了一种新的释放，使他讲道里的枯干情况，从此消弭无踪。他打了一封电报回上海说：「我遇见了主。」

接着他在秋季的聚会里带来「圣灵浇灌」的信息，引领许多人进入他所经历的属天能力中，这个果效持续了两年之久。一股属灵兴奋的浪潮，和一种注重经验的崭新教导，一直传到南方各聚会——因为直到那时为止，这些团体已被理智限制住了，绝不容许基督徒忽略圣经而单单注重主观的经验。虽然如此，祷告会仍以短暂时间由众人一同开口祷告作为结束，这做法已成了他们的习惯。由于时间的限制，不容许他们一一的祈求，他们只能在这短暂而同声祷告的时间里，向神卸下祷告的负担。这种祷告方式，据说始自宋尚节，是一种在圣灵管治下，最容易让圣灵感动的祷告，当祷告的声调逐渐加强而上扬后，旋即渐渐降低，最后复归安静而终止。但如今，他们却让这种方式达到极度的释放，或跳跃、拍手、扬声大笑，或说听不懂的方言（并没有翻出来给会众），甚至连说方言的人自己也不清楚。其间还有一股奇妙医治的水流；有许多是真的，但也有令人感到怀疑的。

一九三五年底，倪柝声夫妇到厦门，由于环境上临时出现拦阻，原先计画好的特别聚会，到了最后一刻不得不改换地点。有位晋江（在厦门与福州之间）基督书院的院长吴路加，因担任宋尚节的译

员而接受了救主，他及时助了一臂之力，开放他家的大房子，举办为期十六天的聚会。将近有四百人参加聚会，倪柝声讲题内容为「得胜的生活和圣灵的浇灌」，神的恩福再一次沛然降下。从此吴家就成了一个崇拜和见证团体的核心，他们的见证方式，后来在各城市一一出现了。

李常受肯定地说倪柝声「从来没有说过方言」，这也许有可能，但还不能加以证实，而且这种说法常会引起争辩。倪柝声确实是认为，圣灵给教会的许多恩赐中，医病、说方言及翻方言是较小的恩赐。他说：「我亲眼见过即时痊愈的神医例子，我并不反对这些，我所不赞同的是，有些关于神医错误的教导。」他曾说：「有人问我是否反对说方言，我当然不会反对，虽然我对某些以不正确方式得来的方言，仍存保留态度。」他也曾叙述一次经历：在一个十分混乱的村庄聚会中，神曾用这种方式，传达了他们所急需面对且令人不愉快的事。但神所籍传讲方言的人，要求不要泄露他的身份。他主张像这样情形来运用恩赐，才有意义和目的。

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并非所有的人都讲方言」。他在「方言」方面的教训总是平衡的，有一位内地会的年长宣教士，在几年以后参加他在上海的聚会，听他讲到圣灵方面的信息，他形容这些讲道是「我所听过关于这个主题最清楚的教训。」

面对有些复兴的方法，倪弟兄认为其功效如同「属灵的鸦片」，它不过是一服日益加重的药剂，使人耽溺其中不能自拔。在这些事之后，伊利沙伯·费巴也觉得为这种限制所带来的亏损感到自责，因此她愿完全放弃公开讲道，透过她颇有恩赐的文笔，及时地发现了十分有果效的职事。三年以后，故事又再度回到它的原路线上。倪柝声有一次对王开森（译者）陈述他的意见：「回顾这段时间，我们所得的较少，而损失却相当大。」

## 第十二章

### 工作的再思

由于当时国共内战的结果——南方地区还有一段自由的时间。因此给上海的弟兄们打开通往西藏的道路，他们觉得神呼召他们到西藏边区的云南，两年之间就有六位到达那里。他们在藏人中得到热烈的反应，但是非常缺乏文字供应，藏文的小册子及圣经都是由上海印刷，再由船运经河内抵达那里，却遭法国政府的没收。倪柝声为此感到非常气忿，所以他另外安排将铅版空运到云南，直接在当地印刷，虽然这样拖延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问题终于解决了。

中国各地福音工作的扩展，其推动成功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在宣教团体中的信徒，他们对倪柝声信息刊物需求增加，书报及解经书籍，深入各个基督徒家庭，供应了因着兴奋会所兴起的人们，因为他们还没有进一步的喂养，倪柝声用简明的话语来讲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恩赐满足群众的需要。

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基督徒十分自然地利用他们的家庭做见证的结果。当一个信徒因着生意或公务、搬家时，他的家立刻兴起祷告小组，形成另一个新的基督徒见证中心，吸引当地的居民参加。有些是从异教中出来，也有不少是从各种差会团体来的，他们进入了一种原始教会的交通中。这些男女离弃

他们的罪归向救主，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祂。每一个小核心产生自己的长老，按着新约的榜样引导他们的活动，提供各项服事。有时也可能因需求而要有更大的房子，但它的聚会地点必定是实用而非纪念性的建筑物，他们没有购地盖教堂的观念，甚至除非信徒中有圣灵的工作，为了扩大聚会地点，否则也不租房子。

这个运动也必须有「使徒」。所以全时间的工人，带着一个巡回的任务将福音传到未得之地，把教会设立在当地并造就信徒，然后他们可能向更远的地区深入，在一个新的环境中，租一个公共场所作为新的扩展之用。

这种活动包涵了两个观念：教会及工作。在倪柝声的眼光中（他自己所塑造的）工作是属于「讲台式」；教会则属于「圆桌式」。为了预先排除因着教义及个人因素所成的新分裂，教会是以地方为单位，按着地理行政区（村、镇、市），有些像老式日尔曼「教区」的制度。他们都是自足、自传及自治的。相对的，工作则为一种宽松的集中组织或交通，由倪柝声及少数弟兄行使对使徒们的顾问工作，训练他们，及在神面前负责经济的支援。当一位使徒站在任何地方教会立场时（而不是在从事广泛工作时），他要顺服当地的长老。一九三八年倪柝声打发一百二十八位「使徒」出去，从事全时间的服事。

在过去十年间，籍着他们从新约所读到的亮光与教导，应付他们所遇见的问题，整个工作结构及效果逐渐增长，他们的方法极有功效，且被认为是仅次于信徒的属灵生活及交通，然而主要的信息还是与基督的合一及见证祂拯救的大能。

这个运动的力量，是基于工作人员的素质，无论男女工人若加入这个团体是出自于个人的意愿，没有任何可获报偿的吸引。正如倪柝声所解释的，就是中国人所看到，及宣教士们长期观察所了解的，这是完全不同于外国宣教模式的运动。他们避免提供早期在教会中晋升的捷径，而是先从宣教士的仆人做起。这些使徒轻看如此光彩的奉献，虽然实际上自己也是属于某个「阶层」的基督徒，然而他们却不愿意在较有教育及智慧的中国人中自抬身价。因着上述的做法，早期阶层式领导的宣教模式终致遭到破坏。

在「小群」的聚会中，人们籍此学习认识主并更多的服事祂，有些聚会甚至以知识份子多数，例如医生、大学教职员、商人及军官等。一九三六年全国教育中心的北平聚会处的会众，几乎全是由学生组成，这些学生都是燕京、清华、北平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以及卫理公会、长老会医院中受训的护士，宣教的医生提到她们说：「她们是我们中间最好的护士，她们是真材实料的。」

这时期工作扩展的情形，在国内大约有三十多个地方教会，在国外也有几个。但旁观者对他们的扩展，观感是褒贬不一。一九四零年初期在甘肃省的西北部，有一位宣道会传教士说：「这个运动愈在它的基础上往前，就愈不能分辨弟兄间无伪的爱心，及不值得称许之聚会情绪发泄。」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可以很公正地指出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带有属灵的骄傲，这种骄傲的思想，特别是在这个运动较兴旺的沿海城市的优秀分子当中。这种思想也造成「不顾一切的努力使得其他教会的信徒产生偏见，甚至也使牧师们误入歧途。」一位英国浸信会的信徒，写到陕西省的光景说：「一九四二年在西安有一群火热的年轻人，他们研读希腊文新约圣经及盖恩夫人的著作，并且离开原来的教会，成立一个较洁净称为『小群』的团体，也有再次受浸的基督徒参与其中，他们聚集『掰饼』，并在每个主日传讲神的话。他们强烈地反对宗派教会，并批评各宗派在中国所成立的教会沦为外国附属机构，却没有看

见自己则是带人离开教会，建立另外一个宗派。」然而在沿海的浙江省，一些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则对于他们中间出色的教训，及基督徒真实的交通非常欣赏。对于那些与差会有关系正处于兴旺的教会，由于大量信徒进到他们中间，则产生了教会增长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倪柝声似乎只是一个偷羊者及极危险的人物。无疑的，他成为许多宣教士身边的一根刺。

有几个福建的弟兄们，早已到海外服事，作基督的见证，一九三一年缪绍训到菲律宾；陆忠信、陈主言、王开森（译音）到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其他人也到荷属西印度。一九三七年七月，缪绍训邀请倪柝声访问马尼拉及其他地方，他在碧瑶向一百多位信徒传讲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圣灵的充满及教会实行的交通，为期共有四周。

当他再度离开上海前往新加坡时，正值日本全面侵华夺取北平，八月十四日上海爆发敌对情势时，他早已离开那儿。中国飞机攻击在黄浦江上的日本船只，两架飞机的弃弹，造成一家百货公司及邻街中国百姓极大的伤亡。当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虹口郊外建立据点时，群众从周围地区涌进租界区避难，他们在每处空地立起「稻草村」（注：难民营）。幸好上海与南方的交通还算通畅，一个月内他循此路线与他妻子相聚。他们家是位于撤退区，她与姊妹们在哈同路安全避难，虽然这儿离陆上战斗地区七宝北方还有几公里，仍可听见枪声。不久他们的财产被盗，当他们回到住处时，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其中包括他送给太太的结婚礼物——一本中文圣经。

最幸运的是他们能很快离开上海，他们绕过战区，沿长江上行抵达汉口。他在这儿尽他所能的招聚许多全时间的工人，对他们传讲一系列公开讨论的信息，正如他一月在上海时所举行的会议。在这两个场合中，他第一次放弃可他向来所强调的基督徒内在生活的题目，为要处理一些属于表面的技术问题。他开始带领会众查考哥林多前后书的真理，正如他以前看过的以弗所书一样，既然保罗写这两卷书信是被同一个灵所感，假若有人熟悉了以弗所书的真理，就不致于把哥林多前后书弄错了。他从经文中把实践的原则予以具体化及条文化，并把它们应用在当前的环境中，做为工作的指导及塑造地方教会。因为直到如今，工人们都依赖倪柝声重新整理他个人的指导，他觉得在这混乱的国家中，他们需要给他们更明确的立场。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十一月他经过战区，回到已完全被日本人控制的上海，上海每间房子、舢板、帆船上都飘着太阳旗，以表明日本人正在当家，遍处都是铁丝网，沙包及拒马，生活物价飞涨，十二月首都南京落入侵略者前所未有的暴行中，国民政府开始向西迁都重庆。

这两次信息的全部内容，由速记笔录下来流传各地，立刻引起了出版的需求。籍着张作品蕙及李渊如在文字上的说明，倪柝声也帮助预备这些信息以便即使付印，使得全国的信徒及工人能分享这两次信息的内容。一九三八年三月出版时署名为「工作的再思」。在序言中倪弟兄引用和受恩教士的话说：「神的灵只能按照神的路线工作。」事实上这本书是从经文来探讨教会生活中「神的路线」。它是从历史事件及特殊的任务身上得到启示性的申论，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倪柝声写道：「这本书所引用的真理，大都是经过逐次学习及过去几年的经历，加上因领受了更大的亮光，而作的调整。假若我们一直保持谦卑，而神向我们不断地施怜悯，相信将来我们还有更进一步的调整。」

倪柝声的一些宣教士朋友也要求发行英文版，然而他并不认为这是聪明的做法。因为他的英文名字是「守望者」，与他的职事是并不相称，似乎只会引起别人的误解。无论如何，他寻求与一些年长及智慧人的交通，并计画与伊丽沙伯·费巴及其他两位女宣教士访问欧洲，在他离去前，因着医生对他肺

部的诊断为良好而大感欣喜。

他们与张品蕙一同前往香港，并与倪柝声的父母一同在此逃避战火。他们取道安可航线，于七月抵达克莱德（Clyde），他先到奇立康（Kilcreggan）

看史百克兄弟。他们至今只有信件来往，而倪柝声是他灵修杂志「见证人及见证」的忠实读者，他们很快地发现了彼此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然后他们一同往南到昆布兰的开西（Keswick Cumberland）参加每年一次深度属灵生命的聚会，在那儿他们遇见了中国内地会的女教士。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参加由中国内地会在英国的主任姚如明牧师（Rev.W.H.Aldis）所主领的一个盛大的宣教士聚会。他在战争正蹂躏中国的时期与一位日本的讲员一同坐在讲台上，给与在场每一个人心中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当轮到他带领聚会为远东祷告时，他让许多人回忆到这是三十年代中的一个启示。他给予每一个有幸参加此次聚会的人，至今仍难以忘怀的祷告。他祷告道：「主，我们确信你正掌权，我们的主耶稣正在治理，你是万有的主，没有人能摸着你的权柄。这是属灵的恶势力正在破坏你在中国及日本的权益，所以我们不为中国祷告也不为日本祷告，但我们为你的儿子在中国及日本的权益祷告。我们不责备任何人，因为他们只是你仇敌手中的工具。我们高举你的旨意。哦。主啊，求你粉碎黑暗的国度，因为逼迫教会的就是伤害你的，阿门。」在开西他曾向一些预备从事宣教的青年们讲到「一位宣教士必须具有 的资格」；他从以弗所书到罗马书，讲到「主为我们的救恩所做成的工作，及主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题目。最有意义的乃是，在那周结束时，他参加了以「在主耶稣基督里合一」为主旨的大联合交通聚会，这些交通公开地确定了他和他的中国同工们的属灵地位，这个地位是他们早在三年前就有的。

接着倪柝声回到伦敦，来到荣橡路基督徒交通中心。他在这儿与史百克，及教会中的其他负责的弟兄们相处融洽，觉得似乎回到了家中，并暂时以次地为他的总部。笔者即在次与他有几周难忘的相处。

荣橡路的教会向主的百姓广泛开放，具有清楚的职事异象，但由于强调十字架在基督徒生活中主观的工作，容易在福音传播的颠峰时代被视为有几分消极，是基督徒活泼的见证变成过分被动，而被所谓「更高的事物」所占有。不只如此，荣橡路的教会也同倪柝声一样，因着倾向脱离传统的服事，寻求一种更原始或「属灵」方式的生活及见证而受到谴责。倪柝声因此再度拣选一种异于福音主流派的路线。

我们因着与他短暂而单独的交通，及接受他的服事，而使自己的经历大为加增。他是如此容易与人交谈，他的东方文化背景使那些生活在传统基督文化中的人，在与他讨论时感到兴奋。他在公开场合中，不论是带领晨祷或聚会讲道，他优异的英语加上动人的态度，使得听众大得享受。然而吸引会众的，仍是他直接把握住一些长久困扰基督徒生活的问题，或者把听众带到他们所规避的一些神的要求面前。并在许多基督徒所擅长的事上，当他更进一步阐释时，常是「刻划入微，一针见血」。他也表现出中国思想家的态度，用词遣字颇为讲究，时常将大家所惯用的福音名词，重新赋予新的意义。

不只如此，他还能透视听众的光景，而且看法十分准确，这都是因为他的目标是在高举他所爱的基督。在他来到的一个月內，很灵巧且关切的指出信仰危险的地方，那就是属灵的骄傲。他温和地说，从经验中神让他看到，「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太七1）如同「你们给人，就有人给你们。」是同样的真切，两者都是神处事的原则。无怪乎三十年以后，他的讲话记录，仍然带着新鲜及令人惊奇的中肯，跃然于陈旧的笔记本中。

那时，笔者尚是一个认真的青年宣教士，正要起程前往亚洲。我和另外两位朋友与倪柝声长谈，从宣教士的经济到启示录，讲论到各种事物，这次的交谈很有价值。他自始至终从没有暗示笔者应该离开或加入某一个宣教机构。他最好的忠告，是学习如何在外国文化背景中传递主的信息，在头十年里穿上学习的甲冑（精细观察），如同在英国学习开车的人，穿起L型的金属甲冑，这种甲冑是他头一次看到并十分感兴趣的，后来我觉得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所提的十年应该无限期的延长。

当时英国正处于欧洲慕尼克的危险中，倪柝声在英国作客。看出他们在焦急地挖掘防空洞及配发放毒面具，突然在尼维里（Neville）的张伯论宣布了所谓「我们这时代的和平」的慕尼黑协定，才使得大家松了一口气。由于他没有直接介入这场紧张关系，他体验到那种超脱及在另一个水准的感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该有像客旅及寄居者的感觉。但他也有属于自己私人的悲伤，大约这时从香港传来了一个消息，原先想要有一个孩子的张品蕙流产了。他在信上的语调表现的勇敢镇定，但他知道，她一定感觉得出这个消息对远在半地球之外的丈夫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倪柝声也尽力写信安慰她。后来，一到她能够外出旅行时，她的婆婆就带她远行，取道河内到昆明去探访撤退的信徒。张品蕙后来再也没有怀孕，倪氏夫妇从此就没有孩子。

十月倪柝声应哥本哈根福迪·克利斯亭（Fjord Christensen）牧师的邀请，到丹麦的赫而辛基国际学校参加聚会，他在那里有十次一连串的信息，以「正常基督徒生活」为题，讲解罗马书第五章至第八章的内容。这些讲章，加上其他相同题目之文章补充，后来就编成了「正常基督徒生活」一书。倪柝声觉得「得胜的生活」这个词句太为那些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所滥用，事实上这种生活才是真基督徒的生活。他强调在神眼中，那些「得胜者」才是正常基督徒，其他的人都算不上正常！在他前往俄典斯（Odense）途中，他用以弗所书的钥字「坐、行、站」发表了一篇著名的信息。他与许多人都发觉，他在丹麦信徒中的交通灵里大得释放。当他来英国时，他曾计画在西欧最多花四个月时间，然后在十一月去美国。然而这次的访问似乎不够完全，因为未能与史百克彻底交通他所看见「完成基督徒身体的实际方法」

当他途径挪威、德国、及瑞士抵达巴黎时，上海的同工来信要他交通完才回去。因此把他的「工作的再思」翻译成英文成为必要的事了。幸好伊丽沙伯·费巴正有空在他那儿，加上一个同工菲力斯·迪克（Phylliss N. Deck），他们三人一同工作，有两个月之久，她翻译英文，再有倪柝声删编，另外又添写了一篇序。终于在一个月间完成了手稿，他回伦敦又停留了四个月，大都以荣橡路为他的基地，在这段期间他与史百克夫妇建立了互信互助的友谊。

他在伦敦也有聚会，但不是排的满满的。他十分喜欢英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在有正式聚会之前，他会在他们之间轻松一下，跟孩子们玩玩捉迷藏，穿着蓝布大褂，屈身在柜里让孩子们看不到。有一次，他在一场聚会中，分享了一次相当有果效的讲道后，他随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到雪里哈（Snrey Heartlands）野餐，给他们留下了「风趣盎然」的印象。他并不全然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弟兄，在他们家中，每次老祖母走进房子内，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表示尊敬，这事叫他感到惊讶，相反的，若有一个大人，不小心踩到一条狗，却会转身向狗道歉。在外国开车每逢下坡，他总是坚持关掉引擎，这是他在云南所养成的省油习惯。他也会带孩子们出去吃中国菜，但当他吃起英国清淡的食物时，非浇上酱油不可，所以他总是想法子弄瓶酱油以防不时之需。

这次在英国他当然能自由来往，他到诺福克（Norfolk）的雪林寻访和受恩教士在挪维棋（Norwich）时的朋友潘汤（D·M·Panon）。倪柝声向来看重他的著作，据说他为了表示对潘汤的敬意，在早餐时还为他预备了两个皮蛋（中国式的蛋）。在另一个开放兄弟会的地方教会中，他遇见了一位名叫约翰·连俊（John Laing）的营建工程师（他后来被封为男爵），他还记得倪柝声如何委婉拒绝了西方某基金会为了支援他的工作所提供的一笔奉献。然而最愉快的是，他找到了机会私下与他的老朋友查理·巴罗弟兄重聚，查理·巴罗是英伦派弟兄会中的弟兄。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他离开英国之前，「工作的再思」英译本在伦敦出版，书名为「我们的职事」，下面印有「见证、人人见证」几个字，这本书成为当时许多人，竞相引用的文章。这段期间正是国际宣教的高峰时期，一些多年建立起来的宣教机构，如今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已有一些宣教士们，开始坦诚地面对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含糊问题，就是如何带领那些悔改的人。一些在圈子里的人认为，只有把他们带到新鲜活泼的教会中，他们的劳苦才不致徒然。他们对于倪柝声强调地方教会单向神负责，对他们而言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不但如此，他把「教会」与「工作」分开——这是从圣经演释出来的合理结论——似乎是一个有用的说法，此外书中也有其他实际能说明的内容，例如透过清晰的思路，论到经济上的问题。

身为一个中国人，他反对西方各种过多的宗派，一窝蜂的引进中国，同情的西方读者大多赞同这个说法，但是当他严格地强调「地方性」——普遍性的一城一个教会的说法——他们就都停住了，这是经文里一种可能的推论而已，并没有别的根据，而且有一位元圣经学者敏锐的指出，书信上所指出的一个城市在新约时代就有一百万的人口，包罗不至于把信寄给「在罗马的教会」。倪柝声似乎要求在数百万信徒的西方各城中，想法子缩回新约时代的人数，以便恢复新约时代的习惯。

许多人在神面前更坦诚、谦卑的用半生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一边把圣经摆在面前；一边把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因着各种更新所带来日益复杂的光景互相对照。于是他们询问前面是否有一条可容我们往前的道路？而不是在本质上，退回到小亚细亚及撒克逊英格兰「理想」的社会情况中。举例来说，他的朋友史百克，就选择了一条较强调基督奥秘「身体」的路线，即今天圣灵自由地赋予他的身体，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每一种都「见证」了她在天上的头。史百克在他那本「我们的职事」书上写到：「要了解什么是教会、众教会、教会的次序及教会的工作，就必须从神概括的观点来看，这观点就是基督。人若了解基督是在他各部肢体里及道路上，也就了解什么是教会，每一件事物都是『在基督里』。」

虽然史、倪两位彼此了解且相交颇深，但是在这特别的一点上，他们还得花一点时间才能取得同一步调。他们对于新酒的看法几乎都没有异议，但倪柝声所关切的是盛酒的皮袋，他所关注的问题，乃是如何在未来几年内，将正在茁壮发展，而无传统约束的工作，纳入一种健全属灵的形态中。然而他在西方得不着他所期望而可实践的建议，他不得不承认，对他而言，这是一段疑惑的时期，因为他所寻求的问题，各处都无法解决。

回到上海几个月以后，他写信给史百克，信上表露出一个做领袖的孤单，上面写道：「你知道，由于这里的弟兄们不够老练，我所说的虽然都好，但他们自己不能寻求认识主的心意。」提到他们之间短暂交通所产生的关系，他说：「主曾对我说，我的年纪比你轻，在同样见证上应该尊敬你为年长的弟兄，

我认为这次交通给了我实际的帮助。」事实上他们很少通信，然而在中国，无论是中国人或西方人，仍然没有出现像史百克那样具有身量的人，在他需要时能立刻取得咨商。

## 第十三章

### 兴 盛

倪柝声计画经美国返国，正如他六年前所行的。但是当他前往大使馆查询时，他们提醒他，日本人正利用太平洋的一些港口做为强迫宣传的基地，以阻止一些中国人从西方回国，所以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搭乘英伦直驶黄浦。旅程经过孟买及可伦坡，在印度有短暂的停留。七月回到上海时，他发现张品蕙曾为逗留西方、有战争危机的丈夫安全挂虑，这时因他安全回来大得释放，他们因重逢而喜悦。几个月以后，他告诉一对新婚夫妇说：「婚姻像旧鞋一样，越久穿得越舒服。」

当他抵达上海时，这个繁华的城市，因遭到外国的占领，以及兴盛的商业受到战争的抑制，仍停留在老旧光景当中。瘟疫从战区穿越苏州河，渗入外国租界区，租界由于英国、法国及美国战舰的防守仍然开放，但现在挤满了困苦的难民。倪柝声戴着一顶陈旧破损的毡帽，在自己的家中出入，他遇见一种冷淡的灵，这种灵比目前日益加增的困境更为可悲。这是一种为自己争取生存而不顾羞耻的机会主义，其猖獗到一个地步，甚至有信心的人都不能免除。他在给一位朋友的断笺上写道：「我发现许多人为了保护自己，早已变得无情，甚至有些人为了着自己没有感觉到周围痛苦的光景而向神赞美。至于我自己，我承认因这些痛苦相当难过，但是我倚靠主在祂国度里站住。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足以使一千颗心的人破碎呢！但我的父是神！神阿！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学会爱慕『神』这个字。」

然而当他不在时，弟兄中间出现了失和的情形，讲道的空缺则由张约翰填补，值得一提的是眼科医师俞成华的讲道。俞成华身材矮小而有优雅细致的容貌，爱好音乐，有时他用小提琴自唱自奏，他在讲道上显出有前景的恩赐，又因爱神的缘故，对主的话语相当熟练。

一九三九年十月的第一个主日早晨，倪柝声要求教会为欧洲紧张的情势祷告。他请求几位弟兄与他一同带领会众，他把自己和教会一同带到神的面前，不求别人的，只求神的旨意行在这次危机中。在这令人相当感动的时刻之后，许多人记得他的结束祷告，他说：「主啊，我们能说你的教会是为此祷告了！」

礼拜一的祷告会及主日晚间的掰饼，现在是分在城里的几个家中举行，信徒在这些家中迫切向神祈求，不让日本人闯入租界区。为了帮助信徒澄清观念，倪柝声于一九四零年初，发表了一篇谈话，讲到「不是为中国人（或英国人、美国人），而是为在基督里的男女。」教导神治理世界之主旨的祷告态度。他从波斯王古列到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指出神在世界历史的安排，都是为了祂自己的子民。他说：「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如何祷告，这种祷告必须是能使英国、德国、中国及日本的基督徒一同跪在一起，并且众人都能为所求的说『阿门』的祷告，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的祷告必定有了错误。我们可以告诉神，日本人对他的态度，但是我们要同时告诉他，在中国的基督徒及宣教士，在态度上过于倾



向美国。而上次欧战中许多祷告是不荣耀神的。我们不要再陷入同样的错误中，教会必须能站在超越国家问题的地位上祷告说：『我们在这儿，不为中国人也不为日本人的胜利祷告，只为你所宝贵你儿子的见证祷告。』如此的祷告就不是虚空的言语。如果整个教会都如此祷告，那么战争必定很快就被神的方式解决了。』

文德里的解经课因受到场地狭小的限制，一位年老的姊妹奉献一间大建筑物及土地，价格只有市价的百分之四十，这在会中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但当众人等候通知采取行动时，弟兄们把神带领他们如何处置奉献的原则告诉她，她收回了奉献。他们将一幢古老建筑物的楼上改建成办公室，然后在巷子中再找一些招待的房间，楼下有许多支撑三个隔间的木柱（后来加增到五个隔间），加上各种凑合的修改，使它能容纳拥挤的聚会，大厅里没有暖气设备，楼板走动时发生很大的吱嘎声。

林纳克（Lena Clark）曾在这儿聚会七年，他描述一九四零年的情形。每个主日早上九点三十分，众人安静地挤在这儿，等候传讲主的话。姊妹们坐一边，弟兄们在另一边。会堂是宽形的，没有靠背的长凳挤得紧紧的，房子的两面窗户及双重大门外都坐着人，他们从扩音机听道，甚至连楼梯上也坐满了人。这儿搀杂着穷人、受教育及富有的人，有医生、工人、律师、教师与黄包车夫及厨师。在许多穿着适当的姊妹中，有不少是摩登的妇女及小姐，她们有新式发型及打扮，短袖及高叉幽雅的丝质旗袍。小孩子及狗在巷口嬉戏，汽车高分贝的喇叭声，交通秩序相当紊乱。然而每个主日早上，十字架的话语却被忠实地传讲。罪与救恩、基督里的新生命与神的永恒目标，服事与属灵益处——都毫不保留地详加陈明，讲台上供应着坚硬的干粮及简洁的挑战。

当倪柝声回来时，渴慕的群众挤住了他进出会场的入口，他穿着深蓝色的棉布大褂站在台上，以温和的态度，简单且周全的内容，及合适的比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为了说明一件事他会迅速在空中画出一张草图（事后由一位同工把它画在海报上），如果为要使某一点更明朗，他会讲一个好像发生在他身上的个人轶事为例证。他敏捷的幽默，常使会堂掀起无数的笑声。在他的聚会中决不会打瞌睡，而且从头到尾他决不偏出他的主题。他常说：「最主要的是在传讲主话语的果效。」因此每一次他总是在听众的思想及心中，留下清楚及深刻的印象。

张品蕙参加聚会，总是安静、保守且与群众保持一点距离，但是一直支持倪柝声的工作。她的姊妹张品芳（包太太），也像其他女同工，忙于做个别交通，而倪柝声的二姊倪闰贞（林太太）则奔走在城中，暗中说明姊妹们的需要；另外高大、豪爽及稳重的汪佩真，如小鸟般灵巧娇小而温柔的李渊如则成了这聚会的陪衬。

一九四零年春天，倪柝声在聚会中以「神如何对付祂的百姓」为题，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中做了一系列深刻的讲论，特别是强调雅各的生平。他从欧洲回来后，对教会传讲更「属灵」及奥秘的语句。他第一次聚会的题目是「教会，得胜者及神永远的旨意」，接着他向信徒及同工讲到「教会，身体及奥秘」。李常受参加了这次聚会，带着属灵丰筵回到曲阜，使聚会大得富足，为了要继续与他们在一起，李常受拒绝了一次相当吸引人的美国查经训练。

这种属灵的聚会并非倪柝声的特色，他在不知不觉中，迎合了一些女宣教士的口胃，她们从西方来加入他的交通。这些姊妹与上海其他宣教机构中的宣教士们，形成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外国赞助团，有些人是辞去他们的工作而加入倪柝声工作。这样的例子成为他们中间心照宣的盼望，于是常有其他人

随从他们的榜样。一九三八年在伦敦时，姚如明牧师（W·H·Aldis）对倪柝声表明：「诚心盼望你能回到上海，在那儿能使你及与你有联系的人，在跟中国内地会的服事上有更密切的交通。」这种盼望在某些局部性的事情中可能实现，但对较大范围的交通，则必定失望而毋须感到惊奇。中国内地会的各地主任及宣教士，一直小心观察倪柝声的工作，主要原因是对他有偷己得救羊群的顾虑。

宣教士申东·史提恩医生（Dr.Thoronton Stearns），被邀请加入中国弟兄中，成为教会的长老，后因没有外人与文德里交往，而难过地离开倪柝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由于少数的姊妹特别尊崇倪柝声为神人，而无异议地随从他，对她们而言，哈同路的教会不止是基督的身体在上海独特的彰显，并且「我们的弟兄」（倪柝声）是她们在中国唯一能从他身上得到神旨意的人。因为他们被神对祂儿女永远统治目标之「新教训」所吸引，认为只关心未信主之人的得救，是偏离了神永远的目标，而服事及见证、祷告及安静等候等名词很容易为「天然人所应用」。这基督身体严肃的启示，是需要天然人经受长期的考验、破碎，所以只有「静坐下来，让神做每一件事！」

如此稍嫌过分的理论，使得一些人找到借口离开他们的宣教团体，不做任何事的坐在哈同路，无论如何这种教导的本质使他们害怕行动，免得他们「越过圣灵」的带领，于是给人造成一种麻木迟钝的印象。这种明显的光景可以看出倪柝声对外国人的影响是无效的。但是否其中也有人影响了他呢？这是尚待解决的问题吗？就某方面而言，当他面对许多西方人勇进时，他曾向史提恩透露，他担心这些从宣教团体来的「外来者」，会造成他们聚会的分裂。一九四一年两位富于理想但缺乏见闻的青年宣教士，他们立场不甚坚定，却急切地想投进倪柝声的工作时，他对他们的忠告真是合乎心理学的理论，他说：「你们目前心情上或许有一点困扰，需要有个好的假期。到海滩去，找些孩子们摔跤！」这是适时且迅速有效的处方，而这一种成熟的结论，也是相当公正的。既然哈同路的聚会，是代表没有外国人的中国基督教，所以基于某种特殊的情况，外国人不加入这个见证是值得商榷的。这些宣教士们很欣赏「地方教会」在工厂的见证，他们可以在旁边尽最大的努力为教会增长代祷，自己却仍可以留在他们的职事上。

属灵的怠惰，绝不是「小群」工作上的光景。有些团体以为他们在恩典中增长，是因为他们看重查经，但是真正增长的力量，乃是他们在福音上的见证及拓展。他们借着倪柝声新提供的一系列初信课程，对悔改的人做富有创造性的追踪，使工作得以加强，甚至福州的「福音背心」一直成为街道及乡村见证的方式。并且在文德里普及的儿童主日学工作，虽不显眼却快速地在各个家中推行，没有占用会所的空间。倪柝声卓越的福音小册，不单文字优美色彩鲜艳，而且容易分发及讨论其中内容。倪柝声借着他自己坚毅的例子，明确地指导信徒如何向人们介绍罪人的朋友，虽然神可能赐给教会一些福音使者，指示提摩太要「做福音使者的工」，倪柝声则把这权利赋予全体会众。他的规则是，每天最少向一个人做见证，他发现了一件令他惊奇的事。在一条二十户的巷子内，有一位女佣信主，她决定开始向右邻的女仆作见证，直到巷底。她把第一个女仆带来归主后就一直继续下去，当这个故事传到他耳中时，已有六位女佣找着了救主。

虽然情形如此，上海教会最兴旺的几年，都是在激烈批评下做见证的。他们批评教会因聚会所的计画聚会变化无定；特别是聚会常根据传讲人心中的负担而临时召聚，并没有一些固定的时间。其他人则攻击倪柝声的教义，一位有名的宣教士说：「今天太多中国人转向倪柝声，认为他是一位把他们带回

新约真理的教师及领袖」。他觉得需要发表文字说明，攻击倪柝声籍着「使徒」的名义，开创了「严重错误」的事工，并且控告他「拐骗众多的门徒来跟随他」。一位中国人，宣称他得到里面的启示，出版一本小册子断言倪柝声不断接受外国资金的供应，来支持他的工作，甚至攻击他在使用这项资金上不够廉洁。这一位领袖的身量，似乎是谚语所说的「若有人把头伸在众人之上，他的头迟早必被砍下。」或者以圣经上的话：「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后三 12）

基督教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是倪柝声私下最称许的宣教团体，有一阵子他与其中一位宣教士相处融洽，后来这位宣教士令他失望，因他在杂志发表一篇指责倪柝声及其工作的文章，倪弟兄觉得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然而他自己有一套为自己辩解的哲学，他说：「如果我自认为对，而我的弟兄却判明是错的，那么弟兄所指出的错误封对我又有何益呢？更重要的，他认为我们如何对待在主里的弟兄，主也以此对待我们，如果我们仁慈，祂也必以仁慈待我们。」（可十二 17）

为此缘故，他压抑自己的感觉，从讲台上隐退，暂时溜开几个礼拜到曲阜。在曲阜有一位朋友发现他的心情极其低沉，需要在情绪上得到释放，所以向他挑战说：「你试过赞美主吗？」倪柝声说：「我试试看」。然后走到网球场，他用他那刚得痊愈的肺，集中全力吼着「哈利路亚！」这个处方得着效果，他很快地再回到讲台上。

倪柝声有时卷起他硕长的身子，与一些同工们一起坐车出去服事，所以有些上海人给他起了一个「儿童游戏」的绰号，就像孩童整天把自己关在车房游戏一般。有一次陆忠信徒马尼拉回到上海，倪柝声正杭州分享一位青年工人的服事，这位青年工人名叫江守道，有圣经教师的恩赐，他们都认为他很有前途，不久江守道与他的妻子，被教会送往新加坡帮助工作的推展，他们在日本入侵新加坡时得以幸免逃脱。

他们也因着神对他们特别的照顾而感受到喜乐，有一天倪柝声夫妇被邀请到一位女士家中品茶，她把一个包裹交给张品蕙，令她觉得奇怪。张品蕙把它打开，发现是倪柝声给她的结婚礼物，这本圣经是日本人攻占上海时，在他们家中遗失的，原来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中国传道人，在爱尔兰的一个聚会中讲到，正当他讲道时大声说：「如果我有一本中文圣经，我就能把这一段讲解得更清楚！」令他惊奇的是，他们竟拿出一本中文圣经。他问道：「你们怎么会有这本圣经呢？」他们说，有一位朋友的儿子，他曾在租界区的英军中当兵，有一次被某种想获取战利品的直觉所驱使，走进一间空房子拣起这本书。在书的空白页上他读到一句英文：「读此书能保护你远离罪，罪必阻挠你读此书。」他想这本书必是一本圣经，所以把它流下作为纪念品。这位传道人看一看署名，他发现他认得这些中文名字：「品蕙存，柝声敬赠」。他要求能否送还原主，他们很快答应了。

这时倪柝声的母亲把她丈夫留在香港，自己带着大女儿闺臣（陈太太）到上海与倪柝声及张品蕙同住一阵。虽然在教会她只是一个姊妹，但是在家中她仍然以母亲的地位管理这个家。她常常出去传道，为病人祷告，向每一个人作见证，范围是从专家到鸦片鬼。但她为了与儿子保持融洽很少干预他，有时倪柝声出去探访，没有人想到为他预备些吃的，这一点略使他感到苦恼。他说到有关家谱及父母的养育，1940年7月他对同工们说：「有时我们会觉得生错了家庭！但是神决定我们该是谁的儿子。神对约瑟有特定的工作。我们希望他该有较好的兄弟，但是他却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我们整个一生不仅是由我们悔改时开始，而是从头至尾神都为我们安排好了，为要达成他最高

目的。撒母耳、以赛亚、耶利米及保罗这些神人，都是神在需要他们以前早就预备好的。『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罗九：16）」。

1941年12月7日的主日，日本人攻击夏威夷的珍珠港。第二天上午八点，上海下着蒙蒙细雨，好象苍天为上海五百万百姓落泪一般，日本人击沉黄浦江上的英美炮艇，并进占国际区及法国租界。铁丝拒马阻塞在路上，汽车被征用，脚踏车变得昂贵，公共汽车停驶，食物高涨，集中于仓库的难民由于鼠疫死亡的人数急速增加，加上棺木昂贵，所以死在城里的人无法埋葬。犯罪率升高，日本人并不关心，百姓害怕激烈报复，所以不敢攻击他们。

1941年12月8日，倪柝声的父亲死于急性心脏病，一个礼拜后日本占领了该城。他父亲享年64岁，不久倪柝声到香港安排葬礼。倪文修死时已是神的一位真儿子。

## 第十四章 引 退

一个奋兴布道家能够自由地往前——把工作交给别人去照顾——来到神面前，这是一件有益的事。作为一个使徒的倪柝声，他需要栽培教会，关心他们的建造，他的确承担了相当重的属灵责任。这几年间较重的负担，就是政治的危机及交通的破坏，但更为紧急的是，他为着那些散布全国各地忠心服事的全时间年轻工人，因缺乏固定的薪金而深感良心不安。他早期的经历曾证实神供应他实际的需要，所以他知道这是他们付代价服事神的考验。当他仔细察看其中一位经过极严格的信心试炼后，他说：「当我们流泪时，仍用手扶着犁，这就是基督徒。」所以他能向一个同事写到：「纵使教会的事务，及这世界上事，都压在我的身上，超过我所能胜任的，但我仍然能在交托主的光景中往前。」

也有人问到如此快速扩展的工作，将近两百位全时间的工人，外加广泛的旅行，出版计画，房屋租金及购置产业，而财务的支援情况主要来源是个人的什一奉献，他们从来没有强制实施「什一」奉献，因这奉献被视为个人完全奉献给神的表征，但给的律正在教导而且仔细实行中，所以所有地方教会都能自足。但在教会与领袖之间，工作与同工之间有所区别，这些工人不需要负任何地方教会的责任。当教会有了突破性新的福音工作（比如：会所临时雇佣人员，印刷圣经及小册的开支），整个开支就无法顾到工人家庭的需要，他们可以接受教会及个别基督徒的奉献，也就是所谓的信心生活。但属灵上的商议及物资上的支持则多少靠倪柝声个人亲自照顾。将近有四十位工人实际上是由他直接负责，工作的基金自然与教会的奉献是分开处理，是由他及二、三位年长同工一起管理。

中国人对商业有一种特别的看法，神救恩的信息，也把许多成功的商人带进教会。其中有些人为了表示他们对主的爱心，丰富地供应教会扩展工作。这段期间倪柝声有一种透彻的说法，说到「玛门是不义」的事，如果埃及在神的预定中要被「败坏」，那么我们自己及钱财，都要越过神的物与世界钱财的界限，而不是只把钱财送过去就行了。为此他不反对世俗的工作，反而随从保罗对提多的指示：「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作正经事业。」「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要的，免得无果子。」

(多三 8、14)

早期由于日本人占领东南沿海，使得长江流域的贸易瘫痪，许多中国商人的收入停止，因此整个财务因依靠在这些商人身上，使主的工作遭受打击。在他从海外回来不久的一次危机中，倪柝声曾两次收到从英国寄来的奉献。因着日本与美国的敌对状态，通货膨胀突进，租界区的中国商业几乎停止，任何基督徒在事业资金的周转上几乎不可能，因此，他看到许多忠心的年轻「使徒们」及他们的家属挨饿、生病及财务上的困境，而教会一般的信徒也没有比较好，他们与倪柝声都凑不出钱来帮助他们。

故此，倪柝声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弯上，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不相称，他为这件日渐加增的经济问题感到沮丧，几个月来一直在神面前寻求解决。一九四二年年初，他采取了一个自己觉得是神带领他的步骤，但却在一些朋友心中，引起很大的问题。

他的弟弟倪怀祖是圣约翰大学的化学学士，曾在他私人的实验室中研究化学。他也在上海设立一个制造及分销药品的公司。倪家弟兄也有人参与这项工作。这个公司并不兴隆，因为怀祖只是一个教员及科学家而不是商人。倪柝声看见这儿是有些前途，因它没有军事色彩。而它能够存留的原因，是因为它应付里战时的需要。

早在一九三八年倪柝声还在伦敦时，他曾建议弟弟申请一张磺胺药剂制造的许可证。现在他想创建一个联合公司，从事制造高级的综合性药品，利用他弟弟化学师的经验，把多余的利润用在主的工作上。所以中国生物及化学实验室，便在上海胶州路九号成立。他从香港请来殷祖澜做经理，他是多年前倪柝声在牯岭疗养院向他作见证时被拒绝而年轻病人，后来籍着宋尚节的被主得着。起初，倪柝声以董事长的身份，把事情交与经理管理，自己则从旁协助监督整个事业，后来却落入穿着时髦直接参与生意商谈的工作，然后回来换便装去探望圣徒。他戴着一顶帽沿下垂的帽子遮住了他的头，使他看起来活象一介匪类。陆忠信说，有一次他跟陈主言及乐腓利到倪柝声与张品蕙所在的友华村十三号简陋的家中拜访，当他们坐在冷清挂着黑布廉子的房子中，窗户粘着防碎的纸条。他提出众人的问题说：「为什么你离开神的工作去做生意呢？」他回答道：「我只不过做保罗在哥林多及以弗所所做的。」（徒十八 30，二十 34）又说：「但有一些不同，因我是短时间的，我一天只花一个小时，训练公司的业务代表，其他的时间我做主的工作。」这些业务代表，也是他强迫的「众使徒」，他鼓励他们在做生意时，也为福音作见证。但在逼得紧时，他曾悲伤地说：「我像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妇人，为了经济的需要，必需出外工作。」

因着日渐加增的烦恼，他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理由，如同一个有才干的人，被平凡的事务困住，所有雄心壮志面对环境变故而受冻挨饿，他的难处正像中古世纪的一项毛病，「一种对敬虔操练的轻视，憎恶自己的职业……特别是在唱诗时，本人不合时的呵欠扰乱了诗章。」起初他难于处置这些困难，后来他在患难中坚定下来，这正可以用乔索{Chaucer}s}补救的亮光来解说：「如果想针对怠惰及其并发症下药，有一种叫坚毅的德行是最好不过了，这种德行得平凡的人，能籍着他们自己而睿智明理的意志，来从事困难及重大的任务。」

他这种新生活的方式，最初引起适合朱臣、杜中臣等四位长老的疑惑，他们心理想他是被沾污了，在他们的眼中是一个叛徒，或是换个补语认为倪柝声是一个扶着犁往后看的农夫。他们自问，像这样的人怎能传讲神的话呢？到一九四二年年底，他们要求他停止在文德里的讲道，虽然俞成华是有敏锐

感觉的人，但对立刻从传道退休有点犹豫不决。倪柝声垂头丧气，不知道该做什么。当他与殷弟兄坐在一起，分享他所喜爱的福建大橘子时，他对殷弟兄说：「我真羡慕你，能够自由地在工厂做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你在聚会时交通几句话，他们必然认为你是一个很热心的弟兄，没有人会怀疑你。而我呢？他们要清楚知道我二十四小时是怎样应用的，因我是一个受到注目的人。」

一般信徒对长老们所提停止倪弟兄讲道的理由，引起很多揣测，由此招致一些非常严重的说法。一些恶意的批评指出他的生意是与世人同桌吃饭，而这些人都是他过去见证所结的果子。既然负责弟兄保持沉默，他觉得他的整个见证都被人怀疑，但是许多工人需要都依靠他，所以他无法放弃他所承受的负担，在以后的两年间他们没有太与他接近。当他遭受攻击时，他回想到和受恩教士慈爱的面庞，他就不想再为自己辩解，只好接受他们的处置，就当作为从神而来的管教，神必在祂自己的路上为他伸冤。

起初张品蕙并不领会他的态度，且在生意上很努力地帮助他。有一天她听见倪柝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继续不断的说，且声音很大。倪柝声只是听着，且偶尔回答：「是！是！谢谢你！谢谢你！」挂断后，她问说：「是谁打来的？」「是一个弟兄，他说，我做的是错的。」她问：「你都承认了吧？」他答道：「没有。」她不耐烦地高声说：「那你为什么不向他解释，而只是『谢谢』呢？」倪弟兄回答：「如果有人把倪柝声抬到天上，他仍是倪柝声。如果有人把他践踏到地狱里，他仍然是倪柝声。」神是公义的，这对他就足够了。然而更戏剧性地是那些暗地在经济上接受他帮助的一些弟兄，却公开地反对他。

一九四三年初，日本人预备在他们的拘留营（或称为平明收留中心），把一些外国人集中在一起，倪柝声尽其所能的帮助他的朋友，虽然往后日子非常艰难，他仍然变卖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照顾史提恩医生（Dr.Steans），他因为重病躺在医院里，无法与家人到集中营去，三月十六日晚上，当伊丽莎白·费巴及菲力斯·迪克姊妹尚未进入城南的龙华集中营前，他们在小屋的四面围上红色及黑色布廉，并用一个简单的炉子做饭菜款待这两位客人，他们在简单的饮食前向神祷告，宣告祂的信实。然后两位姊妹深夜回到她们在天鹅绒巷十七号寓所时，发现钥匙放在屋里，于是正如她们有时所做的，菲力斯·迪克姊妹从屋后储藏室的窗户爬进去，当她正在爬时，突然受到撞击而跌下来，当场就死了。这位极敏捷及圣洁的宣教士，据说她死时仍然带着微笑。

倪柝声为中国生物学实验室取一个中文简名为「生化制药公司」，这个名字也巧妙地包含着药效宣传花招。他们所生产的消毒剂除红药水外，又开始制造消炎片、磺胺药剂、强力维他命及 Yatren。由于新计画的需要因此占据了他的时间，这些问题是他未曾预料的。因为若是经营一个生意，那么你就不是自己的主人了。每当一样新药品第一次推出时，他们便遭受其他大公司在商业上的猜忌及致命的竞争，他们也遇到股东的埋怨及维他命注射液过敏的报告，再者家庭式的生意也是脆弱的一环，使他受人怀疑，因为他们要求对新出药品的配售权。他将组织及协调的恩赐都用在管理上，加上战时的情况使得营业困难，所以需要更仔细的经营。结果，倪柝声很少在上海。

他为了汇款给工人的事，便与怀祖一同安排，计画长期离开上海。因为日本军队向西推进攻击政府军队的据点，普通中国平民是无法越过前线，他只好籍着航空通过战线前往重庆。当时有消息传到上海说自由地区的省分有属灵的复生。重庆由于有最好的临时流亡大学，兴隆的商业及投机银行家的卷入，使她暂态进入了二十世纪的水准。倪柝声并不计画与日本人做药品生意，他着手在这些极大需求

的地区，调查改变销售网的可能性。他这个计画非常成功，不久他便与政府订了合同，使得生化制药公司成为中国主要药物进口及制造、批发的大公司之一，虽然有人在福州谣传他们缺乏经营能力，这不过是没有根据的传说。他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往返于上海及重庆的旅途上，且在重庆租了一间小屋，张品蕙也同去，她年轻的弟弟撒母耳也在四川帮助做生意。城里的聚会，也因各地逃亡到此的基督徒而加增，在江守道弟兄服事下逐渐兴旺。他跟他的妻子玛利从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逃出，经过印度抵达此地。倪柝声着手帮助一些逃亡的弟兄们，把他们安插在制药工作上，并用他那清楚有力的言辞传讲的话。一九四五年他以亚西亚七个教会的题目传讲了一连串的信息，这些信息等于是以自己的观点，籍着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强调地方教会是神的重要策略。

他在这双重的角色上表现他的才智，使他的才能有了前所未有的表现，并且乐在其中。但是他素来孱弱的体格，这时开始在他身上现出他的压力。有一阵生意上的需要太大了，以致他很少或几乎没有剩余的力量来指导圣工。一九四五年，他大姊的孩子陈终道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他每天都在重庆一家旅社与他们见面。他发现倪柝声是被世俗的挂虑所占据，几乎失去了以前所有属灵的安息，显然这正是个改变的時刻。

同时，在上海哈同路的聚会，因为人数的减少，也有一番的努力。后来，一方面是由于失望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参加由占领当局所发起的宗教合一运动，他们解散而到信徒家中聚会，这也是一个极佳的预防办法。日本人在城里各个区域，用拒马阻断交通，有时一个地区可能忽然关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在劫掠严重的情况下可能把它关闭几个星期，若被困在其中就无人能出来，因此造成无可言喻的痛苦。哈同路的教会也像上海其他的基督教团体，在私人住宅的聚会中存留下来，最主要原因，是那被圣灵引导的基督徒能够带领此种聚会。

八年的中日战争终于结束了。末期，日本人从汉口向南推进，想把中国切为两半，后来因为日本本土遭到严重轰炸，及美国陆军入侵的威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九月九日在南京与中国签降。

由于交通不再有危险，所以倪柝声离开重庆。耶诞节期间他去到香港，不久便返回上海，但仍然没有讲道也没有与教会修复。信徒灵里需要他的说明，却碍于有关他的谣言所混淆。有人暗示他曾误用教会款项，或说他曾与日本人合作，甚至他亲近的同工也承认，因他属世的工作感到不平安。他对一个友人说：「我已全交在神的手中。」很明显他未曾受到搅扰。

在其后几个月中，他计画从生化制药公司退出。在满足股东的要求后，他跟怀祖商议，把一大笔的利润转入工作及将来供应工人之用，其次他回到福州，位于南台岛海关港十七号的老家，这个房子正空着，有一个大花园及小房间，是训练工人的理想中心。所以在张品蕙帮助下，他们把它重新整理好，并再次为主所用。

回到倪柝声童年的环境中，他籍着禁食、祷告及读经寻求调整他的思路。在这几年的困难中，他一直没有停止读经及计画扩展福音的工作，问题是现在要从哪里着手？他需要安静下来等候，看看神如何带领往前。忠心的俞成华医生，在争论中回来讲道，于是慢慢地信徒又再回来聚会，他以「内住的基督」请求他们彼此复归和好，进展的情况相当缓慢，似乎还需要作其他的调整。

倪柝声考虑他的朋友李常受。他留在日本战线后的山东，战争的情形并不很激烈，沿海各城市聚会

的人数迅速地增长，特别是李常受在曲阜的聚会，由于他靠着神的大能传讲真理，有相当显著效果。一九四六年中倪柝声从福州写信给他，把上海的需要告诉他，请他到上海来帮助。李常受得到神在他心中的印证，与家人向南迁移到南京，他从这个据点开始从事南京及上海两地的复原工作，虽然这个工作似乎有点迟了。

他的信息加强了俞医生的工作。「内住的基督」是神的百姓合一的盼望，正如他是信徒生命的源头。而李常受弟兄是一位实行家，将倪柝声仔细考察圣经所得到的教义基础，籍着他那山东人的勤奋及火热，把它轻松活泼地介绍出来。如此有了迅速的回转，几个月信心恢复了，人们再度涌向聚会，人数像滚雪球一样的增长。

李常受是位精力充沛的治理家，善于处理大群的人且具组织才干。这个恩赐正好用来解决混乱中的上海聚会。早在一九四七年会众就在分区的情形下参加聚会。增长的情形持续一年多，他们两周一次在文德里聚会，视文德里为「上海的教会」，主日早上十时传讲神的话（每月的第一个主日传福音，其他三个主日讲道）。每周三次在「家」里聚会，主日晚上分开在十五个地区的各家掰饼，礼拜二晚上祷告会，礼拜五晚上初信造就。另外礼拜三晚上在四个家有集中的福音聚会。长老们负责整个教会，但各家有一位带领的弟兄及一位姊妹，还有一位「轮值的执事」帮助他们值班及处理问题。

不久他们发现信徒喜欢更换地区聚会，所以一九四八年六月就把人们分配到各区，并劝告他们要「顺服那些治理你们的。」（来十三 17）解决人们移动的事情。这时，因为人数加增，牧养的问题显得重要。一个家的人数从四十到两百不等，所以又再把它分区或分排，每排约十五人，大概都是住在同一条街或巷子中的信徒，有两位同工负责照顾排内信徒参加聚会，及他们属灵的光景。这个系统使得教会在日本统治下分散时，看出它的价值。主要是因小型聚会使得参加祷告交通的信徒更亲密，并且在强迫学习带领中，使得属灵恩赐得以成长。有一点十分可贵的，使他们没有区分弟兄或姊妹聚会，没有学生的特别聚会，也没有其他社会阶层的聚会，因为教会是不分阶层的。但有传讲恩赐的姊妹似乎产生了问题，偶尔有姊妹聚会，为这些有恩赐的姊妹安排。有一位在广州聚会的青年基督徒回忆说，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张大白布横挂在会所中间，他问这是做什么，别人告诉他因为李渊如及汪佩真姊妹来看望地方教会，她们既然不得不向弟兄传道。弟兄们只好坐在白布后面听他们的信息。

福音不只是传道人的工作，也是教会全体的工作。所有信徒都被训练成「陪谈员」，福音信息结束后，每个人与坐在旁边的人交谈，记下他的姓名及地址，问他一些问题，也让他发现，如果可能的话，在自由的情形下，带他祷告呼求主的名，有时就在这个时刻他就得救了。宣教士们看到这种光景都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礼拜五晚上，特别配合初信者的需要，向他们讲解神的话。一九四八年倪柝声基于他们的需要，提供有系统的基督徒初信课程 52 题，范围从因信称义到教会生活的实行原则。这些课程由上海每一小群的领袖来指导，也广泛地应用在大多数的教会中。一年的课程对于那些对主认真的人，实际上是积极性的，缺课的人要自己在家补课赶上。如果有人来寻求主的救恩，很快就能明白它所有的内涵。

由于组织活动过分的的发展，使得早期灵里的自由逐渐丧失。记录卡的系统很快应用在聚会中，包括一个完整的信徒索引——有位址、职业、家庭等等，意思是说只要你没有来聚会，他们便能够很快地与你联系上。掰饼是「有限制的」，你必须经过正式介绍或戴著名条。或者你能作自己重生及爱主的



见证，他们也会接纳。在过去，掰饼常是由细的察验才能被接纳。1940年倪柝声劝告一位弟兄说：「不要期望圣灵在青岛做与上海一样的事，要让他自己做工。」但不久编组的工作借着权柄的手，加强在各工作中心点。李常受小心的否认了「组织」观念的关系，他解释：组织像一个盛水的杯子，这种安排不过是成为交通属灵的器皿，但他强调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顺服。他劝告说：「先问清楚，否则不要做任何事，因为堕落的人是照他所喜爱的去行，这里是有等次及权柄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地方。」

## 第十五章

### 归 回

这是在聚会所负责的弟兄，因着倪柝声长久离开他们的服事，心里感到非常沉重。早在1946年，李常受曾向上海的长老质问说：「你们是否在灵里决定开除他呢？并且开除的结果如何？你们能否说这是带来生命呢？」他们忧伤地回答：「不是的。」同工之间感到良心内疚，从1947年4月他们中间一位同工的谈话，可以知道他们正耐心地找出一条挽回的道路。他说：「倪弟兄的事，真是我们的致命伤，也不知道结果要如何，控告他与敌人合作的事完全是没有根据，并且他们所说的也没有根据事实。这是撒但的工作，更证明我们自己灵性的低落，盼望我们都能学到功课。反对他回到我们中间的因素正逐渐消除，并且欢迎他回来的意愿正在增长，许多在上海的弟兄不断地到他家去拜访，希望借着这种交通，众人的心再次联络在一起，可以清除一切的阻拦。我们正等候那一刻的到来。」

有两位基督徒商人应倪柝声的要求，接替他在制药公司的责任，四月他得以抽身再前往福州，临走前他表示已预备好随时回到上海的教会。福建及各处的宣教士多数已再回到他们的岗位，集合他们失散的羊群，但外国工作人员比以前少。宣教团体仍然拥有在城东鼓岭山上的度假房屋，其中两栋由石头砌成，靠海边那面有挡风围墙的大平房要出售，倪柝声便买来作为长期训练男女工人的中心。

1947年夏天，有一小群工人从福建、浙江及其他各地（包括从香港来的老同学魏光喜），他们在此参加他密集课程的学习。倪柝声在起初的十次信息，是回到他的属灵起点上，讲「十字架」信息的基本原则。这篇名为「灵的释放」的文章传阅很广，其中提到「破碎」是释放属灵能力的一个条件，并以耶稣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十二24）为印证。他们建立了一个合适的根基作为新的开始。在上海的一所新设立的国立大学，一场为刚得救学生所举办的聚会中，神大大地使用他。在福州有人为他租下美国差会（American Mission）的大礼拜堂，无数的群众从周围各处涌来，要听这位从前是31学院的学生讲道。神似乎在祂仆人传福音的见证上加上了新的印记。

这是李常受仍集中照顾上海及南京教会，到了年底他在繁忙中抽空探访处于饥荒之南部各省的地方教会，并于1948年2月结束了他在福州的一连串聚会。这些工作告一段落，他与一些同工包括汪佩真姊妹，一起到南台海关巷的倪柝声家中商谈。自从中日战争后各地的工作缺乏照顾，李常受关心各

处工作的虚弱及孤立，他充分印证了倪柝声的训练计画，也讨论到他在日本占领的北方所发展出来革新的传福音方法。

当时山东沿海城市的教会，在二十年间有极大的增长。李常受已拟订了一项移民传福音的计画（这些想法可能是他想出来的。诚然，为了人口及商业的缘故，中国一直是在移民，北方穿过长城到东北，西到新疆，东南进入南海）。山东的代表弟兄说：「现在我们在沿海有相当多的聚会，我们在遥远的地区支援一些孤单的拓荒者，这种方式是不切实际，也得不偿失的。我们可以把一群离开曲阜，移居到福音未传之地的信徒，组织成为一个自立的经济团体，让他们在那儿成为基督徒生活及见证的中心。」

他从使徒行传中发现了先例：「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是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徒八 1~4）又说：「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讲道，传讲主耶稣。」（徒十一 19、20）弟兄们说：「现在我们尚未遇见这中逼迫，但即使没有逼迫我们仍能效法他们的榜样出去。」

李常受研究了这个问题，小心地计画出各种细节。一群经过挑战的家庭，包括个人光景及各种适当的职业及专长——园丁、鞋匠、教师、护士、理发匠——为着他们的将来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理发匠的职业最受欢迎，因他们装备简单，最容易有作见证的机会。）教会供给这些奉献的人旅费，及抵达目的地后三个月的生活费，盼望三个月后他们能在新的地区自立。

回溯到 1943 年春天，有两个团体离开曲阜教会，一组有三十个家庭，他们进入东北；另一组有七十多个家庭，移向西方的市镇，他们经过山西沿包头铁路，进入远在长城外的绥远省。这两个团体都遭遇到极大的艰难，计画没有完全成功，并且因着这个计画，一九四三年五月李常受被日方视为有间谍活动嫌疑，在鞭打及「水牢」中经过一个月严厉的考问。无疑地从这次移民尝试中，结出了真实属灵的果子。一九四四年十月，一位在汕头聚会的宋姓弟兄写信给上海俞成华医生，这封信是从黄河上游的一个市镇寄来，信中提到他们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以七个弟兄三位姊妹为核心而开始聚会，然后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九日他们为六位初信的男士施浸。信上说：「我们室内没有地方为他们施浸，但他们都急着要遵守主的命令而不能等待。所以只有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就是打破黄河二尺厚的冰来受浸，当时气候相当的冷，有一天突然暖和了二十度，我们在河旁架起活动帐棚，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被冻倒及生病。」三月二日他们举行第二次房门，这次比较困难，因为冰下没有水，他们不得不沿河而下找到一个较深的地方。这次也没有人生病，且有极大的喜乐，在信的结尾还附上鼓动上海信徒的几句话。这是在许多籍着这种方法，设立福音见证中心，新生命发芽的一个例子。

一九四八年二月在福州倪柝声的家中，他们讨论把这些经验用于李常受在南部所见混乱光景中。李常受则建议不是把它应用在像广东及福音这么大的地区，而是籍着集体的努力可否把福音传在像福州这样的中心点上？

倪柝声同意这种做法。他指出耶路撒冷不过是一个中心，神的方法是把他的工作集中在这里，拯救灵魂，建立教会，然后打发人们去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福音。他说：「一九三七年我们在汉口看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门从安提阿出发是对的，但是使徒行传不是从十三章开始，而是从第一章开始。这几年我们的失败，是我们没有按照耶路撒冷的原则建立起工作的结构，我们必须集中同工的力量来服事中心各点，直到地方教会完全建立起来，然后把整体移到其他区域——除非神兴起逼迫把他们分

散到各地。」

这一点新的亮光照亮他们全体。李常受说，他们都来到倪柝声那儿，恢复以往的交通，神籍他给弟兄更多的亮光。正如他们早期看到教会是严格地一城一个地方教会，现在这种广泛的福音移民原则，使他们的工作也得着更新。这可能意味着：「使徒们」或工人们个别冒险的结束。李常受说：「现在我们同工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决定以福州为我们的耶路撒冷，为起点的地方。」几位各地地方教会的领袖们聚集在福州天民路，他们在三月三日召聚了全体弟兄姊妹，李常受说：「他们正式交出教会由我们同工接受，事奉及教会在福州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叙述令人惊奇，它与倪柝声早期坚持地方教会是完全不受使徒们（是指工人）的管制完全背道而驰。从这点事实，使人们觉得这个运动，是朝着较严谨的权柄主义发展，不亚于国外的教会。一般而论，这个做法可能是福州的长老们主动发起的，这是在停止倪柝声二十四年的交通之后，一种表示宽大及恢复关系的行动。

李常受从上海的长老那儿，带来了调停的任务。四月倪柝声受邀主领哈同路的一个聚会。当他到达那儿发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位工人，及三十几位长老和上海教会的人在等候他，其中还包括一些从山东来的，他们对共产党仇视基督徒的信仰十分清楚。

倪柝声先与文德里的长老们到一边去，在神面前完全承认他过去几年来自己的失败，因着这次他们之间调停的交通，使他们昔日的情谊恢复过来。倪柝声再度受欢迎回到同工的中间，进入一个崭新的光景。某种圣品阶级在他们的高阶层中被建立起来，借着一排椅子的坐位来表示他们前后的等次，而第一个坐位无异议的都是为他保留。这一点，从一方面可以看见可能是他们对倪柝声信任的态度，但是事实上「顺服权柄」的口号，却成为许多人此后在工作上极大的困扰。这件事似乎与他过去教训及工作的特征大相径庭，以致有人猜想很可能是倪柝声改变观念所发起，要不然就是在他灵性软弱时，被那些热心的人所影响。

这时他们已预备好再献上自己，而众人所关心的事工，就是与神合作进军中国内地的服事。倪柝声把他心中所计画的概要告诉他们：「当神借着逼迫把百姓分散出去，那时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约有好几千人，那是一种不断往外的移民运动。」

「但是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时，在耶路撒冷仍有同样数目的信徒。我们不能保持静止，必须往外，以便有空处为着别人，因为移出多少也必须加增多少。今天中国有四亿五千万的百姓，但只有一百多万的基督徒。如果所有的基督徒接受同样的训练，然后打发他们出去，我们就必看见教会在各处传福音，而不是等候逼迫来时再出去。不论有否逼迫，我们都必须往前，因为我们许多人大半生的时间都已过去了，剩下的时间必须走直线的道路。如果我们不忠心，主必定拣选别人走这条路，但最少还得延迟另一个二十年。我们必须为神节省这二十年。」他特别强调以西北未闻福音地区为第一优先。他结论道：「我相信在短期内整个中国必能被福音征服，让我们为此献上自己。」

当他向许多长久等候要听他讲道的人传信息时，他们拥挤在教会中，倪柝声向他们传讲信息中的一点，就是耶稣所说的话：「神的物归给神」（可十二 17）这次有了爆炸性的回应，最主要的有许多长久听道的男女转向了救主，一个月内将近有两百多位初信者受浸加入教会。聚会的地方本来只能容纳四百人，现在有一千五百人来聚会就显得相当拥挤，有人坐在楼梯上、房子后面的客厅或站在走廊上，因此购地建筑较大会所的计画正急促地进行。

众人知道倪柝声已经把整个生化制药公司交给教会，在感动的潮流下，人们急切地把自己献给神，为着扩展神的工作，许多人开始把或多或少的现金倒进教会的奉献箱中，其他人则把东西摆上做为奉献。当时由于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加速混乱，有许多人从世界及世界的路上醒悟过来，因此把他们的整个事业，如：印刷工厂、墨水工厂等等全然交出来，彻底的奉献为教会所用。基督徒如此奉献财物，在中国是尚未见过的。这件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曾再次提到它的效果，但也可能引起滥用，譬如家中的人未能采取一致行动时。「交出给神」的口号带着复兴的炽热，从沿海的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重新奉献为主耶稣生活，带来了许多属灵的祝福。

困扰的是如后教会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无可比拟的物质财产上，他们开始支配更多的基金及经营商业（甚至生化制药公司不但没有很快地卖掉，反而由教会继续保有），曾有一段时间，「资本主义」成为毁谤他们的名词，因缺乏慈善委员会管理的观念，持有这些财产便立刻引起人们的猜忌，这种理想上的改革运动，似乎因着错误构想的发展，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现成的盘中餐。

这时再度开办福州同工训练课。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一百多位青年同工从不同城市集会在这青绿幽静的鼓岭山上。缪绍训及吴仁杰从马尼拉来，陆忠信从新加坡来，他们都是从海外邀请来的同工，一位有二十年服事经验的姊妹贝特蒂（Joy Bette Teridge）也来参加训练。借着成都张撒母耳的介绍，他们欢迎两位正要前往西藏边境的青年拓荒者乔菲布罗（Geoffrey Bull）及乔治·巴特森（George Patterson）加入他们的行列。四月倪柝声写信给一位在西方的朋友：「我想中国是需要宣教士，但是他们要成为属灵的祝福之先，必须学习顺服地方教会，及成为地方教会的一员。这里的弟兄们都学习尊重基督是身体的元首，并停止走单独的道路，我也盼望从海外来的弟兄也能如此。我们几乎被各地的祝福『忙坏』了，所以请你尽量打发多余的人来。」

鼓岭山的森林盆地比涌泉山的佛教僧院还高，具有闽江河广大的视界，可从罗星塔泊地看到大海，是一个理想的灵修地点，有一群人在这儿安置下来，接受长期的训练。倪柝声与张品蕙有幢属于他们自己的小茅屋，周围满了花丛，他在那儿等候神，并整理他引退及比较安静的那几年所累积的思潮。他在这几个月中的信息非常多，包括一个基督徒工人性格各方面的题目，如：神话语的职事，属灵权柄的原则，疾病问题，初信造就五十二题，地方教会事务，广传福音的新准则及如何读经等等。起初每个主日，陆忠信要长途跋涉，辛苦地走下可以眺望青绿稻田、红棕色村庄及福州古老的黑色城墙，回到南台地方教会去掰饼。最后他找到倪柝声，虽然倪柝声这时显然还不能确定陆忠信是否与这群聚集同工们同心，陆忠信诚恳地向他保证，要他同意他们在鼓岭山顶村庄中的小祷告会堂中掰饼，而这个村庄位于许多梯田中间。

当倪柝声向培训工人传讲时，他的话好像是长久积压下的水门突然打开而奔放一般。他把手放在背后，走上走下地从他心里说出每一句话，讲完后便发出一些问题，他的答案是宝贵的，绝不含糊而常是率直地切中问题核心。每个早晨有一段时间留给各人做见证，每一位工人可以讲半个小时，随后其他人被邀请发表他们的评论，最后倪柝声把各点做总结。整个训练课程相当紧迫，因为国家未来的政治情形尚未确知。五月分他在上海新出版的杂志——「战事」第一辑的刊物上写道：「这些日子的危机，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鼓岭的训练计画就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冬季的几个月暂停训练，是要参加在哈同路工人会议的研讨会。

倪柝声虽在这种极严肃的光景中仍在文德里传讲信息，每次进入会场他都发现人们正在等候着。教会多数的时间都用在祷告上，祈求神管理这个局势，使福音的门仍能开着。他自己已与同工及长老私下交通时告诉他们，他经过长期的祷告，他里面确信未来局势政权将会转移，他自己仍要留在上海。他曾读过马克思及恩格的书籍，确信共产党的态度绝对与日本人完全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下，基督徒的见证更为困难，教会可能面临全面禁止，再没有机会自由服事主。但他个人的呼召是继续在中国服事，把福音带给中国的同胞，政府可以撤退，但神的教会不能撤退。他向少数同工说：「当年长的倒下去，你们年轻的一辈必须要继续往前。」他又说假若环境逼着人们逃亡海外，李常受应该与他的家人预备出去，把福音传给分散各处的中国人。李常受同意在主面前持守这个计画。然后训练团体回到福州，在牯岭继续他们的学习。

## 第十六章

### 一致的拣选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八路军进入未经抵抗的北平。四月，军队集结于长江三公里泥泞的北岸。将近五十万的国军部队面对他们布阵与南岸，有强大的海军及空军支援。但是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及朱德下令渡江攻击南方，由舢舨、浮筏及浮传船所组成的船队渡河时，几乎未遭遇到任何抵抗。而将近三十年的南方首都南京，由于情势所迫而失守。

倪柝声早已从福州打电报，指示李常受及其家属从上海到台湾的新工厂，他也打发张品蕙与一些姊妹们到香港。陆忠信到新加坡，缪绍训及吴仁杰到马尼拉。由于共军南进非常迅速，几乎在一天之内占据了三个城市，于是决定停止牯岭的训练课程。工人们下到福州，从北方来的则飞越过即将沦陷的城镇，回到他们的聚会所。李常受从上海回台北以前，先到福州报告上海的情形。他说台北仁爱路四十五号新盖的会所已经完工，可坐四千人；初信造就五十二课正在排印。这时经济极度困难，但聚会满有生命，他们在新的道路上见证了神的信实。

五月，上海明显快要解放，倪柝声知道他必须回上海。五月二十五日共军进入上海，有一段时间，倪柝声继续主持教会每周的查经及工人聚会，并说明处理各种事务或需要，他自己也拔出时间另作新的学习。他早已熟悉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概要，深知它的反宗教本质，他与城内几位信主、至今仍为秘密共产党员有所谓「朋友」的关系。其中有一个是张品蕙的十六叔，他跟他们住得很近，他多次找这人谈话，要知道共党对宗教团体将来的计画如何。他已预见执政当局必要干预一般信徒的生活及行为，而且看见中国共产党必定敌视教会的全国性福音工作。

解放后的两年多正是所谓的蜜月期，共产党员暗地观察基督徒，察看领袖们的影响力及恩赐，以便预定他们将来不同的命运。张品蕙的叔叔曾热心应许要帮助倪柝声，个人保证若他留在上海，必不遭麻烦且无所惧怕。倪柝声可能像许多人般被这些共党官员欺骗，认为他们是讲理的人，可以借着智慧的手腕与他们打交道。

.....

在这几个礼拜中，倪柝声有机会到台湾鼓励李常受，少数同工随他前往，许多逃难的人们因着住处及工作都极度困难而沮丧。但是倪柝声在几天以内召聚几百人一起聚会，这些人成为台湾教会新的核心，在李常受带领下逐渐茁壮。虽然倪柝声的身体非常疲惫且遭遇许多反对，他仍到香港在九龙半岛的钻石山与张品蕙相会。

他于一九五零年年初回到上海，二月六日左右，上海受到以台湾为基地的国军空军严重的轰炸，发电厂被击中，这时灯光、电力、饮水处于严格的管制。当他于五月间再次到香港后，举行了一连串的青年聚会，在这已衰退的地方教会中，复兴已经开始，他安排两位性情不同的弟兄魏光禧及陈则信在一起同工，且帮助他们在九龙天文台道，寻得一块地成为教会新的聚会场所。

一九五零年五月，李常受来香港，报告台湾工作的进展，并且告诉他，应该自己回到台湾，继续这个工作。六月，李常受在临走前，曾尽力试图劝阻他不要回上海，倪柝声申辩说：「但是弟兄，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把教会建造起来，我现在能够丢下他们不管么？使徒们在这种情形下，不是仍留在耶路撒冷么？」按照李常受所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山东人民公社所做的，他们重新考虑最近所拟定的福音广传计画，他们讨论到可能以基督徒共同生活成一个看得见的教会，以消除共产党的猜疑，确保工作得以继续。但在最后一个晚上，李常受再次提出他对倪柝声的建议，他说：「如果你回去，这就完了。」倪柝声这时接到上海长老打来的一封电报，说到他们有许多问题，请他早一点回去解决。这时汪佩真在场，她支持上海长老的请求。她提醒他们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二十九 10）尽管李常受再次把他拉到一旁，竭力劝阻，但倪柝声大声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如果房子塌下来，我的孩子还在里面，我必定把它支撑住，即使要我的命也不顾惜。」

这时从他的出生地汕头传来消息，他的母亲林和平蒙召进入荣耀。这件事也没有影响他的决定，他请他的大姊安排葬礼，而他自己则回到北方。他回去一方面阻止了他原先所赞成信徒逃往香港的行动；另一方面也处理了由弟兄们所管理的制药公司，李常受是该公司的主管，最后他们同意把公司转让给一个来自东北的公司。

当他回到上海后，他叫张品蕙也回来，不久便对同工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弗五 16）他承认过去浪费了机会而让它失去。他说：「没有一个神的仆人会满足于他现有的成就，如果他以现有的为满足，他将是一个失去机会的人。我信神现在所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神每天都给我们许多机会，而机会的总数谁能计算呢？今天是一九五零年七月七日，爱惜光阴是抓住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教会埋没一个恩赐是种严重的损失。我们以为南阳路会所刚刚完工，我们就可以一辈子安定下来么？我们传道使一、二十个灵魂得救就认为很好了吗？如果主所要的是我们一天得着一千个灵魂，那岂不是已有九百多个灵魂丧失了！当神要往前时，我们也当如此。当门稍微打开时，我们要赶快进去，因为机会总是不等我们的。」他建议全体信徒在各方面皆向前，例如山东的「耶稣家庭」之信徒，因着共同生活的原则，就目前的危局，必须去与他们交通。他说：「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功课，因为他们实行万物公用，这方面他们走在我们前面；但是关于教会真理，无疑的，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如果这真是神所赐的机会，我们最好不要错过它。」

倪柝声似乎相信，罗马书十三章的原则，与新的政权做某种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而这个

合作则视宗教自由所能得到保障之情形而定，因此聚会所各教会分发单张，要信徒不要逃亡而为了主的缘故留在大陆。他们预备放弃物质享受，成为好基督徒及好公民，诚意地与执政者合作，配合从事公共建设，例如修筑马路及灌溉工程等。只有一件事，他们决不违反圣经，也不否认他们的主。

这个工作起初很好，但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倪柝声早已对他们警告过，这种初期的印象是虚假的。共产主义的政策是依据事物、时间及地点三个条件，当任何一个条件改变时，政策可能就会改变，所以态度可能在一夕之间完全改变……。

在上海，南阳路的聚会便是明显的例子，三、四千人主日早上的敬拜聚会，转眼可能成为斗争会。这种情形再度突显分散各处福音的需要，一些自愿的小群变卖他们的财产，拔起他们的老根，迁往人口稀少的江西，在那儿他们建立起农业垦闢区从事开荒。他们建筑简单的泥屋，成立一种互助的共同生活，个人有充足灵修时间，而晚间以团体属灵教导为原则。

此后，他们非常热衷于这种行动，特别是有一些共产党员归主，他们想：「我们的日子终于来到。」但是七月份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成为法律。在第二年及往后日子，当城里的人稍微有一阵喘息时间，农村就掀起了人们公审地主及富农的群众大会（有时执死刑）。所有的工作一律停止，全国的教会这时全部关闭。迁移的基督徒也不能免除参加再教育、门争大会，及面对编造曲解他们迁居动机的文章。同时他们也发现，共党对他们实行「耶稣家庭」仍不能免除对他们的猜疑。

有位河南的宣教士描述了当时的情行，他们在会众分散后，前往遣送地点时，受到新近迁来的一位「小群」弟兄的照顾。他不顾危险点一盏破旧的灯来聚会（他们能够替他找到一个较好的气灯）。员警前来告诉他：「你们不能再聚会了，」他回答说，「你知道！我们不得不聚会啊，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来十25）员警说：「假若你们一定要聚会，我们能否参加呢？」他说：「当然可以！」

另一位在浙江的宣教士写到她离开不久之前的情形。她说「『小群』的影响遍及各地，他们开始了一种新而有力的福音工作，在中国大陆这是一项伟大的行动，因它根本没有接受到任何外国宣教士的协助。神难道不是在这种时刻预备他们成为器皿么？小群是一种紧密的连结，又是谦逊及可塑性的组织，其肢体既是本地人具有深的属灵程度，且拥有宣教士的热情。」一年多以后她接到一封信，提到有关镇里各宗派基督徒联合的可行性，她评论道：「在『小群』信徒的带领下合一，可能是应付目前困境的最好办法。」

在一九四九年间，大多数的宣教士因着福音的异象，试图继续留在他们的前哨地点，盼望能在新的政权下，继续他们见证的工作，而一九五〇年五月周恩来与上海青年会吴耀宗为首的三位自由派新教领袖，深夜在北平进行一连串的共党形式会议。吴某在过去十年间，曾是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目的要拟定一项新教的「教会公报」，周某以这个新的基督徒运动的领袖及发起人自居，他的行事在各方面均显出虚伪玩弄之能事。所谓「中国基督徒在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程」之宣言，就是要求教会在一切行动上，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支配，而与「政府改革计画」合作是获得宗教自由的代价，事实上等于帮助周恩来命令解散外国宣教士，及拒绝外国经援。就如燕京大学宣教领袖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曾做过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因此共党将所有的宣教士都视为帝国主义者。

周某命令这个会议成立「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的筹备委员会，目的是使教会能达到自治、自养、自传，而「自」字正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意思。这个运动是应宗教事务局而设立，其归属于北

平无神论之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之下。它的口号是「爱国家，爱教会」，极力避免冒犯神的名。它的定期刊物「天风」杂志，不久就成为官方刊物，最终它成为全国唯一「基督徒通讯」的出版机构。

往后几个月，教会开展了全国性的签名运动，赞成周恩来所批准的「教会公报」，从十二月二十三日报纸上的报导，很清楚地看见将来宣教士的工作必受到极严格限制，不移交是不可能的。实际来说他们的存在必定成为中国教会的被迫加入三自运动的一个难题，再一九五一年内，几乎所有的宣教士全部撤出，这些宣教士是在中日战后，怀着极大盼望而来。一百多年来外国信徒及中国人的联系就这样突然、无情地中断了。

不少宣教士经过上海或在城中等候出境许可时，参加了南阳路的聚会，当他们离开时，灵里得到饱足，福音的热情再次受到鼓舞，也因着倪柝声个人的见证而感动，并得到他解经上的帮助。有一位访客说到：「所有基督徒的服事在某方面都有他的助益，但倪柝声的帮助是完全的！」大约这时，赖恩融（Leslie T. Lyall）邀请倪柝声到他上海寓所与几位中国内地会的同工商讨未来的工作。有关他们在被迫离去前这段时间内如何工作？他回答说：「请为我们翻译一些很实在的圣经注释，例如丁·阿弗（Dean Aifod）等的著作，我们太少这类的书，我们非常需要它，当你们再回来时，是以教会教导的长者身份，而不是以传福音的身份。因为传福音工作将是中国信徒的任务。」

此时，有一位中国牧师到南阳会所听倪柝声讲道，他用一个礼拜讲解罗马书一章1节，他说：「他每晚讲论一种不同的主题，但是当你把它们都聚集在一起时，却是一篇既长且完整的信息，这真是太奇妙了。」

一九五一年元月一日他在教会讲了一篇新年的信息，讲到「五饼两鱼」的神迹（可六 35-44，约六 1-14）与神的祝福，其要义是值得记录的。他说：

「一切的服事是基于神的祝福。我们可能设想周全并且非常殷勤，也可能相信祂的大能并向祂祷告，并付诸实行。但若缺乏神的祝福，那么我们所有的设想、殷勤、信心及祷告都要落空。而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有了错误，甚至遇到绝望的环境，只要神的祝福，它仍将是一个多结果子的工作。」

「试看这神迹的饼及鱼，关键不在乎手中东西的性质，而在乎那祝福的手。迟早我们会认识，问题不在乎我们的财富及恩赐，人只有从主的祝福得到祂的供应。有一天我们的财富、能力、劳苦、信心都要宣告无效。未来会极度沮丧的原因，将仅限于我们自己产生不能胜任的感觉。」

「这个功课是不易学习的，许多人的盼望并没有专注在主的祝福上，而是自己手中少数的饼。我们手中所有的是少得可怜，但我们仍旧看重它，我们越看重我们的工作就越困难。弟兄姊妹们，神迹是出于神的祝福，只有把饼交出来，它们才能增多。祝福使几千人得饱足，当祝福不来时，连『二百多便士的饼』也不足供应他们。我们要停止问说：『我们多少饼呢？』不需要做假，也不需要欺骗，不需要人的智慧及闪烁的言词，我们必须信靠及等候神的祝福。我们应当时常发现这个祝福，甚至当我们把事情搞坏时。一点点的祝福会带我们越过许多的困难。」

「什么是『祝福』呢？祝福是神的工作，而我们无法核计祂的工作。举例来说，你能计算一便士能买到的东西，但如果你没有付出你的钱，而神给你一万便士的东西，那么你就没有基准来计算它。五个饼给五千人吃饱还剩下十二篮的零碎，这就是祝福。当你工作的果效超过你恩赐的比例时，这就是祝福。或者另一个极端，当你认为失败，你的劳苦没有果效时，事实上仍有一些果子，这就是祝福。」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只盼望得到可以相称的果效，但是祝福就是远超过于我们相称的事物，这不正是工作的因素与结果，因为当我们计算我们所摆上的，只是成为神工作的拦阻时，这工作就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的心专注于祝福的主身上，我们就会发现，事情的转变超过自己的能力，基于超过我们所想的。」

「我的结论是要过『一个蒙神赐福的生活』，也就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蒙神赐福的工作，是根据我们正常的工作。『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三 10）今天是一九五一年开始，而在上海，这句话仍是神的话。」

## 第十七章

### 陷阱

两年来上海的街道上，充满了游行工人，学生举着纸旗和红绸布的标语。人们在许多的毛泽东照片前，随着鼓声的节奏喊口号，并且旋转摇摆地跳扭秧舞。然而在小街及巷弄内，严格的组织正在进行中。街坊组织起革命委员会，不断从事对工作场所及家庭的检查，人们也彼此监视着；个人隐私被受过教条灌输的狂热干部所侵犯，也有秘密员警潜伏其中，随时准备通报市府正规员警。而所谓的「打虎」，就是搜寻及摧毁掠夺百姓财富的邪恶资本家。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基督徒实在需要高度的信心及勇气。

倪柝声在一九五一年年初的信中提到职事的扩展，及有许多事务令他挂心。从四月十六至十八日总理周恩来召集一百八十一一个教会的领袖开会，为要缓和突然切断海外财源的恐慌。十二月一项公告命令所有接受外援资助的机构，登记款项来源、数量及他们使用情况的详细报告，倪柝声奉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代表「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团体。事实上，倪柝声曾接受宣教士们的奉献及海外对福音工作的捐赠，当局并没有把他们列入「帝国主义的工具」，他是受中共当局邀请，奉命参加为着交换经验。

上海的聚会一直在「极不正常的」情形下继续着，所有的同工正努力把握时机。四月二十七日黑色的礼拜六，上海当局逮捕了成千的知识份子及其他人，接着便是作家的思想改造。被捕者中间有极少的基督徒，并且「有些同工被监禁，为主受苦，但大多数还很平安。只是众人都在试炼中。」

五月二日「天风」杂志刊出一篇文章，鼓动全国的基督教会参加控诉大会，强烈要求全体会众参加自我批评及改造，口号是「多多宣传，彻底批评」，只有如此才有资格加入三自革新教会。他们必须公开攻击及清除隐藏在他们中间及领导阶层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随从」。有些团体中的领袖被指名出来，其他则要他们自己去调查。青年会的刘干事发表了一篇名叫「如何举行一次成功的控诉集会」的文章，他引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为例，鼓励基督徒克服他们的习惯，参加非宗教性的政治集会，并从集会有所学习。他说：「很多基督徒持守『超越政治』的老观念，我们必须召开控诉会来教育每一个人。」

举行一次成功的门争会是每个教会重要的工作，藉此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

为了起带头作用，三自运动教会在六月十日礼拜天，发起了一此大规模公开攻击宣教士的集会，地点在上海跑马场。他们事先仔细拣选「控诉者」，带头的基督教团体向成群的教友发表演讲。这次经过预先演习的讲词充分显出对宣教士个人及以前同工们的愤慨及憎恨。整个活动设计不但要使宣教国家丢脸，最终目的还要使基督教没有尊严，因此任何一个没有参加集会的基督徒都被严格注意。这种运动使基督徒在无情的逼迫中相互攻击，并给不参与运动的教会带来灾祸。「天风」杂志更在八月十一日声言，从五月以来曾举行过六十三次控诉大会，基督教会并因此调整活动范围，使他们能适应新的社会。所谓「三自运动」的最终意义是接受政府的控制，财政依靠政府，在政府的意思下增长。从七月的信函报导中说：「聚会正处严重试炼的情况中，特别是倪柝声组织下的弟兄们。」报告中又说，倪柝声再次生病躺在床上。

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强制执行所谓高度成就的「道德洁净计画」目的在消除犯罪、淫乱及各种腐败，呼吁人民及官员以他们个人的名义，达成共党所要求的全国性清除宣教士个人诡诈的行为，但采用的方法不是运用法律条文而是广泛的说服。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人民政府制定了两项道德改造运动，并计画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推行至全国，「三反」——反对腐败、浪费及官僚作风，「五反」——反对贿赂、逃税、偷窃政府财务、贗品及在商场上为了个人投机而偷取贸易机密。贴大字报的人，在各地召集群众公开悔改与认罪，因着不分青红皂白的控诉及伪告，产生许多突发的自杀，这个运动不过是未来一连串事件的开端，而且似有继续蔓延之势。倪柝声由于把生化制药公司转让给其他有能力的商人而被注意，同时因着政府怀疑而命令调查公司的账簿及税捐。

十月三十日基督教三自会的官方定期刊物「天风」杂志，发表出一位署名南京小群教会信徒的文章，他写到：「为了揭发祠堂巷教会（南京）的秘密组织及黑暗的工作，我以一个属于祠堂巷教会的信徒来说，起初我认为它是最属灵的教会，直到经过三自革新运动的教导后，我看清它实在是一个卑鄙的场所。我曾被它长期蒙蔽，但今天我站在爱国家和爱教会的立场，以公正的气愤来揭发它所自认的『属灵』。为隐匿他们反革命本质，祠堂巷的负责人坚持并强调她是一个『地方教会』，事实上她完全被蒙骗了。它从起初就隶属于上海教会，并由倪柝声严格的控制着。它是一个超全国性的组织系统，全国共有四百七十个教会的秘密系统，上海是倪柝声的行政基地，由上海直接管辖设立在大城市的『中心教会』，比如北平、汉口、汕头、福州等地。倪柝声以超越了教会教会的范围在暗中、神秘地控制了这些教会，为了他个人权柄的统治，他散布反革命毒素，支配教会信徒的思想，他无耻地自称为『神的使徒』！」

一些同工见此，正观望倪柝声将要采取何种自卫行动时，倪柝声回想神在他生命中的四次熬炼：一九二四年在福州被赶出教会及随后的复兴；他在重病中面临成为名布道家或藉地方教会追求基督徒见证这种较不受人注意的工作间两难的抉择；中日战争期间从服事上退出及再回来时属灵的丰盛；及这次对他个人的攻击。而这次攻击是包含以前各次的内容，无疑每个批评都有一些事实，他曾自忖为何要伸冤呢？每次主的责备及打击，岂不是带来更多的造就及属灵的结果么？

这时共党干部参加南阳路的聚会，试图在教会讲台中，挑起他们自己的控诉会，最后于一九五二年初，在三自会总部的强劲压力下，有两位三自会的代表在一次聚集中向信徒演讲。他们在演说中

控告教会领袖们帝国主义的行为，结果只带来一阵静默抗拒，无人发言支持，最后突然有人勇敢地站起来说：「难道保罗不是为基督看万事为有损地么？我们是否应该为基督的缘故，视伟大的人民政府为粪土呢？」这时一位安排在会中的干部站起来，喊着说：「倪柝声命令妇女们在祷告时蒙头，这不是专制么？」他们原先计画来煽动会众，但反而使控制者招到相反果效，弟兄们接着盘问这个外来的发言者。三自会的讲员站起来宣告说：「显然你们是不想自我改造，不接受此重训练，我要倪柝声自己负责你们的再教育。」

所有在教会中的人，都看出他们正遭到怎样的逼迫。无疑地三自会兜销员遭遇了一次挫折，但他们仍等待机会。倪柝声在经过与张品蕙、同工及长老商量后，决定专心于一件事上，就是为信徒预备圣经资料。李渊如姊妹及她的助理们，说明记录他所给的资料，举例来说，他向一群青年们讲到如何证明神的存在。也有其他一些实用的题目，如基督的公义及智慧，神为信的人所显出的荣耀及神统治的大能。但事情发展并不如他们所安排的，因为这时新政府命令他离开上海，财政问题、特别是药厂的生意，教会为此而受到牵累，需要他亲自到东北负责处理。所以在面对生死关头他们努力争取时机，他们从白昼工作至夜晚，每天只睡两个钟头，详述及记录神的话语，直到三月。

由于政府下了最后通牒，无法再拖延。他给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留下一句劝告的话，并说：「告诉香港的弟兄们，叫他们解散所有教会的有关企业。」他忧愁地离开张品蕙，带着极深的忧愁前往哈尔滨，直到一九五六年一月他被起诉，这次是信徒最后一次听见他的事。

一九五二年十月当他五十岁时，他在东北被公安局逮捕，初次询问可能是在哈尔滨或北平，他被指控是一个非法的资本主义「老虎」，犯了五反运动中五种破坏商业的行为。他被警告要为生化公司付上一百七十二亿元的罚款（旧国币约值一亿五千万美金）。他既不承认这种不公正的控诉，也没有钱来付这笔罚款，所以被关在牢中，公司也因此被政府没收。

起初监狱的情形非常地严酷，除了对身体重刑（也可能有）外，还包括胁迫、稀少食物、剥夺睡眠、虫害及持续不断地消耗身体的耐力，当然他的圣经起初就被没收，并且禁止与任何外人通讯。

他们曾允许他恢复基督教的公开地位，如果他愿意带领他无数地跟从者，在三自革新教会内，与中央人民政府合作。根据其他人在这个时期的经验，他在这项要求下，将有一连串再教育的强烈攻击会临到他，使他神经衰弱地放弃自由意志，成为默然顺从国家至上地精神狂。从许多资料中显出共党思想改造的方法，是运用轮流替换长期审问，政治性的演讲，无情监视人仔细刻意的检查，或是在他的牢室中，派住已经悔悟及悔改的「学习同伴」，以及参加尖酸刻薄的团体门争会。由于神能力的保守，他的心思并未被改变，也没吐出任何自白，足以成为他们的把柄。而他定然被迫书写或改写他生平中无尽的细节，从这些资料中，他「犯罪」的资料便一点一滴的被搜集起来，而且他要面对这些经过在麻木思想下所编造起来的「证据」对质。

这些情形早已有了许多先例。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他们向监禁中的魏以撒逼迫，并从他口中取得了一项招供，这也是他们企图要从倪柝声身上得到的。魏以撒是本地真耶稣教会创始人的儿子，他带领了这个庞大的团体依附了政府的步调。同一年耶稣家庭他们共同生活的成功遭到嫉妒，而乡村背景也有其弱点的地方，他们被迫在两者间择其一，不是强迫解散，就是以间谍行为、反革命活动及淫乱生活等「罪行」名义罢黜他们的领袖。共党不能容忍在中国还有一个「黑暗的核心」，以他们眼中认为是

错误的理由做任何事。在本土性运动的领袖中，若找不着有关「帝国主义」的证据，就必被控上其他的罪行。这正是倪柝声所遭遇的命运。

由于倪柝声离开了信徒们，三自革新会的代表暂时放低了栅栏。各地「小群」聚会的长老得到一个无条件的保证，假若他们加入三自教会的主流，「正如溪流，当它愈往前流，它就愈清晰及宽广。」他们被告知：「门仍是开着，我们伸初友谊的手，希望有一天能合一的同居」。因为无法联系倪柝声，又没有较属灵的人可以商讨，所以他们一个个轮流地被逮捕，不久他们大多数为着这样的行动后悔。

例如，早在一九五一年武汉城里，「小群」的会众已加入三自革新运动，顺从所指示的「学习」课程。后来他们中间有一位传道人何广涛，带领他们再度出来。面对员警的控诉，他曾说：「我们退出这个运动，纯粹是为着信仰的缘故，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长老们拒绝接受电影票，及其他从宗教事务局发下来的学习资料，对派到教会报告政府宗教政策的官员予以冷漠的接待，许多其他地方教会曾跟随他们的榜样。一九五四年何弟兄召集全国中心地区各地传道人在武汉开会，鼓励他们凭信心带领会众从三自爱国运动中独立，也为那些尚未退出的教会祷告。在倪柝声被捕的四年中，许多教会在此种情况下再次寻得他们属灵的道路。一九五五年上海教会也退出这个运动，他们因此为自己带来了凶猛的怒潮。

然而在南阳路的工作，某些方面仍继续有进展，带来了影响及能力。敬拜的聚会继续维持下去，甚至有一两年新年期间举行特别福音聚会。由于多数人的生活未能确定，所以个人见证的机会比以往大为增加。福音书房的工作也继续进行，有许多书刊出版，大多数是不具名的文章，但可以认出来是倪柝声的解经资料。

一九五二年春天所以学生被迫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导，然而在两所学院中有显著的基督徒觉醒，许多学生重生。这次复兴带来持续几年的夏令及冬令聚会，并以南阳会所作为聚会场所。在上海的每所大学内兴起了许多新的基督徒团契，据说连政治学院也不例外，学生们进餐时的谢饭成为辨认基督徒的方法。两三人公开场所不低头伪装谈话的祷告，使他们不致被察觉。利用每周政治教育四十五分钟休息的机会，躲开干部们的监视，举行一次人数较多的急促聚会。有些以前靠祷告簿祷告的学生，他们甘冒失去前途的危险大声祷告。虽然教会普遍都在压力之下，但学生复兴的光景传遍了全中国。

一九五五年七月人民日报公开攻击北平基要派地神仆王明道弟兄，这位名叫但以理的弟兄受到学生们相当的爱戴，他教会的信徒十分之九是学生。十月以前一次对他个人攻击的控诉会曾引起了一个「反对逼迫王明道运动」的反击，他所出的杂志「灵粮季刊」，始终忠于圣经，仍然继续出刊，并有广泛的影响力。倪柝声曾大大称赞他是一位属神的人，但没有时间去他的教会，并比喻他的教会为「半路凉亭」（路旁凉亭），是旅途休憩之地而非终点。

王明道曾坚决地拒绝所有三自革新会的提议，并且从共党的立场来看，很难对一位从来没有服事，或组织任何团体的传道人，加上任何控诉的「罪名」，所以只能从他个人基督徒的见证中，找到涉及政治上的问题。他们从他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的「要为我们的信仰站住」的小册子中找到了这些资料，八月八日他被捕的事件成为众所公知的事，一些从前支持他的人想藉控告他叛逆，企图从共党那儿得着好处。借着把他囚禁及强迫「认罪」等方式，使一个众所瞩目的基督徒终于被消除了。此时视野出现晴朗，因为主要风暴快要来临。

## 第十八章

### 试炼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三，宗教事务局在南阳路教会聚会所，召开了一连串的集会，全体会众都要参加。集会持续十二天，参加的信徒不用去上班。

在这些集会中，他们对信徒宣布倪柝声及与他有关系之人的罪状，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控诉他们有帝国主义的阴谋、间谍行为、对政府政策有反革命之敌对行为、妨害经济之不法及整体的淫乱，这些罪行记载在一本指控书上，共有二千二百九十六页。这种聚会是要提供资料给教会成员，引起他们的愤慨，预备在月底所要举行的群众控诉大会中有所斩获。他们事先告诉教会的长老及年长的姊妹们，给他们机会承认自己是共谋，并且领导教会公开抨击倪柝声为人民的敌人，两位长老做了声明，但被认为还不够妥当，而俞成华、李渊及汪佩真则拒绝做任何的控诉。

元月二十九日的主日，倪柝声的案子在上海公安局法庭举行听证会，听证是简短且秘密的进行，控告他在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从事有计划的反对人民政府的反革命阴谋。他的罪行共有五项：他与其从犯曾支持帝国主义及国民政府，反对民众运动，败坏许多青年，破坏生产及倪柝声本人曾犯淫乱。指控读出来，他只准回答是与否，不许辩解。他否认了间谍及破坏工作的指控，至于其他各项则保持缄默。听证完毕，案子送到高等法庭，附上一项严重的指控。

同一天，俞成华于两位姊妹及其他几位突然被监禁起来。第二个礼拜当地的三十几位同工及带领的弟兄们也被逮捕，很快地全国教会有几千个男女被捕（后来有人估计实际数目要高出一倍）。他们都突然失踪，他们的妻子，儿女也禁止人们接近，因而陷于无助当中。

第二天，一月三十日礼拜一，预先安排的控诉会在人民会堂举行。第一次是由公安局及宗教事务局几位元头子所召集的，共有二千五百人参加，所有的新教牧师受命参加，还有南阳路教会的信徒。主席是上海宗教事务局主任罗竹风（译音）。这次控告是公布所有细节，以展览照片及其他「证明」档为支持证据，所有的资料是藉各种官方报告，用几个月的时间编纂的，其中声称：

倪柝声是一九四一年开始替美国空军，及国民政府传送共军部队之行动及秘密计画。他于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最后一次到香港的真正目的，是报告国民政府二月六日轰炸上海发电厂及水源地的成果，并鼓励更多的轰炸。他更帮助国民政府的间谍，在江苏及浙江的毛共军中散布血细虫传染菌，并设计在浙江河流中放置毒蛇之幼虫，而且拒绝提供制药基本原料。

倪柝声也被控为非法资本家，从事西药买卖取得不正当利益，他在生化制药公司的掩蔽下，从国外进口制药原料，再转卖给其他药厂，又贿赂税务官员遮掩此种违反国外贸易的交易，他曾用这种方法侵占国家公款达一百七十二亿元（旧币制）。从一九五零年七月到一九五一年八月他在同一家公司的掩蔽下，「曾偷窃政府机密」，泄漏人民政府的军事消息给他人，并且同时泄漏生产计术的秘密，同时他也间接地犯了破坏的罪。他在一九五五年纵火及爆破了上海染料厂，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初，由于

他知道这些工厂的详情，所以他训练这些工厂中的基督徒从事长期破坏生产的任务。

倪柝声经过控诉后，成为十足的帝国走狗，他也曾把一个附属于外国差会的团体，登记为基督徒聚会处，假冒他们纯属中国人的团体，他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藏匿他帝国主义者的伎俩。事实上，他从一九二一年起就曾从宣教士、弟兄会、伦敦基督徒交通中心及海外个别的捐款人等，接受奉献遗产供工作之用。还有当中国内地会从国内撤退时，他们曾把一些教会建筑物「移交给倪柝声」，这更确定了他与宣教士们是「同一政治思想」的。

在「解放」以前，倪柝声就「在宗教的借口下计画并组织反革命的活动来反抗新的社会」。他假基督徒聚会所创始人之名，及他所隐藏的反动私党的帮助，设计他的全国「紧急计画」，为全教会的人员开设教育训练。在会中他借着讲义、讲道及讨论会，推动他的颠覆活动，他曾煽动基督徒禁食祷告。求神当时如何把法老的全军淹没在红海中，也把我们的军队淹在长江里。一九五零年他曾鼓动所有聚会会的信徒签名公开反对土地改革，但是，在这事以前，他预先封他的财产实行了一次「土改」，把他在福州广大的土地捐给他自己的教会，这是仅有一件能补赎他罪恶的行为，直到现在他毒害的影响力仍然存在。

当中国在迈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时，倪柝声一伙人反而教训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末后的日子」。他们挫折人民的士气，举例来说，把一九五四年夏天武汉的水灾归咎于神的审判。他们劝阻基督徒参加大规模的自我检讨及控诉集会，理由是基督教是超越政治。甚至教导他们学校政治学科考不及格乃是一件光荣的事。

倪柝声及其同工曾经替许多青年基督徒出过意见，并借着他们的恶谋破坏他们，也曾为一些青年安排婚姻，却在另外的情形下劝阻某种特别的配合，这些青年并非全都满意。检查官举出一个例子，某人的丈夫「因为从事间谍而被政府囚禁」。其他青年男女则以服事主的训练为诱饵，而「只给予重而低贱的工作」。还有更坏的，他们阻止青年加入人民自愿军，倪柝声并且摆出一付对抗美援朝运动的样式，他引用约翰一书二章六节教导青年不要爱世界。（一本他在这个题目教训的记录被用来作为证据）在他的劝告中，他所主张明显是不诚实的，因为他真正爱的乃是国民党。

倪柝声与他的私党，曾藏匿国民党分子，包括地下工作人员、将军、逃工、地主并吸收他们加入基督徒聚会的传道者、长老、执事行列，他们曾替他详细策划颠覆活动。一九五零年他们曾经利用生产劳动的借口，通知信徒支持政府的道路建设，其热心超过非基督徒，而主要目的是藉此掩蔽「推动他秘密的紧急计画」。几位「地下工作者」被列在名单上；陈路三（译音）是一位员警头目及反革命的土匪；卢思光（译音）他手中沾满了人民的血；李因信及其他人（显然有些人在他们奉献为神而活之前，曾在国民政府中任职），而这些人现在被视为国民党的「地下代理人」。在一九四九年与一九五一年间，倪柝声主张把这些人送到昆明、重庆、西昌、及其他城市的基督徒聚会所，为要「假装在福音移民及宣传神的道之行动下，扩大从事他的反革命影响力」。他急于实行福音遍传中国的计画，乃是藉传福音成为他政治宣传的有效借口。他曾疯狂宣称他要在十五年内把福音传遍全国，比共产党的革命做得更为完善。

在这计画中最可耻的步骤，就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他的「交出给神」运动，以要求基督徒随从使徒行传的榜样来欺骗他们，要他们为福音的缘故，把自己及所有财产交出来，否则会被共党枪毙及充公（他

被控有此种说法)。这个骗局像一把火传遍了全国将近五百个基督徒聚会所，估计净得的奉献价值有五十万美金及财物，这没有其他用意，当然是为着政治谋略，为了他的反革命计画募集幹部及资金。

最后，他利用信徒单纯敬畏神的好处，倪柝声被控一种「浪荡淫乱的败坏及纵欲的生活」，他经常沾染邻舍，过着一种无耻、混杂的同性恋生活，指控中要他承认曾引诱一百多位中外妇女，这些指控并没有证据。

倪柝声在这他曾长期带领教会祷告及向信徒讲解圣经高举基督的南阳会所中，因着伪造的故事引出许多的罪状。然后，主席罗竹风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译音）站起来宣读主要的演讲。他提到一九五二年四月倪柝声被捕的罪状（不久便公布出来），然后讲到政府的宗派政策，他向听众说：「人民政府是保障宗教自由的，不幸的是有些革命分子在他们的著作中，狡猾地强调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试图挑起百姓的情绪，破坏他们的合一。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有些革命分子躲藏在基督徒聚会所内。倪柝声及他的同伙反对三自革新运动不是因为宗教的关系，而是他们有其秘密的企图。」

「宗教是宗教，信仰是信仰，他们不能把个人反革命的思想渗透在其中，用来遮掩其散布憎恨国家及人民的毒素。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积极的进行揭发这些阻扰人民罪行的斗争。」

「有一些人至今仍是我们当中严惩的问题，现在看他们是否悔改，采取另一种新的态度。根据过去几年的调查，我们得到许多的资料成为档案，如果必要我们可以应用他，那些不留意这个警告的人，必尝到它的后果。你们基督徒聚会所的会众不必害怕公开洗净你们污秽的衣服，但必须努力找出及揭发所有的罪犯。」

「这场斗争正开始，除非我们完全胜利，并且拔出藏在小群里的每一个反革命分子。」

在副市长演讲后，有一个在南阳路聚会的医学院学生，也起来发表诽谤性的演讲，他讲完又有其他试着要站起来，所以再给他们一个机会，于是聚会便结束了。

倪柝声的一位老同学及同工当时在场。他说这次控告他的不是宗教方面，而是政治及道德方面。他说：「为作基督徒受苦是一件事，为着未曾犯罪却被视为罪犯而受苦又是另一回事。难道我们不该求神按公义的审判，干涉高等法院的判决，洗净他自己的名，拯救我们的弟兄，使他的道在中国不受捆绑？难道我们不该为我们敌人祷告，就是那些被撒但掳去成为主的仇敌的人们？」

二月一日上海市政府采取一个不寻常的步骤，在人民解放日报刊登一则官方消息，记载倪柝声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被逮捕，他跟张子杰及倪洪祖一同被关在上海第一拘留所。张弟兄是山东的同工，倪洪祖是倪柝声的三弟，在倪家排行老八，他未曾公开做基督徒，但做过国民政府的中级政治官员，因着共党保证保留并归还他在上海的私人财产而从香港返回，最后他是以判国罪名被处死。共党在这时公开地把这两位弟兄的名字与他一同连在一起，无疑就是要控告倪柝声间谍行为的证据所设计的。

二月二日陈罗宾（译音）主教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声明，攻击倪柝声及其从犯，强调他是何等欣慰看见这块信仰路上的绊脚石终于被挪开了。同一天他在怀恩堂主持了上海三自革新运动的扩大会议，有十二位牧师及教会领袖上台演讲，加入「猛烈的谴责」以回应官方的控告，而称赞当权者，认为他们囚禁倪柝声及其同党「十分正确及必须的行动」，并且「这些披着羊皮之残暴的狼，应该给予最严厉的惩罚」。会议通过一项结论说：「这些邪恶的领袖在他们反抗政府的背叛中，犯了极重大的罪行。」而这些罪行在基督徒中引起「前所未有的愤怒」，他们的教训与基督教的教义是相互矛盾的，所有曾经被

他们欺骗及毒害的基督徒」必须参加提高他们爱国心的学习，及揭发他们的罪行。

一位女性的讲员在这会议中描述倪柝声是一个放荡的反革命者及无耻的奸夫。他说：「我们妇女们听见这件事，不得不恨他」。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新闻特写刊出一张漫画，标题是「交出来」作为一个索引，图上画有一幢两层的房子，楼上的人涌向一个戴着面具坐在楼梯踏板的人，他催促他们把他们的财产倒进一个标有「神的物归给神」的大漏斗中，每一种礼物都丢进去，这时有一个苦力正扔进他脱下来的衬衫，及抱在手中正在哭泣小孩的小夹克。楼下的容器变为不同的标语：「为着反革命工作」。使这漏斗中涌出一道黄金、白银、手表、珠宝及钱币的奉献的溪流，流到众人赞叹的倪柝声脚前，他正安逸地坐在位上，有一个妓女正坐在他的膝盖上。

他们籍着这种讽刺，是要从基督徒心中除去他们对倪柝声的爱戴，很少人敢公开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全国的基督徒都默默为他祷告。

从二月五日以来，所有在上海的牧师与福音工人，被组成许多学习小组，向各处的基督徒宣扬「倪柝声的罪行」。所有在南阳路的聚会，除了主日崇拜外都一律停止，等候特别的指示。为了指导学习，二月六日的「天风」杂志，用十一页的篇幅来评论倪柝声的案子，社论的标题：「赶出教会中残暴的狼」，接下去是「从他们犯罪的记录看来，这个家伙曾破坏了我们的经济重建，妨害百姓的生活，社会秩序及国家安全。他们在基督教会中曾羞辱主的圣名，玷污教会的名誉及败坏福音真理。他们非常灵巧及弯曲，善于谈论圣洁的事，但他们的行为却远离了圣洁，并且倪柝声常犯通奸罪。」

「基督徒聚会所的兄弟姐妹们，我们非常高兴，因这个家伙不再搅扰及伤害我们所爱的教会，我们现在可以毫无置疑地在彼此相爱中合一。让我们庆祝这共同的胜利并为此欢呼，因为只有揭发及驱除此种披着羊皮的狼，才能洁净教会荣耀主。」

在「天风」杂志的后来几期刊登中，还维持了一段时间连续的漫骂。该刊物指出二月九日，在南阳路会所另有一次大的控诉集会，有三千多的「小群」会友参加，包括从南京、长沙、苏州、吴兴及其他地区来的代表，他们的出席是为了加增所选出来的，代替在上海被囚禁领袖的十四位管理委员们的权威。这次集会在一种较一月三十日更大的心理压力下进行，他们曾经克服了某种程度犹豫及疑问，并且「天风」杂志报导他们准备加入报复的狂热。它用十五页篇幅报导控诉及攻击内容，接着是一篇名为「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信仰的文章。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至廿三日，在北平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基督徒教会会议，有不少教会代表参加。由三自运动的主席吴耀宗报告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全国会议以来进步的情况，那时他说：「我们对前途充满了自信，有一小群人以『信仰问题』的虚假借口来反对三自革新运动，破坏我们的合一」。他说到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国的运动中，「一些隐匿在教会中的反革命分子被揭发出来，这些人靠着宗教的借口从事间谍，散布谣言，瓦解中国人民的主要运动。他们教导假籍『信仰』来反对三自爱国运动，试图以宗教的招牌来混淆他们的基督徒同伴，败坏青年，破坏基督徒的合一。他们被揭发后便除去了中国基督徒的合一障碍，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是在一个广大及坚固的基础上联合，而且比以往更加团结。」

接着便由「小群」的代表公开宣读他们的认罪并加入三自运动行列。最后由安立甘教会崔伯壮（译音）说话，他说：「北平小群长老颜迦勒，及上海小群苏玛利小姐在这次大会中做了控诉。有谁被强迫



来控诉呢？当我们完全了解他们的可怕罪行，我们不能做什么，不过是抓住机会来揭发及控告这些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思想的代理人而已。」他说到「狼披着羊皮隐藏它的爪子」，而这群人正是西方所称「勇敢的基督徒的领袖」。

最后一天，三自运动对全国的基督徒发出的一封函件，其内容摘录如下：「我们记得当一九五四年七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时，一些信徒尚未了解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意义，他们采取破坏的立场，并且试图阻挠基督徒的合一。但今天情况变得非常明朗，我们看见那时阻碍合一的原因，乃是因为教会中隐藏者一些反革命分子，他们戴上『信心』的帽子，企图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现在他们终于被揭发出来，那些被迷惑的弟兄姊妹们，已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弟兄和睦同居的恩惠终于临到我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欢呼感谢」。接着是各省的会议，浙江省是在杭州举行，也就是倪柝声与张品蕙结婚的地方。当这种会议在允许公开发言时，小群的代表们特别急切地站起来否认他们以前的态度，加入定罪的行列中。三月间在安徽省有份官方报告说：「许多曾经被倪柝声影响误入歧途的人都受到再教育，而残余分子则被逮捕」。

四月中旬上海南阳路教会的再教育宣告完成，并在四月十五日聚会中正式加入三自革新运动，且有其他教会代表参加。集会题目是「净化我们的信心」及「如何加入三自新运动」，由于「大多数人的愿望」，教会公开宣告它的「重生」。由宗教事物局的代表及几个教会领袖致欢迎词，整个在中国的更正教会宣告在唯一的权威下合一。

可是稍后「天风」杂志的报导公开批判：「还有少数弟兄姊妹，由于受到反革命毒素极深的影响，仍然不易在良心上赞同，认为这是牵涉到他们信仰的问题」。所以当局决定从事堵塞漏洞的工作，所有非正式的查经班、祷告会及在各人家中任何非经认可活动都在严禁之列，独自传福音急传道也都列入非法。虽然政府大声宣告基督徒有自由的敬拜，但是活动却在三自的监视下，唯经过认可的信徒才获得有条件的自由。

倪柝声当然再也看不见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出现在上海高等法院。这次也是像以前一样，这种案子一向都是公开集会的定罪和非公开的审判，这次审判经过了五个小时，在听证中，宣告他被自己的教会开除，他因犯了种种罪行，被判十五年监禁和劳改，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算起。

## 第十九章

### 隐蔽的行动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风暴在上海揭开后，张品蕙也被列入「对象」之一。她在医院受到隔离治疗，高血压加上糖尿病影响了她的视力，她太虚弱以致无法参加控诉集会，使她没有机会公开认罪，但是六月倪柝声在高等法院受审定罪时，她也被关进监牢，到了年底她还未完全认罪。

一九五七年有一段时间张品蕙被释放回家，开始她长期的家中守望，她家位在徐汇路，离第一医学院不远的一所房子内。很少人敢去探访她，因为公开拜访她需要很大的勇气，由于她是反动罪犯的亲

属而被剥夺公民权，与她来往是有危险的。她的邻居很少跟她谈话，但有时会有基督徒学生或是信徒在黑夜中躲开监视来探访她。他们避免谈到她丈夫的事，只是一同谈论主耶稣，然后与她一同祷告。探访者离开时常常得着激励，为她的刚强及灵里的安息感到惊奇，因为她是一位具有相当丰富内涵的妇女。

一个犯人被判刑后，必须指定一个亲属为探访人，经过了五年的时间张品蕙被准许探访倪柝声。她穿过市中心到厦门街，来到坐落在苏州河边老租界区，广大的第一市立监狱。他们在一间有铁丝网隔离的小窗前见面，在监视下谈了半个小时，每月只准见面一次，倪柝声每月只能发出或接到一封经过严格检查的信。

监狱是一九一三年英国人按传统形式建造的，墙是灰色并且令人憎厌。角楼的楼梯引到五楼的各层，每层有十一个房间。倪柝声个人囚房大约有九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房内只有一张木制平台可供睡觉，也是唯一的家俱。门外的走廊约有二百英尺长，通过像碗柜一般的牢房。窗户是面向墙壁，因为这儿的「牲畜」是很难睡觉的。

每天八小时劳动、八小时教育及八小时休息。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在监狱的工厂中夹杂在失落及忧郁的人群里工作，或是在缺乏绿色气息、令人沉闷的四方院中运动。他们没有囚犯制服，犯人自己的衣服已磨损及破烂，如果囚犯较殷勤，他的衣服必满了一大堆补丁，他们给人一种暗淡及消沉的印象。饮食是由女性囚犯预备的，一天三餐，两餐干饭（为劳动者）或两餐稀饭（为没有劳动者），第三餐是稀粥。他们有青菜下饭，偶尔有肉类。夏天的热气使囚犯们身上如骨架般的肋骨，及突出的血管更为显著，显然地，他们是仅仅能够生存而已，他们偶尔能洗一次热水澡，没两星期理一次发。严寒冬天由于没有暖气，使许多薄衣的囚犯几乎活不下去。

倪柝声是一个犯民法的囚犯，他也同那些政治犯同样接受教育改造。讲课包括政治、时事及生产技术。每一个段落停止时，有自由阅读检查过的书刊及报纸的时间，也有讨论会、剧团演出及电影。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在扩音机刺耳的政治宣传下生活。

由于倪柝声的情况渐被外界知道，有小量的食物、衣服、肥皂（是严格的配给）及金钱从香港寄给张品蕙，她只能送一点给倪柝声用。听说他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他被允许写一些东西，有一部分的劳动改造是把英文的科学图书及期刊译成中文以供当局使用。他也能够买一些许可的书以利工作之便，后来从香港买了两本医学字典寄到他那里，可以确信的是他们绝不允许他有圣经。属灵安慰的源头则需依靠他那惊人的记忆了。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开始了思想放松的「百花齐放」运动。但在张品蕙开释一年以后，也就是鸣放及「斗争」之后，接着便是反对自由思想者，严厉的整风运动。然而，一九五七年一位学生参加南阳的聚会，发现有一群勇敢的信徒宣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和诗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他们早上有服事聚会，下午擘饼，晚上有青年聚会。个个非常有精神，那年七月在会所有五天的学生退修会。那年夏天全中国的学生中有一个极广泛的基督徒觉醒，可能是由于小心保存了王明道及倪柝声著作的挑旺及喂养而有的。许多学生认真的背诵经文，以备在受审时应用。

同年十月倪柝声著名的著作《正常基督徒生活》，在印度孟买出版。这是他所未曾预料到的，它在海外结了丰盛的属灵果子。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推动了大跃进，目的是使国家的生产「更快、更好、更经济」。在他这种不能变更的思想操纵下，经过干部的说明，全中国百姓把自己投身于各种超时间的努力中，包括密集种植水稻、土法熔取钢铁（土法炼钢）。由于此种时间、精力耗尽的办法，无疑地导致教会出席人数的下跌，同年也开始基督教牧师密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种设计是把他们视为剥削阶级的一分子，即「社会的寄生虫」，并强迫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天风」杂志充塞着揭发邪恶事物的报导，诸如信心的医病及赶鬼等，他们说「帝国主义」再度抬头，而且他们常作没有根据的恶行控告。许多在黑名单中的牧师，被送入监狱或送到矿场工作，基督徒领袖由于误把共党暂时的策略作为终极的目标，早期增加抨击的工作，现在自己也轮到被抨击。一位观察者说：「每一个人不知道明天是否能够逃过控告，或者自己将成为控告者」。

同时统一敬拜的运动正在开始。各处的信徒被融合在一起，教会建筑物被作为世俗的用途。十二月北平的教会由六十四减少到四个，上海从一百五十减少到二十个，南阳路的会所成为工厂。「小群」的强制改革包括废除姊妹聚会，及每周掰饼聚会前的个人谈话，诗歌统一，由一个委员会编选。所有的教会禁止宣讲世界末日及主的再来，也禁止讲到世界的虚空。教训必须合乎教会合一，及社会主义的利益。所有解经书都需要经过检查及判断，看它是否包涵反动思想毒素。教会房屋及教会财产，也与教会一样，同时交给三自爱国运动的常务委员会。

在第一拘留所内，掀起增产的压力也是很大，有一沉着勇敢的赞美歌声，升到了神的面前。一位关在另一房间的外国朋友告诉我们，他故意在早晨扩音机声以前，藉他所记得的圣经编唱了四、五首诗歌，如此有一年多。由一九五八年一些被释放的囚犯报导，更证实了那唱诗的声音是从倪柝声的房间传出来的。这些人回忆到他那愉快的男中音，而且非常熟悉倪柝声所著及翻成中文的诗歌，觉得他的故事整个出现在字句中，甚至有些意义是越过他所唱的。他们也因此记得第一世纪的事件，当时「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徒十六 25）

一九五八年夏天，李渊如及汪佩真遭受审判及攻击，他们坚决的拒绝控告倪柝声，两人同时被判自一九五六年一月起十五年监禁。听说她们也是在艰苦的情况下，从事缝制鞋的劳动。俞成华医生也是因为拒绝各种谴责倪柝声的劝诱，甚至当局将他的妻子及儿子送到牢里，想藉此来说服他，以使妻儿可得释放时，他仍拒绝。那时，他正因癌症痛苦且病况严重，但是此刻到了，他仍然站着接受审判。不久，传出一个消息，他是死在哈同路二楼以前的办公室中，坚守他的信心到底。

一九五九年的新年听不到爆竹声，没人穿着新衣服，当然也没有福音聚会。「天风」半月刊，现在是中国仅存的基督教杂志，但它的内容限于宣传文章。各处的人们被鼓动「把他们的心交个共党」，一切事务都被生产所占去。在一九六零年五月有三个中国登山队员在毛战略思想的鼓舞下，把一个小型毛石膏像放在喜马拉雅山的埃弗勒斯峰顶，而中国大陆却早已陷入经济的危机中。由于管理低劣，加上天灾，所以强迫食物配给，使得大多数地区都接近饥饿边缘，毛泽东大跃进政策被取消，当然，饥饿也影响了各个拘留所。一九六二年两位虚弱年老的「小群」长老被释放出来，他们服了十年的刑，据说倪柝声瘦得不到一百磅重。十七个月后他得到了冠状动脉病，住进监狱的医院里，暂时停止手艺的工作，他们准许别人从香港买药寄来给他。

一九六六年六月全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这件事令敏锐的政治观察家大大地吃惊。显然地，它是

认为目前特权统治者的个人野心危害了整体的利益。八月十八日北平学生红卫兵大规模从事游行及高喊口号，期待在观念上净化。他们借着「思想」的武装，从总理刘少奇开始往下攻击各阶层的领袖，把他们当作苏维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九个月内上海的统治阶层有了剧变，市委员下台，工厂关闭，谩骂的大字报贴满了空白的墙壁，敌对的群众充塞在街道，没有一个人把一刻空闲。红卫兵又集合在市立监狱的大门，控告狱长胡卫仁（译音）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并且冲进去占领了整个建筑物一段时间。风暴临及每个牢房及娱乐室，他们对一些人入狱者施加粗暴动作。显然在这次事件中，倪柝声增被人打倒并扭伤了一双手臂。此时，「新的思想」代替了以前在狱中的改造学习，经过选择的监狱图书也随之附和此种说法。

一九六七年四月倪柝声十五年的监禁已经结束了。这时第一市立监狱的扩音机不时地警告其他囚犯：「如果你被判五年或七年，虽然你的时间已到，而我们对你的改造仍不满意的话，你将再延长五年或七年。」全世界各处的人都为他的释放祈祷，虽然张品惠的身体情况很差，心中也坚信有这么一天，但只有少数人包着乐观的希望。两位在香港及上海的姊妹在通信中常提到「大弟在家吗？」回信总是：「大弟不在家」。

一九六七年政府分发了八亿六千万册，四合本的毛泽东「选集」，三十五亿「语录」（小红书），加上十亿本的选读及诗。当时持有一本圣经是危险的事，几个月以来，有十三次红卫兵闯进张品惠的小屋子，搜索她私人的财物、嘲弄及破坏每件基督教的东西，像其他人一样，最后由于她在这里极度的焦虑下，已濒临完全崩溃的边缘。虽然信徒尽他们所能的帮助她，但那时只有神能扶持她。

从这年以后，全国教会的服事完全停止，少数的教会职员受命回到他们的家乡。所有各种信仰的宗教建筑物予以「世俗」化，并且把反宗教的宣传贴在它们的墙上。「天风」杂志暂停出版，以后再没有出现过。

十二月香港聚会所的长老传来一些话，显然是人民政府的高层许可倪柝声及张品惠被赎离开中国大陆，如果他们原把一笔可观的美金存进中国银行在香港的分行；其他人也有过这种案例。后来据报导，北平有「一个政治犯及他的家属，脱逃到西方」，但多数人相信他们是用了一笔相当大数目的款项，在一种彼此同意的情况下把他们买出来。由于东南亚中国信徒对倪柝声的热爱，他们很快的搜集到这比赎金且超过了数目，预备好作指定的用途。然而，在一九六八年年初，同一个官方消息的来源说，这些交易被取消，赎金退还解约。我们可以猜想什么事使这个计画取消。

假定这个奉献是真的，当它通知倪柝声时，他一定得决定要接受与否。从十二月由一位逃难的人带一封他的手笔到香港，当时他的身心情况都很好，所以一些曾经与他非常熟悉的青年同工们认为，他像是古代那些信心的人们「不肯苟且得释放」，是他自己拒绝了 this 提议，这是他向来的性格。他为持守自己的原则，在中立的事情上与政府合作，如学习、劳勤、翻译的工作等。他愿意；「顺服在上掌权的」，一点也不破坏别人对他是一忠实的基督教印象。他的榜样对其他许多有相同遭遇的人极有助益，假若他「脱逃到西方」必给他们有一种妥协、退缩的失望榜样。

另一方面，他不仅是在狂妄人的手中；也是在神的手中。无疑人们心中都知道他是被陷害，并且他的「罪行」也是虚构的，但神必按着祂自己的道路来带领他，以至神能向他说：「你是有福的。」（太五 11）

倪柝声早期的生命中，曾借着一些基督教徒学了「破碎」的功课，他自我的力量曾被神摸过而破碎了（正如雅各在雅博渡口），因为更经历了神那常新的能力。当他软弱时，就在神里面得着刚强（林后十二 10）。他说：「我不能抓住你，但是我能祈求你，我没有信心，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仍相信！」当他到这个地步时，神因着他的依靠而工作，倪柝声在属灵的学校中从未寻求毕业。他曾对文德里的聚会说：「我们永远都是学生，但是在某些点上我们必须学会基本功课，经过这种学习以后一切就都不同了。从这点开始，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超过我们所曾梦想的」。有一次，他在早餐时，拿起一块饼干，把它劈为两半，然后再把两半小心地合在一起，他用这个饼对这观念做了一个极有效的说明。他笑着说：「你看它是好的么？但它永远不能跟以前一样了，不是吗？你也是一样，当你被神轻轻的一摸，你就必须屈服下来。」

倪柝声里面的安息，是出于他对神旨意的认定，他的生活可能是神给人最大的恩赐。一九四九年他选择从香港回大陆，他确信在新中国，神给了他一项任务。现在，无论外面如何，他仍然一直觉得神能在这儿用他，他常说：「当我们的环境不如意时，那并没有太大的妨碍，我们都是从安息着手，但是当我们从耶稣学会如何说：『父阿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十一 25~26）我们便会发觉另一个安息。神知道祂所做的，并且信徒的一生中没有一件事是意外的。对于那些完全属祂的人，凡事临到他们都是好的。」

「我们奉献做什么呢？不是要做基督教的工作，而是为了神的旨意，成就祂所喜悦的。神早已预定了每一个基督徒的道路，假若我们在人生旅途终点能同保罗一样说：『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那么我们真是有福的。旧约的圣徒服事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人们睡了，但主却永远长存。神自己可以完成祂的工作，但祂却赐给众人，我们的工作可能受损，但祂的工作永远不受损。祂仍然是神。」

## 第二十章

### 没有人禁止

当六零年代，世界各地为中国基督教徒的祷告达到高峰时，倪柝声的属灵著作传遍了西方，他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对他个人的兴趣仍是一件相当吸引人注意的事，这种现象与他早期侵犯宣教圈内建造的权益所引起的猜疑相比，是一件令人相当难堪的事。今天他的读者都会较赞同这位元中国本土的见证人，而认为那些富于进取的外国职业宣教士们令人痛惜，曾误认了当时一些外在的表征。一位被迫撤退的福建安立甘宣教士曾由衷地承认这个错误，他叙述倪柝声的工作为「一项真实及扩展的交通」并且承认这种运动「是以抗议我们的错误为开始。」他说：「如果我们不将自己分裂的宗派，及中世纪后不完全的基督教传统引进中国，天主教的制度与圣灵自由之争的悲剧，必不会再生于中国。」一位在西方的旁观者在外国宣教士的努力停止后，很乐观地看到一幅非常美好的福音远景。他写到：「我们有理由相信，一种新的宣教运动正在中国展开。」假如照他所说的真有这种光景，那么，倪柝声曾否为此做了积极的贡献呢？

倪柝声生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中。一旦他被耶稣基督教得着，他就看出自己必须活出一种更新的基督徒生活，并且在中国的背景中，毫无牵挂地自由做见证。他以圣经为解决问题的根据，他一遍再一遍继续不断地阅读，盼望藉此避免偏差的危险。他希望一切行为上的问题，是借着遇见活生生的基督做为解答，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有位宣道士评道：「这个运动的领袖，他曾使福音极度的具体化，不但是纯圣经化的，也是纯中国化的。」

当我们谈到他在教会理论上主要的弱点（但在这一点上，多年来一直有相当多赞同的人），由于他仅仅从新约榜样所推论的原则，将它当做命令，坚持教会地理上的「地方性」（一个城市由一个地方教会管理），因而使它更容易受到共党政府的控制，因为这种光景过于静态了。相反地十年以后他又发现第一世纪移民传福音的观念，他似乎真正得到启示，藉此，基督教观念的弹性及时机性就被种植在许多人的心中，这些人不久便遭遇被迫分散的命运。当共产党开始采取人口普及的政策时，使用这种方法来消除教会，这种更加流动性和实用性的基督徒生活及见证的观念，最后成为他们自己命定的方式，也可以称它为「临时性的」教会。倪柝声过去的创新非但不能存留，反而将它再置于否定中。

倪柝声最具价值的贡献，就是在中国各处保存信心及活泼的圣经思想。他那令人难忘的基督徒与神同行的教导，其中包涵了生命的种子。一粒麦子可以死了，但他不再是一粒了。所说的话也决不徒然返回，必定成就它所命定的。一位宣道会的中国牧师说：「他很博学，具有丰富的理解力及思想，他是我所遇见过最好的教师。」一位西方的宣教师说：「倪柝声是被主所兴起，为着把福音真理灌输于中国百姓血脉中的一个人。他的话像钻子一样有穿透力，他的书及小册子遍及各处。如果有一个人要列出中国最有影响的基督徒名单时，一定很难把他漏掉。」

但倪柝声选择（如果他真的有所选择的话）停留在大陆，被监禁，正如保罗「为福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提后二9）结果如何呢？他最后几年所带出的信息又是什么呢？

乍看之下好像是环境使然，也可能是因着基督教的信仰。耶稣曾警告十二门徒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太十18~20）正如布鲁丝（F.F.Bruce）指出，这是奠定保罗上诉该撒的真实动机。如果该撒亲自听了保罗的上诉，结果可能有改变吗？这种假设会限制了保罗最高的愿望，而这种回顾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对于主后五十九年有关尼禄（Nero 罗马皇帝）的事较保罗清楚。对保罗来说监禁不是传福音的惩罚，而是传福音的台阶（参弗六18，腓一16，西四3。提后四16等）。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中也有其他类似的经历：马丹盖恩（Mmy Gnyon）的故事在早年时期相当影响倪柝声。一六八八年她在绞刑的威胁下，写出她的公开宣言。她说：「我们的主恩待我，祂对门徒们的应许，使我能回答超过我所学习的。」这种做着国度挑战性的率直说法，一直都有神为他们负责，正如写在使徒行传最后的一句话——「没有人禁止」。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位中国的游客在西方的某个首都寻求庇护。他告诉当局，他曾经在上海市一所监狱当过狱卒，因着倪柝声对他作见证，他寻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如果这消息可供我们瞥见今天中国基督教借着「所见证的道」而达到的光景——它可能真是如此——也必定有相当程度的长进。

在耶稣有关末后日子的谈话里，我们可能得到某种暗示，但关于在君王面前作见证这句话，祂是对十二门徒说的，这里面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夹在这中间的是一般最常用来做世界宣道的经节：「然

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可十三：10）换句话说，今天传统的传福音方式仍是在审判法庭及询问室内。因为审问者借着审讯过程，更公开地见证那些基督教是无辜的。审判官的角色是寻求疑问并找出动机与理由，他可能相信自己是迫害者，他手中虽掌握所有优势，但是在神面前，他也是一个丧失将亡的人，在囚犯察觉到人性的需要时，监狱就是一个将「神的大能」（罗一 16）的信息摆在他面前的理想地方。

这并非说，囚犯能逃避捏造者的控告。事实上，我们的主也曾遭受被捏造之罪状，祂接受审判及死刑，祂的审判官、一个囚犯、行刑者及一般百姓都承认祂是一个无罪的人，但我们并不是无罪：「我们受敌，作难、遭逼迫、打倒了、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参林后四 8~10）

借着有份于基督胜过死亡的胜利，使他成为「得胜者」得与基督相交，这是倪柝声长久以来为着他的同伴所有的期许。回想当他在四十年代，他曾被约翰在启示录提到有关一个妇人面对红龙想吞吃她将生的男孩（启十二：4）之表号感到兴趣。龙的计策失败了，这个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躲开了龙的吞吃。显然孩子的逃脱是一幅复活的图画，因为「他们（孩子的代表）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有些人可能觉得中国是瘦弱得像蛇一般的龙，与约翰希腊式的表号并没有什么相干，但对今天中国的信徒来说，一只失败的龙（一个红色的政权）将成为一种无害的玩物！

倪柝声在夜晚与中国基督徒三自爱国运动的几位创始人长谈时，周恩来曾对共产党允许基督教作见证的自由，清楚表明了立场。他说：「假如你继续你的社会服务，我们将让你去劝化百姓。毕竟，我们都相信真理必定得胜。我们认为你的信仰是不真实及错误的，所以假如我们是对的，老百姓必定反对它，并且你们的教会将会衰微。如果你们是对的，老百姓就会相信你们。但我们确知你们是错的，我们愿意为此下赌注。」这是一次恩惠式的表白，却带着十分残酷的企图，但是耶稣对祂教会的保证，早已回答了这种企图，就是死亡的门户也不能胜过教会。当耶稣说到这一点时，祂预备自己付诸考验。因此我们看见充满生气的基督徒信心正在中国复苏。共产党的看门狗正吠叫着（古老的迷信正在复活），这正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公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神的儿女在此见证，而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隐藏或底下式的，因为「完全公开」仍是启示录结论中所用的一个副词。「基督教不是一种遁世及隐居山林的宗教，它是与社会连接在一起，且向社会挑战。」这看起来可能是愚笨的，然而却给我们一个暗示，在许多见证中我们可以看见真理的灵仍在作工，他在倪柝声、王明道及许多人身见证了祂的信实。直到如今也向世人见证那位看不见的统治者正在施行审判。

一九七〇年元月，倪柝声六十六岁，他待在上海监狱共十八年，现在被转到开放的监狱及乡间的劳动营。无论是在野外或是在轻微的劳动对他都是极重的负担。他心脏贫血的疾病再次发作，使他大受痛苦，有一阵子他曾再被送回上海。那年过去，第二年他好转了，二十年将近，张品蕙的希望再度升起。之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底的一个晚上，上时，突然失足跌了下来，虽然是轻微的撞击，然而她跌得很重，摔断了几跟肋骨。会友们送信给她在北平的姐姐，这位姐姐在倪柝声受审判前就未见过她。她姐姐及时赶来，在她离世前与她有短暂的会晤。神仁慈地把祂的儿女接去了。

她的姐姐在安排葬礼后，到城外相当远的劳动营看倪柝声。他早已接到了消息，为此感伤颇深，因

他们早已盼望要在四月再见面。她报告说，倪柝声心情还好。

一九七二年夏天，确实发生什么事也不甚清楚。四月十二日他结束了二十年的拘留，比公开宣判的刑期超过五年。十天以后，他用那清晰、坚定的手写信给他的表姐，信上称她为大姐，首先感谢她寄来的包裹。信上写道：「收到你四月七日的信，知道你没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东西都以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东西我都已收到了，实在感谢你。」然后他提到自己的光景，要她放心。「但平常并不太痛苦。只有发与不发的分别，没有好与不好之分。」信的第二段指出他可能是在乡间。他说：「夏天的太阳可以改变一点皮肤的颜色，但不能改变病。」最后他结束说：「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请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点，心中充满喜乐。祝你好，述祖。」他签上很久以前他们在福州玩伴所有的乳名。

据说，六个礼拜以后他到了安徽省。对他来说这段旅程并不短？或者在那儿有新的逼迫？他是一个未经改造的知识份子，没有公民权，是否他受到较差的待遇呢？或者他的旧病又发作？我们没有详细的资料，我们也不知道最后是否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与他在一起。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他六十九岁时，进入了主欢迎的同在中。

从他的最后一封信，可以发现一些事实。从他说到阳光的事，至少可以说明他接受了他的环境。从他的充满喜乐的结尾看来，我们知道他的感觉漫溢在文字间。他的信给人一个印象是他没有自怜，他所经历里面的喜乐，他大姐也可能尝到了，他的确可称为一位属神的人。他做了一些事，为了表明他希望她「心中充满喜乐」，他用了四个字：充满喜乐。他眼中是否正注视着一颗闪烁的明星，因耶稣对祂的门徒说话时也用到了这四个字：「你没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十六 24）这也是他向我们众人惯有的信息：「求」。虽然我们看不见，但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在地上，无论处于任何情况中，信徒不该有「不能」的情形。无论是被敌人阻挠或是被环境困住；无论是完全无力，或是被围困在孤军奋斗的黑暗中，我们都能祷告，向祂呼求，而且我们确定必得答应。神定要再度行事，只要我们继续祈求，到时忧愁必定转为出人意外的喜乐，「并且你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